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

惠文

目录

前言

1958 年，在中国大地上喧嚣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时候，在广大农村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打人骂人风、干部多吃多占风）。其势异常汹猛，所到之处，田土荒芜，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生灵涂炭。这种人为的灾难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年特大困难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浩劫。

为了扭转农村生产大幅度下降、人畜大量死亡的局面，1960 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组建了约一万人的整社工作团，分赴河南、山东、安徽、贵州、四川、青海、新疆等重灾省区进行整风整社。要求在稳定局势的基础上，迅速改变农村形势，向着好的方向转化。

整社工作团的成员，要求立场坚定、不怕困难、思想作风好、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有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的决心。中央直属机关根据这一精神进行了动员、挑选。中国科学院属于中直机关，指定要组建一个工作团到四川。我当时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现代史研究所工作才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根据“先中央后地方、先重点后一般”的分配原则，分配到这个研究所的有五人，其中除我和易显石是党员外，其余三人是团员。报到后，所领导向我们进行个别谈话，明确我们这批新调去的年轻人是所里后备骨干力量，对我们寄予了很大希望，勉励我们要安心工作），由于所里把我们当作培养的后备骨干力量，刚组建工作团时，组织上没有把我列入名单，报上去的是一些年纪偏大、身体不太好、政治条件差的。中央组织部在审查名单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及周总理作了情况汇报。周总理和安部长听了汇报后，对中科院提出了批评，指出“这是在甩包袱，不是从工作出发”等等。于是，我们所领导公开检讨了思想认识不足、工作有缺点错误，表示接受批评并立即改正。在全所又重新动员、学习，坚持走群众路线来确定名单。这样，便把我物色上了。在当时，我被物色上是很自然的：一是，工作团是到四川，我是四川人，熟悉四川风土人情，当时正需要这样的人；二是，我人年轻，身体条件好，可以坚持农村的艰苦生活；三是，我生活简朴，能吃苦耐劳，会干农活，知晓农事，易于和群众打成一片；四是，我也愿意回四川，准备将来就在四川工作，便于照顾家庭。新名单确定后，所里沸腾起来，热闹了好几天，墙壁上贴了不少诗词之类大字报祝贺、勉励，以表欢送之意。我也忙得不亦乐乎：领导找谈话、设宴欢送，照相留影，接连到人民大会堂去听周总理、李富春、陈毅、安子文、李先念、陈正人、谭震林等七、八位中央首长的报告，到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大礼堂

听郭沫若院长的讲话，准备行装，等等。对墙壁上贴出的那些诗词之类，我一个字也来不及抄下作纪念就匆匆离京了。1960 年 12 月 20 日上午，中科院组建的工作团 200 多人，编成 4 个中队从北京出发到四川。临行前，所领导张维汉书记、刘述之主任，以及人事组刘明远同志等到前门车站送行。在车站他们同我们合影，并赠送以刘大年、张维汉、黎澍三位所领导署名的小说《百炼成钢》和精装《电影日记》。待车起动，他们才与我们挥手告别。

到四川成都后，我们在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住了四天，听了省委书记廖志高的报告、省农业厅厅长对农村困难情况的介绍，然后我们被分配到简阳整社。我在简阳两年，头一年在农村辗转了几个地方，第二年在县商业局和供销社（由商业局分离出来的，专管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的购销）工作。开初搞“新三反”，以后搞社会调查和理论学习等工作。1962 年 12 月 5 日，经组织照顾夫妻关系，由简阳调重庆市委党校工作。

在简阳的两年，是在极艰难困苦中度过的。1961 年上半年青黄不接之时，生活上每月只供应 19 斤原粮。就这 19 斤原粮，首先得留出 1 斤用作到上面开会之用，其余 18 斤，平均每天只有 6 两，而这 6 两还得交出 4 两，用于抢救生命垂危的得浮肿病的劳动力（集中医治），自己每天只能吃 2 两原粮，折合成大米，仅有一两多。在这种情况下，差点断送了性命。全靠吃牛皮菜，才保住了我，我怎么能忘记牛皮菜的救命之恩啊！我在农村同社员一起度过特大困难的日子里，除了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外，还要经常开会、熬夜、做大量社会工作。工作之余，别人在休息、睡觉，我便提起笔来，在山坡上、在草堆旁、在阶檐边、在油灯下，含泪记下目睹耳闻之事。

人生是短暂的。在这短暂之间，个人有这样那样的不幸与困穷，然而，哪样能与国家民族的不幸相比！我在简阳的两年，个人虽有困难与辛酸，但这比起国家民族的命运危急是算不了什么的。每当忆及简阳两年所见所闻，不禁潸然泪下，尤其退休赋闲，历史的责任感促使我清理昔日积累的资料，以资后来者。遍翻所记，由于个人生活动荡、历史原因，丢失不少，只能将劫后残存，进行抄录整理，编为是册，名曰《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以作我的历史回顾与见证。记述中，为了照顾内容上的联系，便打破了时间的顺序。但，它记下的绝不是我个人的艰苦与辛酸，而是我与之息息相关的简阳人民的灾难的写实。我仅以此献给为改变极大困难而坚持真理的同志，献给忍受极大艰辛而为共和国作出贡献的广大社员与农村基层干部，慰藉跟我同滚草窠，与我切切话语的同志和农民朋友。挂一失万，衷肠天鉴地证，从中记取教训，杜绝悲剧重演，是所夙愿。

惠 文

1993 年 8 月 10 日

农村“浮夸风”的种种表现

来到简阳四个月了，根据群众的反映和自己看到、直接接触到的情况，农村的“浮夸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表面庄稼，得奖依据

在浮夸风作用下，种庄稼注重表面。沿大路、公路、铁路的土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畜力、肥料、种子，土地耕得精细，栽种用尺子丈量，搞“八尺开箱”，窝子用绳索牵着打，看起来整齐、笔直、美观，很是“田园化”，庄稼种得特别好，一派丰收景象。而离大路、公路、铁路较远的腹地、“背脚地”田土里，不是野草掩盖了庄稼，就是根本没种让其荒芜。上级派人来检查，往往坐着轿车或吉普车在大路、公路、铁路旁悠转一趟，所见的全是好印象。接着，被邀去办公室听取汇报，又是一派甜言美语；汇报结束，丰盛宴席热情招待。这样一来，在评比中稳取胜利，优胜红旗、先进奖状自然到手。上级的官僚主义助长了这种浮夸风，而浮夸风也适应了官僚主义的需要，因而浮夸风难于纠正。

二、虚报进度，不顾质量

青龙、禾丰公社 1959 年春播时，上面派人来检查播种进度。他们本来就没有完成播种计划，为了骗得先进的称号，硬说已经播完。上级评了他们为先进，就将他们的劳动力调出外援。而自己没有完成的播种任务又不得不完成，于是，他们用剩下的弱劳动力夜以继日地把种子胡乱撒在田地里来抢进度，根本不顾什么浪费、质量问题了。

三、虚报产量，巧做“手脚”

不少公社都有两本以上的账。上面来检查，有对付上面的账。即使完不成任务，而上报的账也完成，甚至是超额完成的。其办法是用很狡猾、毒辣的手段来上报。比如：

（一）1960 年上级派人检查红塔区的棉花统购任务完成的情况时，该区根本没有完成任务。为了欺骗上级，他们与区供销社暗中商量，搞弄虚作假，由供销社多出具收购棉花的收据，以此证明其超额完成了任务。

（二）强迫社员把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自留棉、旧棉花交出来，当新棉花去冲统购任务。

（三）把所有会计人员集中到公社、区或县里，让他们想法凑足浮夸的指标，想不出来不准回家，凑出了高指标才罢休。他们是这样凑的：1.庄稼成熟时，麻雀吃去若干斤；2.人过路踩掉了若干斤；3.被社员偷去了若干斤；4.收割时不仔细，捆、挞、晒损失了若干斤；5.禾秆上没有挞下来的还有若干斤；6.加上已经收到的若干斤，总计完全达到了或超过了亩产若干斤的高指标。

四、隐瞒土地亩数，虚报高产指标

解放公社、黄连公社从 1958 年以来，少报棉花、小麦种植亩数，用计划外的一部分“黑田地”的产量加在上报的计划内以此作为计划数上报，得到的是欺骗上级的单位面积高产量、高指标。

五、设立多种组织，个个挂上牌子

公社一成立，下属组织应有尽有，组织名称繁多，数不胜数。他们都做一块名牌高高挂起。一个公社、一个大队，甚至一个集体食堂的大门两旁，都挂了不少的牌子。一般的是七、八块，多的达到十几块。以此炫耀其气派。真是：牌子排排挂，看谁气派大！

六、锦旗奖状满墙壁，问题成堆是真情

在黄连、石钟公社，以及我所见到的不少生产大队的办公室里，四周墙壁上挂满了锦旗和奖状；挂不下的就堆在办公室的柜顶上。这些锦旗、奖状表示该单位"先进"、"优胜"，工作成绩"卓著"。然而，就是这些锦旗、奖状得的多的"先进"、"优秀"、"卓著"单位，恰恰是问题最多、困难最大、人畜死亡最多的地方。

1961 年 5 月

农村"瞎指挥生产风"的一些情况

"瞎指挥生产风"有这样一些突出表现：

一、不因地制宜、不按行之有效的传统耕作方法搞生产

就本地传统习惯而言，种小麦一般是窝播，肥施于窝中，既不浪费肥料，又可以集中肥力促进禾苗生长，还易于薅土锄草、透风透光。这样麦苗生长健壮，秆子粗，成熟时颗粒饱满，不易倒伏，产量高。据老农讲，上等土这样种，亩产二、三百斤不成问题。如今上面下死命令，要求亩产几千斤，强迫社员改窝播为条播，而且认为越密越好。种子每亩最低不少于 60 斤，中等的一百多两百斤，高的达到三百至四百斤。传统的窝播方法，种子每亩只用 20～25 斤就够了。照现在这样播种下去，麦苗长出来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细如毛发，又黄又瘦，完全是一包芊芊。长到四、五寸就枯黄而死了。即使未枯死，也如野草一般长不出麦穗来。只有那些长在田边地角稀疏之处的，才有部分长出麦穗，而麦穗上也只有三、五颗麦粒，一亩也只能收上十几斤，收上二、三十斤的，就算是高产了。颗粒无收的比比皆是，其中有不少造成了一季庄稼的收获量，比下种量少几倍甚至少十几二十倍。

种水稻，栽秧要求栽三寸见方，或以三寸为距，栽"胡椒眼"、"四叶菜"等花样。上面这时派人来监督，腰别一把尺子到田间丈量。达不到规格，就遭反右倾，被说成是不听党和政府的话，不服从上级领导，甚至遭到打骂；并且要把已经栽上的秧苗全部拔掉重新栽插。幼小的秧苗拔来拔去，几经折腾当然活不成了，于是只好重新播种育苗。在土多田少的地区找不到秧田了，只好在包谷土的行间整土撒旱秧。误了季节的旱秧苗长得又黄又细，根本比不上水田按季节培育出来的秧苗。即使再孬，也要栽插到田里，因为一年接一年的生产是不能间

断的，它关系着人们的生存。然而季节不饶人，这种错过季节栽插的水稻，收成是少得可怜的，有的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而那些按照上级规格跟上季节栽插的秧苗，成活转青后就封了林，难于薅翻、扯草、施肥，长得犹如野草似的，成熟时谷穗的颗粒很少，结果也造成大量的减产。

石盘公社大石、边界两队，1959 年按上级要求规格栽三寸间距的"胡椒眼"，栽秧时田间插竹片、牵绳子比着栽。生产队的大人、小孩、妇女、学生全部出动，70 亩水田栽了 45 天，才栽完计划的三分之二。如果按老规矩栽，每人每天可以栽一亩多；按新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栽一分左右，而且返工很大，误工严重，管理不善，秧子没栽完，秧盆就损坏丢失了二十多个。由于误了季节，秋收时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造成社员生活无着，大量死人。1958 年转公社时，两队人口有 246 人，到 1962 年 11 月份只剩下 132 人，有 46.47%的人饿死了。两队主劳 80 余人，只剩下 20 余人，饿死了 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 60 余人，只剩下 8 人，饿死了 86.97%。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力 40 余人，只剩下 2 人活着回来。社员痛心地说："瞎指挥生产使我们辛辛苦苦白干一场！"有的愤慨地说："瞎指挥夺去了我们的口粮，把我们逼上了死路！"有的老农这样说："做什么庄稼，简直是在办灯（胡闹，像孩子玩灯火做游戏，不负任何责任——笔者注），是乱球整，搞破坏！""我们做了几十年庄稼，从没有这两年糊涂。过去种得上好，现在种成了个啥！"

群众普遍认为：1958 年的庄稼种得好，普遍丰收 ，根本不是什么密植带来的，而是按老办法种的。上面把 1958 年的丰收归功于密植，是不实事求是的。从 1958 年下年种小春作物，才开始搞密植，瞎指挥生产风从此特别盛行。1959 年继续搞瞎指挥，生产连续歉收，群众遭殃饿肚子。上面把密植吹得那么好，群众是根本不相信的，甚至一些基层干部也丧失了信心，只是怕反右倾，才不得不贯彻。他们强调这样干是文件规定的、上面开会布置的，只有密植才脱得了手。密植在包谷等其它作物的种植上，也进行了死硬的贯彻，造成了同样的恶果。

为了抵制瞎指挥生产、反对密植、应付上面的检查，社员和基层干部动了很多脑筋：在大路、公路、铁路旁的土里密植，在背脚地稀种；在一块大田大土中，边上密植，中间种稀；上面要检查麦子播种一寸见方是否不少于 60 粒种子，他们就把三分之二的种子蒸熟（使它生长不起来），混同三分之一好种子一起播下，达到稀种的目的，以便获得好的收成。

瞎指挥生产违反因地制宜的情况也很严重。在简阳解放管区，沱江沿岸的大沙坝里，长期以来是种甘蔗的。他们有种甘蔗和用土法制红糖、白糖、冰糖的经验。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多因吃糖吃多了而坏了牙齿。据他们自己讲，解放前和建国初期，自己熬糖。转入公社前，土里还种着很多甘蔗；转入公社后，上面强调经济作物区的粮食要自给，得按上级统一规划进行指令性计划生产。于是，就把大面积的甘蔗连根拔掉，换种粮食、棉花。不仅简阳如此，听说整个内江专区都是如此。社员们痛心地说，种制糖的毛甘蔗（小甘蔗）是十年一轮转。种下的第一、二年产量不高；到第三年开始产量就高了；到八年以后产量又低下来。公社化拔甘蔗时，有很多正值丰收高产时期，广大社员是不愿意的，不少是流着眼泪去拔的。后来他们伤感地说："过去甘蔗种的多，糖就多。客人来了劝着吃，算不了什么。现在，连老年人、病号、婴儿想吃糖都难买到。就是打了条子、带上供应手续也买不到。过去内江地区的白糖多得很，出了名的，仅果脯就有两百多种。现在连影子也看不到，失传了。"农民本身是种庄稼、以务农为本的，他们对耕作技术特别关心。当我们向他们宣传包产时，他们普遍要求说：我们庄稼人都想有个好收成。哪块土该种什么，几时下种，几时收获，规格怎样，

我们自己明白，最好让我们自己作主。公粮、统购没有啥说的，我们保证完成。现在，上面叫包产，如果由我们自己作主耕种，我们就敢包；如果按照上面规定的办法来种，我们就不敢包。当我们把十二条和毛主席指示信念给他们听，说明今后技术问题可以自己作主时，他们兴奋地说："这就开了天恩，救了我们一条活命！"

二、经营管理上，不顾天晴下雨，只强调行动一致、按时完成

在劳动力统调的情况下，生产队得无条件地服从公社以及县里的安排。正当队里在干某一种农活时，上面突然来了电话命令，马上得转移去干领导要干的活。有的正在播种，刚打好窝子、淋上粪，将要下种，上面来了命令只得半途停止；有的正在田土里驾牛犁耙，命令一来就得扛上犁耙牵着牛回去，到上级指定地点重新干起。走拢新的工作地点，半天时间就白白地浪费了。再有，天下雨正好栽红苕，上级偏叫去挖包谷土。下雨天，挖黏性的包谷土就像打糍巴，揉来揉去，太阳一出来，泥土干成一坨一坨的，就像石头一样硬，用锄头脑壳敲打叮当作声，敲都敲不碎。土质遭到破坏，庄稼咋也长不出来，哪还能长出好庄稼？不少社员说：1958 年大闹深耕就是一次破坏土质的运动。深挖三尺，把多年耕种施肥的上面一层熟土翻到了下面，又把下面一层又硬又瘦、连石块带砂子的夹生土翻了上来。要让夹生土变成熟土，非要几年的工夫不可。在这样的生土上种庄稼，庄稼根本无法长好，更何况要达到高产。有的社员说：无论田土作物，庄稼的根一般只串到几寸深，超过一尺的少得很。锄头、犁头都是七、八寸深，深耕一尺左右就够了。如果水田耕到三尺，就变成冷浸田、滥钵田了，不要说人下去，就是牛下去也被陷在田里爬不起来。哪个还敢种这样的田？搞大深翻三尺，是那些球屁不懂、从来没有搞过生产的人乱想出来的，真是害人不浅！

三、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很不慎重，指挥生产颠三倒四

1959、1960 年种植棉花，在既无示范先例，又无相应物资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要求大搞烧火温床培育幼苗，再把幼苗拔去一根根地栽到土里。没有烧温床用的燃料，就把社员住的比较差点的房子的木料拆下来烧；再就是把遍山坡的树木、竹子砍来作燃料。花了如此大的代价，棉苗长得够快，而事前却没有任何准备，田土腾不赢，人力跟不上，怎么也栽不赢快长的棉苗。没办法，上级突然又下了另一条命令：停止栽苗，改成种子点播。这样一来，正值棉花播种时节，好种子已经用来温床育苗浪费了，剩下的只有次品了，有的地方甚至连残次种子也没有了。这不仅损失了一季棉花生产，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更为甚的是被拆了住房的社员被弄得无处栖身，遍山坡的树木、竹子几乎砍光，使得集体食堂普遍缺柴烧。

1960 年，民主大队种下了两千多斤胡豆，已长到一尺多高，苗架很好，可望获得丰收。突然，上面来了电话，叫把所有的胡豆苗铲来作肥料。社员没法，只好含泪铲胡豆苗。到第二年，要种胡豆，整个大队却没有一颗种子。加上这两年生活苦，吃得孬，饿死的人多，提起这些事，社员们很气愤，很伤心，他们说："这两年无论在外头搞生产，还是收工回到屋头，都是过的眼泪水生活。"

四、庄稼还没成熟，瞎指挥者就强迫社员去"抢收"

1960 年要收棉花季节，棉桃还是青疙瘩的时候，上面就下来了命令，强迫社员抢收棉花。他们叫社员把青棉桃摘回去，用锅儿炒、碓窝舂、棒棒棰、连盖打、用手剥，从一个个青棉

桃中把棉花剥出来。有些棉桃太嫩，里面还是一包水，上面就叫社员烧火把棉桃炕干，再用签子把棉花拗出来。日夜苦战，剥出来、拗出来的棉花产量很低，质量更差，又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社员反映说："这是盘古王开天辟地以来就没有见过的事！"

麦子还没成熟，上面也叫去抢收，要日夜奋战，把麦子全部收回去，并且还规定了"跃进任务"，每个人割多少亩、捆多少捆、打多少斤。不管日夜、晴雨，就是要完成任务。忙得社员只好在田间吃饭，以致有的社员昏倒在田间，有的稍坐一会就躺下睡着了。不但把人累垮了，浪费也相当大：土里掉了不少麦子；没成熟的青头打不下来，就给缺柴烧的食堂拿去当柴烧掉；嫩麦粒多，晒干后颗粒不饱满，产量低、质量差；特别是割回去堆着遭沤了的，天一下雨就生霉变质。上面叫生火来炕干。炕干打下来的是黑麦子，人不能吃，只好作饲料喂猪。

瞎指挥生产的事实多得很，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1962 年 11 月

打骂之风传奇闻

"打人骂人风"是困难时期农村大刮的"五风"之一，它是"三面红旗"的产物。"五风"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推动的。因此，这些歪风才会在这一时期愈演愈烈、愈刮愈大。

"三面红旗"中的总路线、大跃进都是强求速度。当时提出了"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五年赶上美国"（后来又提出"五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等口号。在农业生产上，一方面弄虚作假，大放亩产几万斤的所谓"卫星" ；另一方面，又搞瞎指挥，规定密植规格，限定一个人一天挖土多少亩，播种多少亩，收割多少亩，等等。无论作什么事，口号喊得很响，指标定得很高。如果达不到，就是右倾，就要遭反对。中央一级，毛主席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右倾，理论上还讲了很多大道理，他由远及近，由历史到现实，由政治到经济，由经济到"军事俱乐部"，由世界观到人生观，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历次路线斗争到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都讲了，还有什么"关于枚乘《七发》"、"关于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等等，参加开会的很多人起初有些模糊听不懂，后来他具体讲了，说彭德怀向他上书反映农村情况，是右倾机会主义，同彭德怀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等等。这下大家才明白了。从而使很多人转变观点，由批左转为反右，由赞同支持彭德怀转向批判彭德怀。农村基层干部文化低，理论差，讲不出道理。反右倾火辣辣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粗暴的打骂来解决问题。

建立人民公社，打破所有制界线，搞平调，把农民长期、甚至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家私搜刮

一空、毁于一旦，有的连住的老窝都遭捣了。当然，他们是不愿意的甚至是抵触的。这种不愿意、抵触情绪，就被指责为留恋资本主义，是私字作怪。当时认为，公字是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核心，与此相反的私字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核心。要反对资本主义，就要打掉私字。在偏激情绪的作用下，进而就打骂有私心的人。社员对瞎指挥有意见，不按瞎指挥那套去做，也被扣上右倾的帽子，不是遭到反对，就是遭受打骂。生产搞孬了社员没吃的，有的往外跑，抓回来就遭反右倾——挨一顿打骂。

在困难时期，农村的"反右倾"、"拔白旗"、"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就是行使打、骂人的代名词。由于这一套整苦、整怕了社员，闻之胆颤心惊，所以，农村基层干部在开会布置完任务之时，总要强调："这个任务是硬任务，到时非完成不可。如果完不成，就反你的右倾，拔你的白旗，割掉你的资本主义尾巴。"我们到基层后，还多次听到基层干部如此训斥人。基层干部在讲不出道理时，就骂人，骂不解决问题就打人。社员们听惯了粗话、脏话、丑话，一般的骂是无所谓的。然而，打却触及皮肉，他们是怕的。干部深谙此法之妙，也就喜欢采用此法。因此，打就成了他们的绝招和法宝。骂仅是辅助手段。然而骂，得要骂个狗血淋头、不堪入耳，以激起打人的劲头来。干部打群众，而基层干部又遭上级干部打，真是打人成"疯"。

打人的方法，无奇不有。在此略举一二，立以存照。简阳县红塔区解放管区（公社），困难时期是经常打人的。本地社员把管区称之为"阎王殿"。他们打人的办法是：把干了的棉花秆捆成把把，用利刀把桠叉剔成尖尖，专门用来打人。管区召集生产队的干部来开会，汇报生产进度、研究生产问题，如果有人说了与极左那套不合的话，就认为是右倾，就要挨打。不是乱打周身，就是打屁股。打屁股往往是"以毒攻毒"，即把要打的"右倾"者喊出来，命令其趴在宽板凳上，指定一人按头，一人按脚，一人用捆成把的棉秆鞭打。如果按不住，或者打轻了，又是"右倾"，就让另一帮人来打。如是轮流打和被打就是"以毒攻毒"。被打的人，有时打了走不回去，只得找人扶回家或抬回家。哪个基层干部晚上去管区开会，其家属总是提心吊胆的，倚门而待，坐卧不安，不能入睡，不知自己的亲人是否能平安回家。只有待亲人无恙归来，全家才松了一口气。该管区民主大队六生产队有个姓刘的队长，晚上叫去开会，汇报种小麦的进度。由于他说了真话：进度不如其他队，就被指责为右倾，遭了一顿大打，屁股打得稀烂，被抬了回家。回家后，痛楚难忍，呻吟不已，全家恸哭。其妻在别人建议下，连忙用青布包着鸡蛋清给他提血丝。就这样，事后一年多他走起路来还有些瘸跛。一提及此事，他便挥泪痛哭不已。该管区民和大队五生产队队长吴居林，1959 年 11 月份有一天在管区开会，正遇到外面捉来一个偷了集体一根甘蔗吃的娃儿。会上有人提出把这个娃儿吊起来打，打了后再罚。吴居林在旁边插嘴说："吃根甘蔗是件小事，教育一顿，叫他以后不要偷吃就行了。"谁知这就闯了大祸。只听得有人喊："哪里去找右倾？这不就是右倾！"吴居林还没有转悟过来，就被拉出来遭了一顿乱打，打得遍体鳞伤，走不动路，由两人架着弄回家，并遭罚款 120 圆，并限期交清。家中凑不起现款，只得将家里的鸡鸭捉去卖，再搜一些家具出去卖，凑足了被罚款数才被放过。直至整风退赔时为他作了甄别，这笔罚款才退给了他。

这类怪事，农村是不胜枚举的。有的甚至用棍棒、扁担、锄头打人，严重者有被打得卧床而死去的。更有恶毒者，如草池区区委书记就把外逃的人弄回来打，打了还钉"活门神"，即是用门斗钉把遭处罚人的两手两脚钉在大门板上，受罚的人被活活钉死。他不仅如此处罚外逃的人，对其他群众也同样十分残忍，民愤极大，在整风整社中不得不予以逮捕法办。

1961 年 6 月

共产风的产物——“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侧记

在简阳县城西北，沱江的对岸，有一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方圆四、五里，几个大的院落散布其间。解放前，这里是经济作物区，专种甘蔗、花生，辅以棉花、包谷等作物。解放后，特别是大跃进后，这里专划为植棉区。当然，也兼种麦子、包谷、胡豆、豌豆等粮食作物；以前为了养猪，现在为了解决人的肚子问题，红苕也种得不少。这个地方由于距省府和县城都近，省、县往来的干部从未间断过。所以，解放以来，各项工作都有上面下来的干部指导，一直走在前头。李井泉蹲点，也是选定这个地方。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这里是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全大队有 383 户、1537 人，耕地面积 1864 亩，共辖八个生产队。在整风整社以前，共有 5 个集体食堂；整风整社以后，改为一个小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

在此，把这两个食堂的情况从侧面作个介绍。

这两个食堂都是 1959 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万乐食堂花的工程和用去的钱相差无几，也是一千多元。单是两个食堂门口外面的墙壁上请美工人员来画的几张壁画，就各用去了三、四百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温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餐厅的前面有一个敞坝，周围有墙或厢房围着，正中是大门。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象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 4～5 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服”相结合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它们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羹儿（当地群众称之为“膏二”）都

喝不饱。他们对这种作法深恶痛绝，然而却只能怒目而视，敢怒而不敢言。整风整社开始后，社员（除“四类分子”外）都把搜刮来属于自家的方桌、条凳拿了回去，食堂就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壳壳了。食堂办不下去了，不得不把闲置的房屋的大部分退赔给一些因大跃进、瞎指挥生产打老墙做肥料、拆木料烧火炕而无屋可住的社员。

整风整社中，鉴于这两个食堂都是三个小队合在一起办的，队与队之间意见不一，社员都不愿意在食堂吃，而是把吃食打回家去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经过召开社员大会征求意见，大多数群众都要求分开，以小队为单位来办，这样路也少走一些。可是地方干部却说：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由大拆小是右倾。我们中央工作组说：不走群众路线，只要有那个本事就继续办下去吧。当我们工作组转移到黄连公社不到一个月，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地方领导机关才不得不批准按照中央十二条精神，以小队为单位来办食堂。这一问题也说明了，一切好事，如果违背了群众的意愿，脱离了实际，无论如何是办不好的。

1961 年 5 月 21 日

关于干部的多吃多占

干部的多吃多占，是困难时期农村大刮的“五风”之一。瞎指挥生产，使农业生产产量大幅度下降，吃的用的东西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便利用职权和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多吃多占。所以多吃多占风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瞎指挥风把生产搞孬了带来的。但是，它也与刮“共产风” 有一定的关系。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期间，大刮共产风，提出“割掉私有制尾巴”、“打破队与队界限”、“吃饭不要钱”等口号。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指导工作，开什么生产现场会、经验交流会、总结评比会、新技术推广会、学习参观会等等，就通过刮共产风大搞平调。到一处吃一处，既要办齐，又要办好。大吃大喝，吃后嘴巴一抹，屁股一拍完事。被吃的“东道主”操大方，讲阔气，得到的是一阵赞扬而已。此风一刮，为干部的多吃多占开了先例；人民公社的建立又为此风提供了组织准备，创造了客观环境和有利条件。

干部多吃多占严重地损害了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比如，社员私人喂肥了一头大猪，本地某单位便可以开什么会的名义，派人去牵来杀掉。既不给钱，也不打条子，甚至连一声道谢都不说。社员即使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骂几句，说一些消气话而已。如果这些话传到了干部的耳朵，轻则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重则扣上“思想反动”、“对党不满”、“对现实不满”，或者“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满”等大帽子。以后在生产上一抓着什么辫子，就被打成右倾，横遭批判、斗争、打骂。由此可见，“五风”之间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的。会议同多吃多占是分不开的。开会就要吃，要吃就必须开会，所以这个时期的会议特别多。白天有会，晚上有会。晚上开会往往是开个通宵。因此，干部总想去出席会议。如果没有通知到，还要怄气，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这样一来，会议成了灾。会多人多，会议既无准备，又缺乏中心，开起会来总是东拉西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群众深恶痛绝地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这个时候的会更多！”“他们一开会就整好的吃！”

被干部视为人民公社心脏的集体食堂，则是生产大队、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窝子，也是上级干部下基层多吃多占的据点。集体食堂的主食品和副食品是社员群众定量之内的东西，本身已经够少的了，经他们这样一吃一占，难怪群众会遭饿肚子，甚至饿死人。群众遭殃，想办小食堂或不再办食堂，干部却不同意拆分大食堂，根子就在这里。

多占，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比如，某些奇缺的生活用品、农副产品，市面上买不到，领导干部、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就在暗中把这些东西私下分了（当然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照牌价交了钱的）。一些大家都可以分到一份的东西，领导干部和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数量上总要比一般人多分得一些。能多吃多占的除了以上所说的人以外，当时还有诸如采购员、保管员、炊事员、服务员、饲养员之类人员，因为他们的手头有东西，路子也宽。上有那些人，下有这些人，因此困难时期多吃多占之风便形成一股既有社会基础，又有组织保证的社会性的不正之风了。

1961 年 8 月

麦子黄了人饿倒

（日记摘抄）

1961 年 5 月 24 日，晴。

上午同队里社员一起，到江边一块大地里割小麦。刚到地里不久，就看见距我们不远的大路上一个年轻的社员（看样子只有十六、七岁，像是读了点书的，至少有小学以上的文化），他一边走，一边唱。声音明亮，字句清晰，传入我的耳朵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社会肚子吃不饱。反动派被打倒，麦子黄了没有吃的人饿倒……”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工作组的干部和成员，听到这样的歌声，心里是非常难受的。但这是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群众的呼声。然而，我又无可奈何！现在，麦子是黄了，我们正在开镰收割。但是，收割一点，上面就派人来统购一点，连晒干都等不得，刚收回就“统”走了。每个社员的口粮，每天只留 10 两（16 进制，略等于 10 进制的 7 两）毛麦子。这样的定量，社员普遍反映吃不饱。

看来，只有形势进一步好转，大家生活改善了，这样的声音才会自然消失。

“小偷”成群遍山坡

前几天，我们在山坡上听见一个放牛娃儿唱出这样的歌谣：“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麦子没吊吊（麦穗），小偷遍山坡。”

今天（5 月 19 日），我们和社员一起在地里耘棉花苗，见一行行的小麦吊吊被人割了，心里感到难过，也有些气愤。可是社员们却不在意，反把它作为话题，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开来。一位社员问道：“甘同志，你看今年多怪，麦子这么好，可就是不长吊吊。你是科学院的，可以研究研究是啥道理。”

另一个社员接着说：“你怎么不回答呢？依我看，肚子吃不饱是主要原因。你说对不？”

于是，其他一些社员也跟着说开来。

“过去古怪少，如今古怪多。过去小偷是个别的，如今小偷遍山坡。”“白天装好人，夜间就去当偷二。到处都是贼（读 zuí）娃子。”

“去年八月间，六两（16 进制）黄谷吃一天；连吃红苕藤也用秤吊，一把一把地发，老根根也不多添一点。日子过得真惨！有天晚上，七、八队的社员就不约而同地去土里偷红苕。这是拿着锄头，背着背兜，大张旗鼓地偷。先去的还笑着问后去的：‘你来干啥？’后去的笑着回答：‘我来捉小偷。’土里到处是人，二十多亩土里的红苕，一个晚上就没得了。”

“甘同志，你说小偷多不多？该多哈？”

又有人说：“甘同志，我们过去见了小偷很稀奇，也很气愤。只要哪里捉住一个，就追着去看，还想把这样的坏家伙打死，别让他再害人。可是现在到处是小偷，大家的手爪都不干净，只是程度不同罢了。现在捉住小偷，我既不想去看，也不想去斗了。”“在我们院子里，现在找不出一户人手爪是干净的。”

我一边听，一边埋头耘苗，陷入了沉思。忽然见旁边的麦子梢头，沙沙作响。抬头一看，原来有几个社员正在用手搓生麦子吃。我立即劝说：“不要吃生的。吃下去肠胃受不了，得了浮肿病不好医的！”而他们却一点也不理会。过了一会儿，才有个社员回答道：“管球它的肿不肿啊，活起做啥子，倒不如死了好些！”

我说：“目前生活困难是暂时现象，只要大家齐心，努力搞好生产，很快会好起来的。”

有个社员马上接过去说：“啥子暂时的啊！一年比一年不如。1958 年尽肚子胀，1959 年吃半饱，1960 年吃不饱，割麦子是吃 11 两 5（一斤为 16 两），今年（1961 年）大忙时割麦子只吃 10 两多一点。日子越过越坏。去年死了很多人，今年恐怕死得更多了。再死，乡坝头恐怕没啥人做活路的了。”

我说："你们吃生的，把麦子糟蹋了，完不成包产任务要赔产的。还不是害了你们自己。"

社员们接着应声了："赔就赔，反正是不能超产的。"

"今年本来可以超产得奖，可是公社看见我们搞好了眼红，改数字，增加亩数，降低单位面积指标，从两头来卡我们。这样，随便怎样也超不了产。"

"过去几年，熟的都不想吃，哪个还吃生的？吃生的就从去年排头。"

"上级不给熟的吃，我们只有吃点生的。上级硬要在收获大忙季节拿低标准给我们吃，我们就要吃个饱肚标准才干得动活。反正吃自己劳动的，没有剥削人。"

这时，有个小家伙叫道："甘同志，你去看看：公共厕所那里面的好麦子成堆成堆的，用箩兜也装不完。这土里也有几堆呢，你来看看吧！"

其实，我早在山坡上、在各个厕所、茅坑里见到了一大堆一大堆的经肠胃而未消化的生麦子。成群的苍蝇，在这些麦子堆上面绕来绕去地飞着、爬着。就在这时，又见几个社员把麦吊上的麦粒搓下来在手上倒来倒去地吹去麦壳，一把把地往嘴里放，或者往腰间别的口袋里梭。虽一次再次苦口婆心地劝阻，还是劝阻不住。唉！它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古人所说的"民以食为天"、"饥寒起盗心"不无道理。

1961 年 5 月 19 日晚

"盗窃"之风太利害了

集体食堂逐渐解体了，很多社员在家里煮饭吃。食堂不开伙，我们工作组三人（我与于思和、李振敖）每日三餐的吃食就成了大问题。生活不落实怎样去工作、参加生产劳动呢？自己煮嘛，厨房、炊具、柴禾、时间等等都成问题。经与队上干部研究，队上决定派张大嫂来给我们煮饭，队上适当给她工分补贴。厨房、炊具就利用原来队里食堂的，柴禾、蔬菜由生产队帮助解决。米、油、盐，根据上面发给我们的定量票，自己去买、自己保管。这样，我们的生活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是，没过几天，我们厨房中的水桶、瓢瓢、锅铲、刷帚、菜刀、碗筷等等，全部被偷光了。这又威胁着我们的吃饭问题了。碗筷我们可以买，而其他的炊具就无法解决了。幸好张大嫂是个勤快、贤惠和热心的人，为了让我们能吃上羹儿，只好每顿煮羹时，把她家的锅铲、刷帚、菜刀、淘菜筲箕之类的炊具拿来给我们用。等给我们熬好了羹，再拿回去煮自己的饭。每天顿顿拿来拿去，免不了有疏忽之时。有一天，她给我们熬好了羹转身去做其他事，一时忘了把炊具拿回去，等她转来拿时，已经全部被人偷走了。她家又没有多余的，市场上也难买到，她只好这顿求东家，下顿求西家，等别人做好了吃食，再借炊具来为我们和她家做吃的。就在这时，本队有户叫张发荣的社员，刚迁来这里还来不及打灶，

便同我们临时在食堂小锅里煮饭。其妻炒菜时把小锅铲放在灶台上，刚一离开，转身来锅铲就被偷走了。

而山坡上、屋子里，粮食被偷盗的事到处发生。全大队每个小队被偷盗的粮食估计大约有三、四千斤。最近，以六小队为重点，组织人员到每户社员家里去普查了一下，发现全队 63 户人家中，有 61 户偷了麦子，有两户虽没查到，但并不能断定没有偷。据分析，只是藏得更秘密未发现而已。我到简阳不久，就先后被盗走了一件毛衣、一件绒衣、一顶呢帽、一件内衣。假如你洗了衣服晾在房外，稍不留意，一转身就会被偷走。我们每天生活已够紧张的了，身体劳累、精力疲乏，极想休息，然而，思想上还经常提心吊胆，每时每刻警防被盗。这实在是精神上的一大折磨。

偷盗既已成风，因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它也就无所谓，不是什么耻辱了。一些人讲起偷盗问题，不但不恨，反而精神大振，兴趣极浓。有个社员就这样公开讲："现在就看哪个的手长。拿得到我，算我是偷二，当坏人；拿不到我，就算我的手艺高，当好人了。"有的说："现在偷得到便吃得饱一点，穿得暖一点，是聪明的，是大哥；偷不到，便吃不饱、穿不暖，是笨蛋、傻瓜，是二哥。""现在的贼娃子，真是闭上眼睛乱摸都摸得到。"对偷盗行为，翻开中外历史典籍，无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哪个阶级上升为统治者，在道德规范上、社会舆论中，都是反对的，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现在，人们却对此漠然，甚至称赞，道德如此败坏，廉耻如此不要，不能不使人心忧！如果不加以扭转，长此以往，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然而，冷静思索，从联系的观点来看，用辩证法的方法来分析，同样是这块土地，同样是这样的人民，过去为什么不像现在这样呢？建国初期，不是还出现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好形势吗？如果没有共产风、瞎指挥等"五风"的大刮，人民被搞得那样地惨，又怎么会出现如此的道德沦丧呢？"五风"大刮，集体食堂一办，每家每户的锅儿、家具、农具等生活、生产用具被强行搜得精光，这才留下如此的后患。现在食堂不办了，社员们又回复到一家一户的生活方式，然而，什么都缺，即使有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何况缺钱呢。这怎么免得了不促使其中的一些人去偷呢？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1961 年 5 月 29 日

人民的痛苦　道德的沦丧——记怪事两桩

（一）

5 月 13 日。在土里干活，本队社员谭济德向我说："甘同志，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情况反映。请你听了不要害怕。虽是个怪事，但确是真的。"

我问："啥子事？"

他讲了以下一件事：

他们院子的谭至其有个亲戚，住在本县养马区。今年二月间，他到这里来的时候讲，与他们同住一个地方的黄某，因为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啦，竟然把自己死去的五岁大的孩子煮来吃了。群众知道此事后，将此事反映到队干部那里。队干部找他来问缘委，他说："我肚子饿了，没办法。我是吃自己死去的儿子，又不是吃别人的。"队干部拿到也没法，只是教育了他一顿，放他回去就算了。回去不久，他的胆子越来越大，附近埋了死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他都去偷来吃。本地的人不好办，就把他扭送到县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审问他时，他还是说："我是肚子饿得发慌，没有办法。"问他吃了多少个死人，他说："到现在为止，共吃了九个人的肉。"……。

（二）

有一个社员向我说，我也来讲一个真实的怪事给你听：

去年阴历八月的一天。天下着大雨，在成渝铁路边的简阳县解放公社东升管区，有一头黄牛拉着一部架子车在马路上走。雨越下越大，赶车人把黄牛解开来拴在路旁一间房子外的树下，自己躲雨去了。这时，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背着背兜，手上拿着一把刀，见黄牛边没有人，就用刀在黄牛的屁股上砍下一块肉，放在背兜里背起就跑了。车主人回来，看见黄牛屁股遭砍烂了，鲜血直流。他一边观察，一边往马路远方追去。追了一阵，并没有发现其他什么人，只见有个少年背着背兜急匆匆地往前走。车主人疑惑地问他："你背兜头有什么东西？"

少年回答："有一块羊肉。"

"哪来的？"

"姐姐给我的。"

"你姐姐住哪里？"

"……"

车主人要他拿出来看一看。少年以为遭发现了，便丢下背兜，拚命地逃跑了。车主人追不上少年，无可奈何地拣起背兜，拉上架子车，牵着流着鲜血的黄牛无可奈何地回去了。

1961 年 5 月 13 日晚

无声无息的代价

困难时期，农村不少社员得了浮肿病。患病的主要原因是“入不敷出”，即摄入的营养不足以承受劳动的付出。肚子饿了吃些生冷充饥，或喝盐水解饿。长此下去，浮肿缠身。而一般医生明知其故，却不敢说出其因；社员也不敢直说是因“吃不饱”得了此病。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无比优越的，人人有吃有穿，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哪有吃不饱之理？谁要说“吃不饱”，一定是“地、富、反、坏、右的破坏言论”。谁说这样的话，就对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既然饿肚子的话都不能讲，谁还敢谈论饿死人的事？要不，就要被打成坏分子、反革命，被置之于死地。谁敢去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呢！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农村大量饿死人的铁的事实，人们不敢公开讲，私下还是有人在悄悄议论，亲戚、朋友、知心相交，也还是要贴耳细声摆谈的。尽管上面规定此为不合法的，但是它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像地火一样在地下运行。至于死去的，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付出了代价。

全国各地到底死了多少人，我没有调查过，也不可能进行调查，因而没有发言权。由于我个人的工作地位和环境的局限，这方面的资料也不可能见到，我只能以在简阳得到的有关知情人士透露的情况，以及个人所见来说话。

困难时期，简阳县的人口由 120 万左右下降到了 80 万左右。该县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为一个联社，1958 年转公社时，人口为 2580 人，到 1962 年 11 月，六合只剩下 860 人，中和只剩下 1130 人，合计 1990 人，死去 590 人。六合大队共和生产队 1958 年转公社时为 118 人，到 1962 年 11 月份，只剩下 58 人，死去了 50％以上。杨先虎等好几家人，全部死光；张志清家 9 人，死 8 人，剩下 1 人。石盘公社新民大队支部书记夏廷江说：“1959 年到公社开会，公社布置规定每人每日吃 16 进位秤的 4 两谷子。我认为少了，回队后，按 4 两大米的标准分给了社员，被公社指责为右倾，横遭批判。而这时人口已在大量死亡。”石盘公社大石、边界两队，1958 年转公社时人口为 246 人，到 1962 年 11 月份，只剩下 132 人，死去 46.47％。主劳 80 余人，只剩下 20 余人，死去 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为 60 余人，只剩下 8 人，死去了 89.98％。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动力 40 余人，只有 2 人活着回来。普安公社人口由 12，000 人左右下降为 6900 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死了 40％以上。属于该公社管辖的，由黄连公社第五耕作区到青龙公社街上之间，有个居住 20 多户人家的大院子，人全部死光了，院子也全部被毁了；留下的仅是一个废墟，几个大粪池散布其间，边沿还有些零散的粪坑，里面残存些黑水，坑周围长满了野草；成堆的瓦砾，散布在院坝里。院子的背面，被砍光的竹林里，稀稀疏疏地长出几根小竹，在寒风中颤抖。时值早春二月，该是万物出现生机之时，可是伫立在院子侧边望去，却是一片凄凉。

养马区火盆公社第五大队新民生产队，在困难时期 20 多个主劳几乎死光，队里没有了队长和会计，生产队领导班子组建不起来，只好从别的生产队调去一个在对印度自卫反击战中脚负了伤的转业军人去当队长，以“招夫入门”的方式从外队招了一个死去女人的男子，到本队与一个死去男人的中年妇女配对作会计，这才勉强把生产队的领导班子组建起来。这个生产队剩下的尽是些老弱、妇女、儿童。缺乏男劳力搞生产，抢种抢收时节十分困难，只好通过上级统筹调派别队的劳力去支援。当时死了人，埋葬很简单，用稻草、席子裹着，绳子一捆，抬到山坡上打个土坑软埋下去就行了。由于浮肿病使劳动力丧失，有的生产队死了人还找不到人抬出去埋。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把死人抬出去埋掉就算是好事幸事了。

由于死人埋得浅，没有棺材装，就给一些活着的人钻了空子。死人刚埋下去，往往夜间就被挖了出来，身上的衣服被剥去，身上的肉被割走。在山坡上，一些新坟往往中间一个坑，前面乱稻草一堆，破布片几块，无疑，就是被偷盗了的坟墓。简阳县城边的桥上，赶场天有用土钵钵装着绵条条带黄色的熟肉片卖，其上面洒了海椒面，钵边撬着一双筷子，卖者高叫买瘟猪儿肉，三角钱一片。听社员讲，那就是在卖死人肉。还有些人摆地摊卖的旧衣服，也往往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1962 年 11 月 15 日

日记两则

（一）

1961 年，5 月 25 日。

今天在“万年食堂”背后的山坡上收割麦子，很多人都埋怨早餐的麦羹太清，分量太少。妇女队长领队负责，叫大家加油干，把山坡上的麦子在上午割完（9 个人割 20 亩左右，兼种）。而大家却在地里怨气冲天，大骂不休。

有的说：“他妈的，现在不知过的是什么日子，这样大忙的时候，越吃越少。才几天，定量就由每天 12 两（16 进制）降为 10 两，真惨！”

有的说：“过去给地主干活，干不到这么多，肚子还吃得饱饱的。现在是什么人民公社，是要人民死的公社。”

有的伤感地说：“他妈的，我们过的简直是流眼泪花的生活。拖一天算一天，拖死了事。”

（二）

1961 年 5 月 25 日。

小学放了农忙假。大点的小学生组织起来参加辅劳组，一起收割麦子；小点的由老师带领拾麦子。整个小队有 20 来个小孩拾麦子，其中有 10 多个小学生。这些孩子性子很野烈，由一个正怀孕的郑老师管辖，她怎么也管不了这帮孩子，即使声音吼哑了，这帮小学生一点也不听她的。有如说这帮小学生是在帮助拾麦子，不如说是在捣乱、破坏生产。他们在地里找老鼠洞，捕捉老鼠，说是拿回去打牙祭。他们一发现鼠洞，就刨地一尺多深、数尺宽，沿着鼠

洞延伸。发现老鼠，大家挤做一团，在地里攘来推去，把正在生长的包谷、棉花苗子踩烂很多。除了捕老鼠以外，还有一些坐成一堆堆地玩石子、泥团，往地里乱扔，或者躺在地上睡觉，或者到池塘边去玩水，等等。玩够了，也快到收工进午餐了。他们为了获得工分（拾一斤麦子得一分），才去“拾麦子”。怎么“拾”？就是到大家割下来收成堆的麦捆上，用剪刀剪下麦穗放进自己的提篮或背兜里，拿回生产队过秤、记帐、得分。个别的还恶作剧，不仅剪走了麦穗，并且用脚在麦捆上踩它几脚，让麦粒撒落在土里；还有的甚至拿镰刀或者剪刀在麦捆上乱砍乱剪，把麦穗、麦粒砍、剪到地里任人践踏；还有的剪下或者割下麦穗往家里拿。

我见他们如此作孽，心如刀铰，万分难受：社员一方面没有粮食吃，另方面又放任这些孩子如此糟蹋粮食。这些小学生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就如此这般，发展下去，长大成人后将会如何？真叫人不敢往深处想！回忆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学校离家有几里路，沿途都是庄稼。放学的时候，老师总是教育我们要爱护农作物，不要损坏庄稼。大家都听老师的话，我们成群结队地走来走去，从来不损坏庄稼；看见有倒伏在路边的庄稼，也能自觉地把它扶起来。这同眼前发生的这些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这不禁让人深思：现在把学校教育吹得高，实际又如何呢？或许这是个别现象，而且这些小娃娃不懂事图好玩，不是父母、老师所教。但愿如此，然而此风应该尽快煞住，为了集体、为了孩子、为了社会，更为了明天！

于简阳县解放公社民主大队

难忘的端午节

6 月 17 日，是阴历五月初五，传统的节日——端午节。人们以愉快的心情期待它的到来，希望能在节日期间放几天假玩玩，轻松轻松，因为过去几个月都没有按政府的规定放足假。一个月本来有四天假期，但有时只放一天，有时一天也不放。心想，节日来了，该会集中放几天假了吧；再加上平时生活很苦，节日期间，该吃点好的，诸如配给点肉、酒之类改善一下生活。不料，节日到来之前的两天下了一场大雨，把干旱的土浸透了五、六寸，正好栽红苕。这样，从阴历五月初三到初五的上午，都不放假，全部出工去抢栽红苕。我们工作组自然要带头，而且要做社员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出工，把红苕栽下去。除了少数队员有抵触情绪，说“不稀奇那点工分”，坚持去赶场外，绝大多数还是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利益去出工。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不错过时机，利用这个好天气把红苕栽下去，今冬明春的生活才有指望。红苕直栽到端午节那天午后一、二点钟，上面才宣布放假休息半天。因为已有的红苕秧栽完了，否则连这半天假也捞不到的。这两天半的突击，全队也只栽了 20 亩左右的红苕，仅占计划应栽面积的三分之一。

端午节后，又连续补栽了三天棉花。也是由于棉苗不足，还有不少棉花缺窝没有补栽上。这说明在生产上，计划管理不周，需要的红苕秧、棉花苗都不够数，栽不足也就只好拉倒算了。

栽过了红苕，补过了棉苗，大忙也就算结束了，该放两天假让社员歇口气了吧，谁知上面又来了指示：这几天一律不放假。结果社员意见很大，可以说是怨声载道了。不少社员根本不理这套，自己放假玩去了；即使勉强出工的，在土里也是"拿着锄头把摸脉"，磨洋工，工作进展很差。过端午节，政府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街上的居民，农村的社员都配给了一定数量的面、糖、酒、糯米、肉等食品，我们所在生产队的事务长谭公泽按规定上街把社员的供应买了回来分发给社员了，而我们工作组的三个人，却什么供应也没有，被晾在一边没人管。我们回到宿舍，彼此安慰几句，然而越想越心酸，深感这不是滋味。李振敖同志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一些好心的社员知道此事后，腾出自己不多的供应端给我们尝尝。

为什么过节不给我们供应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说是，主管我们的单位把我们忘了，造成了漏报；再说是，供应的物资少，不够分，先满足当地，中央来的由中央去解决吧。

还有就是，整社工作团这时已七零八落了。有的得了浮肿病回原单位医治去了；有的家里来电称其父母病重请假返家探望去了，等等。请假离团的不少，组织又不健全。团一级的负责人驻在县城，中队一级负责人驻在区里，小队一级负责人也驻在公社，他们享受着驻在地干部的同等待遇，生活落实，只顾自己，哪还管生活在社员之中的工作组的事。至于工作团、工作队、工作组的威望，也不如初来时高了。开初，群众听说中央工作团、工作组是毛主席亲自派来解决问题的，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很尊重工作团、工作组，并积极反映情况。后来，他们渐渐看到，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就在这时，工作团的负责人又公开强调，要以地方干部为主来解决一切问题，而群众恰恰对过去贯彻极左那一套的地方干部意见又很大，很恨他们，希望中央工作团、工作组站在公正的立场解决一些问题。由于地方干部得势，甚至连中央工作组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问题，都需要地方干部解决，包括随身带走的工资关系，也要由地方来发（我在北京中科院，每月工资是 56 元，到了简阳，由简阳按地方干部待遇发，每月 48 元，即当地所谓"鸭干部"　）。这时，不少人把我们看作是"下放干部"、"下放地方劳动的干部"，甚至说是"中央机关丢下来的包袱"、"增加了地方的负担"等等。在这种气候下，端午节不供给驻队工作组节日食品，不同地方干部一视同仁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工作组三人始终不服这口气，经过几番周折，找有关部门据理力争，尽管他们拖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还是照地方干部的同等待遇，补给了我们端午节的供应了。

1961 年 6 月 18 日

意外的收获

下雨给我们和广大社员带来了很大的灾害，把人们打入了闷葫芦。可是，很偶然，我们工作组三人却突然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由于端午节受了窝囊气，再加之下雨，呆在屋里很苦闷，我们工作组三人昨天（6 月 28 日）

下午相邀共同去沱江边去看正在上涨的洪水。出了院子走向江边。刚走出门两百多米的地方，看见大路边棉花地的水沟里翻起了滚滚波浪。这仅有三、四尺宽，一尺多深的水里竟然出现浊浪翻腾的奇异现象，肯定沟里一定有什么大的水生物在里面，它绝不会是蛇虫蚂虾之类的东西，很可能是条大鱼。于思和、李正敖二人也同意我的这个分析。大家高兴地想把它弄起来，可是，于、李都是北方人，属于“旱鸭子”，望着水沟不敢行动。我便自告奋勇地脱掉雨靴、挽起袖子、卷起裤脚，下了水沟。在这一条长长的水沟中，我同水沟里的大鱼搏了几个回合。看来鱼累了，而我的裤子、衣服也打湿了，满脸全是水。此时，我顾不了这么多了，一心想把鱼捉住，捉不住决不罢休。于是我把鱼赶到水沟的尽头，用身子拦住鱼，两手抱住它，奋力将它抛到地里，然后按住它，把它牢牢地捉住。啊！好大一条鲤鱼！拿回住地用秤一称，竟重三斤十二两！放在大水桶里，它只能弯曲着身子。第二天，我们三人痛痛快快地用它改善了一下生活。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对我们端午节的补偿。端午节，社员、地方干部家家户户都改善生活，有的还吃上自养的鸡、兔、鸭肉，而我们三人却什么都没有。现在吃上自己捉到的大鲤鱼，而且平均一人一斤多鱼肉，这顿牙祭可谓丰盛了，它补上了端午节的遗憾，真是意外的收获啊！

1961 年 6 月 29 日

一场大雨后的悲欢

从六月中旬开始到七月初，接连下了半个多月的雨。这场雨时大时小，时断时续，但总算是一场大雨。端午节（17 日）前三天下的雨，已把干焦焦的土浸透了五、六寸，栽的红苕可以百分之百地成活了。节后雨又接连地下，到月底，雨量还很大，沱江猛涨洪水。28 日水位最高，如果再上涨两三公尺，江岸边的第五生产队就会被淹没。这场大雨，给当地广大社员群众带来了不寻常的悲欢。

先谈谈“欢”。在这场大雨之前，遇到严重的夏旱，久晴不雨，把早、中包谷，早熟作物，自留地作物以及食堂种的瓜菜等晒死过半。如果再不下雨，不但已经种下的作物会大大歉收，而且连红苕秧也栽不下去。大家心里非常焦急，一方面积极到沱江去担水抗旱，另方面盼望天老爷开恩下雨，有的社员盼出了泪花。

雨，果然下了。头三天便很大，救活了濒于晒死的庄稼，又让社员栽上了大量的红苕。这次下雨，等于救了社员群众的命。有的社员说：“这场雨是下的救命雨。”无怪乎他们在抢栽红苕秧时是那样喜笑颜开，十分欢欣。

再谈谈“悲”。可以说，这场大雨给广大社员带来的悲大于欢——

一则，沱江的洪水猛涨，淹没了江边很多的农作物，冲走了大片大片的沙地，使社员辛辛苦苦种的这部分庄稼颗粒无收。

二则，山洪暴发、水土流失，冲走了不少坡地，冲跑了堰塘养的鱼。由于转入人民公社后，打破了地界，小土变大土，原来修的地沟被踏平，山洪一来，不能依势顺畅而过，满坡横溢，在地里乱流，沙石泥水俱下，冲坏了不少庄稼。泥沙、石头和禾苗裹在一起，到处成堆堆，土质也遭受了破坏。

三则，低洼地种的作物，又被水涝，涝坏了不少庄稼。

四则，房屋普遍漏雨，不少房屋还倒塌了，砸死了人。本区砸伤的人还不算，单是砸死了的已有 27 人。房屋为什么普遍漏雨，甚至还倒塌呢？表面看来是自然灾害，细加研究，归根到底，主要还是人为的灾害。1958 年大跃进以来，由于瞎指挥生产，在当地掀起了打老墙的运动。上面说，土墙房子的墙泥最肥土，用去种包谷等作物，可以获得高产。于是，在上级派来干部的监督指挥下，遇到多年一点的土墙房子，便强行把墙挖了。房子盖架如果还是完整的，就用一些乱石来砌着，把房瓴搁在上面。这样的住房，遇上大风大雨，自然就会倒塌。还有，就是推广烧火温床育苗，没有燃料，就把社员的房子木料拆一部分去作燃料，房子用一些棒料衬着，极不稳固，一遇风雨怎不倒塌？再有，转入公社后，拆毁大量房屋，准备集中修居民点。房子拆了，但居民点却又未修成。没有住房的社员只好自己搭草棚，搞简易房子住。这样的房子，当然也抵挡不住大风大雨了。在大雨停时，我曾到附近各院子遛了一趟，了解情况，差不多每个院子都有几户塌房。就是我们住的院子里，也塌了三家。李淑华家的住房塌了，家人无处安身，只好临时借住别人家。

27 日晚，长时间的大雨，社员们的屋子里，水浸如河，一般被淹深达三、四寸到一尺左右，最深的深达两尺。社员家中的不少衣著和用具被泡胀和淹坏。从 27 日晚上到第二天中午，很多社员家开不起伙，无法烧锅煮饭，哭骂之声四起。他们破口大骂那些破坏他们住房、损害他们利益的人。有的把嗓子骂嘶哑了，还不停地骂；个别人气愤不过，竟然把挂在墙壁上的伟大像撕了下来，扯得粉碎，扔进了茅坑。

“万年食堂”的厨房，由于房顶漏雨，地面上泥水横溢，也流进了不少的浑水，炊事员进不了屋，不忍心我们工作组三人挨饿（这时集体食堂已经下放，生产队指定一名社员在食堂专门为工作组煮饭），只得到一家地势住得高、厨房地面没有进水的社员家中商量，搞了点羹给我们吃。食堂保管室的屋顶到处漏雨，把箱箱柜柜、灶头淹了半截。幸好食堂已经下放，箱柜中早已空荡了，这才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室内有个装了半坛泡盐菜的泡菜缸子，被水冲起来东歪西倒的，脏水灌了进去。正是：“大缸泡盐菜，洪水泡大缸；洪水漫进缸，盐菜全弄脏”。这坛留给我们工作组吃的下饭菜，无论如何不能享用了。天老爷和着某些人，一齐在我们处于困境中如此捉弄我们，真让人叫苦不迭！

食堂的大餐厅更为“壮观”：顶上有十几处大洞，雨漏如注。长时间下雨，原来漆成朱红色的大柱有似在享受淋浴，雨水成串从上往下倾泄。水流过的地方，很快长出了不少的白色霉菌来。餐厅地面上，积了一尺多深的污水，水面上浮着麦糠之类的渣滓、垃圾，真可以划船了。

我们工作组三人住的那间厢房，大约有十五、六平方米，室内安放了三张床、两张方桌、七口箱子。这次下雨，也深罹其难。整个室内有十一处漏雨。我睡的床位，四股水直指下倾。泥土糊的、石灰涂的墙壁被水泡胀，泥渣接连往床上垮，我用自己的一张大油布拿来挡雨，

也无济于事，只好搬到另一间涝屋（文娱室）的乒乓台去栖身。27 日晚上，也几处漏雨，室内进水七、八寸深。幸好我睡的台子高，把台子往漏雨少的地方挪，才艰难地度过了这雨难之夜。而布鞋却逃不脱噩运，被水泡透就像两只沉没在水底的小船一样，任水冲击，根本无法穿了。我只得赤着脚，把裤筒卷得高高的，在水里趟来趟去。屋下如此，屋顶也不饶人。由于年久失修，屋顶多处浸水，雨点从瓦缝挟裹着积留在瓦棱上的黑尘，大点大点地往下滴。滴在被子上，嘀嗒作声，初像胡豆大小，渐渐扩散，不一会儿就变成小酒杯大小的黑黄印渍。我只好用一大块油布搭在被子面上，那大雨点把油布打得啪啪作响；雨点恣肆横行，向人的身上、脸上、头上打来，在人身上留下黑黄的斑点。整个晚上，我们都无法入睡，全靠手电筒照明来同大雨周旋。身处此境，对“长夜难熬”获得了直观的、真切的体验。我们的行李、书箱，由于放得高，只是被雨打湿而还没有被水淹坏。尽管潮湿，待天晴翻晒，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损失。房屋为什么会如此普遍严重漏雨？这是因为大跃进这几年来，工匠、劳动力统一调配去干其他事情去了，屋顶根本没有得到翻盖过，漏眼也得不到拣补。不仅如此，反而在收获之时，为了防止偷盗，把土里收回来的麦子、胡豆、豌豆等等和秆子一起，直接搬到屋顶上去晒，晒干了再搬下来在场子里脱粒。几经这么踩踏，房顶的瓦块被踏破了很多，所以，一遇下雨便到处渗漏。人们会这样想这样问：为什么不及时维修和把它补好呢？在正常的情况下，的确应该如此。可是在这么个年头，谈何容易！原来农村的盖瓦匠、泥水匠，有的调走去干别的事情去了；有的已饿死了。到这时，本地连“种子”都找不到一个了。社员都是自己上屋顶拣漏眼，因瓦片损坏太多，拉东补西，取这填那，怎么也不够用，只有让它漏着。一遇下雨，最多把自己的床铺、衣柜、灶房的铁锅上面翻盖好，不使漏雨外，其他地方就无能为力了，只好让它漏去。

我们工作组的住房，在雨前雨后曾多次向队上反映，要求派人修理，就因为上述原因，一直没有解决。我们只得借梯子来自己上房去修。上了房顶只见瓦塌、瓴木已经腐朽，很危险，怕出事故，不敢在屋顶上走，只有用棍子从远处慢慢地拗，移动瓦匹盖住一些小的漏眼，大漏眼就没法堵了。拖了很久，队长不知从什么地方请了一位盖瓦匠，弄了些破旧瓦来，才上屋顶把大漏眼补好，解决了我们居住的忧虑。这场大雨，使我对以下问题有了深刻的体会：

一、“人定胜天”作为口号是可以那么喊，也可以作为歌来唱的，但在现实条件下，决不能作为指导思想去指导行动，否则将事与愿违。

二、无论什么都是有其限度的，要恰如其分、适可而止，不要超过限度，否则，将造成危害。这场大雨在端午节前三天的下雨量已经解决问题了，节后又再下十多天的雨，这就完全超过了限度，是多余的了，以致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损失，给社员的生活带来很大的痛苦。

三、这场大雨带来的灾难，从直观方面来看，是自然灾害，但从联系、辩证的观点来看，主要是人为的灾害。如果不是人为的灾害，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就不会那么大，群众的抗灾能力也不会如此软弱。

四、我们这一代人亲眼所见的是，左倾错误带来的损失比右倾错误带来的损失大。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右倾和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全党范围内批判很多同志的右倾思想都批错了。有些人站在极左的立场上，把本来就是正确的东西，当成右的来批判，把本来就是错误的左的东西，说成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东西。是与非、正确与谬误现在被颠倒了，难以说清。在我们国家里，现在就缺少一个比“伟大”还要伟大，比“最高”还要高、比“正确”还要正确而公正的裁判官。我想，历史的真相总有一天是会大白于天下的。

五、再好的东西，只要是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支持，迟早是要被否定的。比如，把家家户户的锅儿搜抄来砸烂了炼钢铁；强行成立集体食堂，把集体食堂吹成是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提出只准办好，不准办坏，谁要是对集体食堂有意见，谁就是坏人、是在搞破坏，就要进行批判斗争等等。当集体食堂表面上富丽堂皇，里面却无米下锅、无柴进灶时，社员收工后有的从三、四里甚至五、六里外的路程，拿着盆盆钵钵到食堂打不到饭，端回去的却是照得出人影的寡亮清汤、冷冰冰的羹汤；有时天雨路滑，跌了跤子，倒在路上，而一家人饿着肚子、眼鼓鼓地为没有吃、喝的哭在一起、悲声四起、骂声载道之时，集体食堂便从此夭折了。集体食堂的垮台，它只是一个信号，一个预兆而已："心脏"既然死去，躯壳——人民公社岂能活得长久？一切极左的产物，一切违背群众意愿的东西，包括不受群众拥护、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制度，都将会一个一个地被历史的进程所否定。

1961 年 7 月 3 日

自办伙食

随着集体食堂的停办，粮食下户，柴禾下户，毛猪下放，食堂的服务人员也决定一个不留，全部转向农业生产。这样，原来留下为我们煮饭的一个炊事员也回家干自家的事和从事农业生产，再不给我们煮饭了。李振敖同志很想不通，称病卧床不起，我与于思和同志一起商量，为了生存，我们只有自己来办伙食了；认为，煮饭没有什么了不起，自办伙食难不倒我们。今天（7 月 16 日），我和于思和一道进城到红塔粮站，买计划供应的粮油。由于沱江涨水，只有一只利用钟摆原理设置的木船渡江，每次定员开船，两岸等候渡江的人很多。为了早点办好事情，我们睡不着觉，早上五点就起床到江边，直等到 11 点半才过了江。进城办好事后，我按供应计划买到 10 斤大米、20 斤土粉，背在背上，又到江边候船过江，到下午四点才回到住地。于思和进城后，称自己有私事要办理（去找人谈事），他负责买的 10 斤米和打的油，由他自己拿回来，就没有与我同行了。我回到住地后，见于思和还没有回来，便放下粮食返回江边去接于思和。接回于思和后，我们两人跑了一天，早就感到很累了，但因农村的老鼠多，怕我们的这点口粮遭老鼠糟蹋，便又拖着疲乏的身子去找盛粮食的东西。这时心想，如果李振敖懂事，已经休息了一天，该主动和我与于思和一起去找装粮食的器具。然而，他却根本不动，继续耍无赖，只好由我和于思和去跑了。跑了好几家，好不容易才在第一生产队保管室借到一个柜子。抬回来后，由于里面太脏，有老鼠屎和蜘蛛网之类的脏物，在很累的情况下，我们又去社员家里借搭钩、扁担、水桶，担水来刷洗。直到把柜子收拾干净，放好了粮油，最后才去做饭吃。自己开伙，饭怎么煮呢？我们三人研究决定：每人负责一周，轮流煮饭；每顿三人定量相同，分份吃；使用公用碗分份，煮饭的人让未煮饭的人先端，然后再把份内的倒入自己的餐具中吃。公用餐炊具由煮饭的人洗，自用餐具自己洗。负责煮饭的人在参加劳动时，可以提前一小时回去。（以下为补记：我们三人，就是这样在民主大队二生产队谭家院子坚持了近半年。于年底，才根据上级的分配，各自离开。于思和比我先走，

他是申请经批准后回自己老家的。临走时，我们把他送到了江边）。

1961 年 7 月于谭家院子

县委召开全体下放干部会议——中国科学院慰问团来到简阳

简阳县委发出通知：8 月 29 日下午，整社工作团全体下放干部，到县委招待所报到开会。会议于 8 月 30 日开始，到 9 月 2 日止共四天.会上听取了内江地委副书记兼简阳县委书记张政委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用简单的几句话对整社工作团的干部表示慰问，肯定了工作成绩，然后转入正题：讲了全国、本省和本县的形势，讲了大家特别关心的粮食情况，回答了同志们提出的有关问题。

这次会议，在生活上照顾颇好，能敞开肚子吃饭，菜也有了油水，还打了牙祭。比起在生产队自己煮、经常吃少量的米加混土麦面煮的羹好多了，因此，普遍感到满意。听完报告后，大家总结了工作，检查了缺点，并保证今后要安下心来，坚持到下放两年整社期满为止，表示要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同广大社员群众一道，为扭转农村形势、解决粮食过关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正当 9 月 2 日下午会议快结束准备返队时，忽又得通知：会后大家不要回队去了，科学院的慰问团来简阳慰问你们来了，你们还要继续开会。闻听这一喜讯，大家非常高兴，于是都留了下来。9 月 3 日，安排大家休息一天，慰问团代表与有关方面接触，搜集了解情况，研究会议开法，决定 9 月 4 日开会。

会上，慰问团首先说明了来意，向大家表示慰问，然后简要报告了国际国内形势、北京的情况等等。报告中，根据大家提的意见，讲了我们的所属关系和工作关系问题，特别是工作分配方面的问题。明确了：在所属关系上，既然是下放整社干部，现在基本上属于原单位，不属地方；在工作关系方面，现在应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两年下放期满，在分配上，鉴于北京中央机构在精简，人员在压缩，情况已发生了变化，除自己愿意回原单位，原单位又需要而同意回去的可以回去外，其余的实行重新分配。由于大家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吃了大苦、耐了大劳，在分配时要尽量照顾专业和志愿、照顾家庭和夫妻关系等。报告听完，开展了讨论。

同志们在讨论发言中，有个共同的特点：外省来的，表示重新分配时，决不留在四川工作，要求回本籍或到东北、新疆等边远地区工作；四川籍的愿意留在四川，但要求照顾家庭和夫妻关系、照顾专业，分到别的地方去，不愿意留在简阳工作；没有牵挂的年轻人，很多都想离开四川，到别的省份甚至到边远省份去工作。

在北京组团下来之前，完全是采取自愿选择的原则。中科院建立一个团是到四川，但是，中科院的人，有些自愿到其他省里去了。比如，我们近代史研究所三人中，就有两人到青海等地。待工作团到四川后，我们接触到很多人不是中科院的，有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地质

部等单位的人，但是，绝大多数还是中科院各研究所的人。

在建团下放时，这些人为什么要选择到四川来呢？在暴露思想中，他们当时想：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是粮仓之地。虽然国家困难，但到四川农村生活，吃饭问题是不必愁的。还有，听说四川是江南风光，山青水秀竹林翠，一年四季常青，风景优美，想借此机会来看看。山东、河南、河北的人，除了上述思想外，还想到：民主革命全国胜利前后，这些省份有大量南下干部入川，听说这些人差不多都当上了区、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把家也安在了四川。自己到四川后，可以得到先入川的老乡们的帮助，向他们学习，也把家安在四川，等等。可是，来到四川八个多月的亲身体会，情况并非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好。碰到的很多实际问题，自己根本无能为力解决，特别是对四川现行的一些政策很不满意。他们说：尽管四川有灾害，生产的粮食也不少，为什么定量比全国各省都低，让那么多人得了浮肿病饿死？有的批评四川的领导浮夸风太严重了，向中央虚报了粮食产量，让四川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对大量粮食外调，支援别的地区，他们不认为是共产主义风格高、对国家贡献大，而是不老实造成的。有的甚至说："李井泉能当上西南局书记，是拿四川的粮食换来的，是拿四川千千万万的人命换来的。""他只要自己的官，不要老百姓的命，所以我们不愿意在这样的鬼地方工作。"

同志们听到本地社员群众反映，四川省委农工部夏勇部长，1958 年以来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他很实事求是，主持正义，反对刮"五风"，反对打人骂人，反对瞎指挥生产，反对无止境地苦战夜战，反对扣饭罚款，等等，群众很欢迎他。他下到基层到一个地方，群众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他讲话大家都拥护，鼓掌欢迎，把他称为"夏青天"。这样的好干部，却反而被李井泉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他的官，贬其下放到简阳禾丰区落后地带农村一个土墙茅草棚里住着，进行监督劳动改造。对此，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很是同情。而对当时大刮"五风"、破坏性大、打骂群众、作恶多端的人，在纠正"五风"中被揭发出来，民愤极大，要求处理的雷光银、吴必渊等人，上面却进行包庇，认为情有可原、出发点是好的，而不加处分。在下面难于对群众作解释工作，感到这个地方是非不分，上下都有问题，因而也不愿意在四川，想分配时调到别的省去。有的同志认为，四川人口多，耕地少，地势高低不平，难以实行机械化，将来发展前途不大，因而也不愿意留在四川工作。

上述的种种说法，不一定都对，认识也不一定都正确，但确实是谈的真实思想，说的是实在话。

人们的经历不一样，因而处世哲学也不一样。有些同志平时对一些问题意见也大，思想上也不愿意留在四川工作，但怕得罪人，就是不公开谈出上述意见，而只是强调自己不适应四川的气候，不习惯四川的风俗，语言不通等与时局无关、与政治不沾边的理由，要求分配时照顾自己的这些"实际"，分到其他地方，或者分回原籍去。以上这些意见，都给慰问团的代表作了反映。会议当天结束。

1961 年 9 月 5 日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四川简阳县农村，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我们看来，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㈠在组织机构和经营管理上，还跟不上“六十条”逐步贯彻之后所引起的新变化的要求。中央规定，公社本身是公社、生产队两级所有制（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但目前这里却存在公社、管区、大队、生产队四级机构。在执行国家政策、贯彻上级指示等方面，逐层下贯，不但拖长了时间，而且在内容上层层打折扣。作为生产单位的生产队，有了什么问题也要逐层请示，逐层研究，逐层下达，然后才能最后解决。在机构层次多的情况下，形成组织庞大、人浮于事，会议多、报表多，各层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都到生产队指挥生产，使生产队一级无所适从，给工作造成很多困难。

在经营管理上，生产队一级在制定劳动定额、全面管理、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认真实行经济核算等方面作得很不够。会计人员把绝大部分精力耗费在计算分配口粮方面。有的会计一个月有 17 天在外面开会、打算盘计算分配，而却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用于加强管理生产方面。计算分配的问题非常复杂，从作物播种下地估产就开始计算，一直算到作物收割之后还算不清。各种作物的产量、产值，以及种的满山青等等，有各种不同的比例，分配有很多“开”。开始，对产量估得很高，以后往往算一次调整一次；“比例”、“开”也随之变化多端。这些，不但社员搞不清楚，就是一些大队、小队的干部也搞不清楚。搞繁琐哲学十分严重。有的生产队人平分 20 多斤粮食，算了十多次，分了十多次，每次算给社员 1 斤到两斤，前后分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分完，十分零碎。

㈡服从国家计划与因地制宜种植作物的矛盾，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在我们所驻的“解放”与“长征”两个管区地带，过去长期是种甘蔗，制红糖、白糖和冰糖，远近驰名。当地农民有丰富的种甘蔗的经验，并保留下来不少这方面的工具。他们说，种植甘蔗，有柴烧，有牛饲料，而且产量高，每亩常年可产万余斤，并可保持河坝边的土壤，不让流失。自从按上级指示改种棉花以后，连续三年被水淹了未获收成，甚至连肥沃的河坝土还被大水冲走。“解放”、“长征”两个管区，近三年被水冲走的土地达 1800 余亩。从因地制宜来讲，本应种植甘蔗为宜，但为了服从计划，则硬性规定要种棉花，群众对此很有意见。在耕作技术上，由于肥料和劳力不足，上面要求实行“八尺开箱”，搞“条播”等办法，群众的抵触情绪也很大。

㈢在社员群众的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

首先，是住房问题。1958 年大跃进以来，上级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迫群众打了很多土墙，造成很多房屋倒塌；还存者也多破烂不堪，而又往往以草类作房壁房盖，不避风雨。一遇大雨，屋里便漏水成灾。今年四月份下了一次暴雨，红塔区因房屋倒塌就压死了 20 多人。

其次，对一些病人、孤寡老人、孕妇等的照顾极差。给他们配上一点东西，手续特别复杂。如妇女生了孩子，按规定要配 20 斤大米。要买到它，必须经过小队长、大队长、管区领导、粮食干部、粮站等环节签字盖章后，还要跑上几十里路才能买上。真是卡得太严太死了。

再次，物价高得特别惊人，群众莫不叫苦连天。简阳县的国营企业向自由市场的黑市价看齐，

甚至还有过之。如简阳县的各个国营饭店（包括简阳旅馆）卖的鸡、鸭、鹅、牛肉，每斤定价为 12 元，比自由市场贵一半左右。县食品公司，每斤成本为 5～6 角的点心，插上“高级点心”的牌子，就卖 4.80 元一斤。一般国家干部和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仅 30 元左右，在简阳县城的饭店只能买上两斤半肉吃。这种严重的情况，大大影响了群众的生活与个人同国家的关系。另外，这里的一些干部对群众的疾苦是关心不够的。区、公社召集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开会，睡的是不避风寒的湿地，吃也不能吃饱。开会时肚子很饿，一个个蜷缩成一团，咳嗽不断。区、社领导人作报告还大发雷霆、刮胡子，动辄乱训斥一顿。

有的社员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情况下，把自留地种好了，拿点菜到自由市场去卖，以作治病用度，这也被批判为“自发势力”、“资本主义倾向”等等。

㈣干部的作风还存在不少问题。在贯彻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方面，普遍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有的区、社领导干部在大会上对群众公开讲：“说我左也莫来头”，“总有一天要反你的右倾”。这个地方，上级对下级、干部对群众，民主作风很差，贯彻工作多采用“压”的办法，很少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管区、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学习政策的风气不够，因而不能向群众正确宣传、解释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进行断章取义、片面理解。在贯彻执行政策时，多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强行硬贯。当前在部分干部中，自发势力、资本主义思想有抬头的现象。如解放管理区民主大队有个大队长，就不好好领导社员搞生产，经常热衷于做投机生意，搞转手买卖。干部的浮夸风、形式主义仍然严重。如在耕作技术上，对铁路、公路边的农作物，强调搞“八尺开箱”，进行“条播”，主要为了好看。简阳县城很多商店的商品摆得整整齐齐，但不卖。顾客去问，售货员以“样品”回答了事。商业部门购物，开“后门”之风极盛。党政不分的情况严重。党对行政、上级对下级的业务工作，常常包办代替。这个地方，大至向群众传达上级文件、作报告，小至讲一般问题、批条子、打条子、签字盖章，等等，差不多都是书记包办。我们到了几个公社，见到的情况都是如此。

1961 年 10 月

忧国忧民记时弊

最近到处奔走，由于农村道路崎岖、坎坷不平，偶不小心，扭伤了脚，剧痛难忍，不得不请几天假休息。一静下来，翻看报纸，感慨多端，思绪万千，忧国忧民，情不自禁，便提起笔，聊记所见时弊，以作备忘之录。

关于实事求是

现在，又在大力提倡实事求是这个问题，要求干部“如实反应情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等等。这是个好现象。广大人民莫不高兴。但是不说老实话的人，始终还是不说老实话。他们的宗旨是，要求别人说老实话，而自己则说欺骗话。在一些细小的地方、细小的问题上不说了，就是在一些大问题、原则问题上，至今还在欺骗人民群众。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如：

㈠近两三年来无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都显著地下降了，可是报刊上仍在闭着眼睛说瞎话，什么“生产蒸蒸日上，生活逐年提高”，现在仍在“大跃进”和“持续跃进”等等。

㈡有不少地方土地成片荒废，人口、牲畜大量死亡，主要原因是粮食连年歉收，农村人口生活无着。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为，这是在农村大刮“五风”，人为的灾害造成的，而偏偏把这个责任推给客观，硬说是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竟至连主次都不分，这哪里有实事求是精神？

㈢最近在普查人口，搞得神神秘秘、鬼鬼祟祟，有些单位制造假数字，报喜不报忧，不反映真实情况。搞一阵人口普查，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根本不公布，连一些国家的主人翁都不知道。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认为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些撒谎说假话的人，能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恐怕历史和人民群众是不会承认的。

关于历史的真实性

前代的古人，后代的子孙，和我们这一代活着的人，谁都料想不到，在中国要出现这一段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痛苦的历史。凡是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有感情、有良心的人，一想起心里就难过，情不自禁地要掉下眼泪来。经过的很多辛酸事，就会一幕一幕地历历浮现在眼前，悲楚万分。这就是 1958 年以来这几年的历史。这段历史的黑暗面，将来要想在报刊上、图书资料上，找到点反映出历史本来面目的资料，给写历史的人参考，从眼前的情况来看是万万不能的。因为这段时间的报刊杂志，完全歪曲了历史的真实性，说的都是假话。在“舆论要一律”、“宣传有纪律”的严格要求下，无论什么刊物，都是转载社论，定下基调，辗转相抄，鹦鹉学舌，异口同声，随声附和。无论什么刊物上面登载的，总是热热闹闹地宣传“大跃进”、“大生产”、“大胜利”、“伟大成绩”、“达到史无前例水平”等等之类。但是，宣传归

宣传，舆论归舆论，历史本身却与此相反。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大后退、大破坏、大逆不道。任尔说得天花乱坠，但也有一点是掩盖不了的，那就是一些报刊和行文用的纸张，比正常年景揩屁股用的手纸还差。这又作何解释呢？

生产力的大破坏

在“三面红旗高高飘扬”下，在“大跃进”、“持续跃进”的阵阵浪声中，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向大自然开战”的呐喊声里，我们来看看它给生产力带来的破坏性有多么严重。

可以说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

这次破坏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社会动乱的破坏不同，它是集中全面、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而且，它是从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起决定性作用的劳动力的破坏开始的。

㈠劳动力的破坏

劳动力的破坏大致情况是这样：在 1958 年大跃进中，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以县、乡、村为单位，强迫其集中起来实行“三化”，即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所谓组织军事化，就是把劳动力按军队的编制，编成班、排、连、营、团、师……完全和军队一样，配以各级长官，规定军纪，成立指挥部，施以军令、军法。如果谁不服从或违背军纪，就实行打骂。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集体劳动、集体吃饭、集体睡觉。以劳动的地方为转移，当时实行“大兵团作战”，在什么地方劳动，就在什么地方吃饭、睡觉和休息。由于农业劳动是在野外山坡或田土里进行，所以提出了“田间劳动、田间吃饭和田间住宿”的口号。在劳动的田间“安营扎寨”，成立了田间的连部、营部、团部、师部等等。劳动的一切行动，由田间司令部或指挥部统一下达命令。男男女女，都驻扎在营房。有的妇女还背上刚生下不久的奶娃娃一起露宿营地。这样的娃娃，由于母亲的过度疲劳，加之人多拥挤不堪，不是因哺乳不好遭拖死，就是睡着了被压死。这时的劳动强度特别大，深翻土地 2～3 尺，有的要求 4～5 尺深。每人每日要求深翻面积 5～8 分，甚至一亩左右。除了白天劳动以外，夜间还要加班苦战。几时休息，几时睡觉，开初还有规定，由于指标订得高，任务完不成，就逐渐地搞连续苦战、夜战。由于阴阳不分，人的精力耗尽，在连续苦战中，眼睛渐渐睁不开了，头不断往下坠，坚持不了多久，便一头倒在地上睡着了，如死一般。这些劳动力也就这样渐渐地患了风湿症、浮肿病等。所谓行动战斗化，就是一切行动只要上级号令一下，就像在战场上打仗一样，行动要做到非常迅速、紧张、猛勇。搞农田水利建设、挖堰塘、担土、翻土，要求一个紧跟一个，不得掉队偷懒，并且要表现轻轻松松的样子、面带笑容，以表示对胜利充满信心。旁边有首长督战，不时有巡回的啦啦队呐喊鼓动。工地上红旗似海，迎风招展，四周的高音喇叭或手持话筒在不断地表扬“好人好事”，频传“捷报”。而在夜战中，却是另外一派景象：用竹筒装进棉花，灌以植物油，或以纸条编成“草鞋板”，用竹棒撑着浸饱植

物油，插在土中，或用部分人握着点上火，以作工地照明。照得田野十分明亮。远望，宛若密布大地的繁星。而白天一到，看见田间一滩一摊的油。农村社员对此疾首痛心，很是难过，深感太浪费了：“我们平时吃的油都少得很，现在却到处是油。真是败家子！”这是社员触景生情的感叹之词。

这种夜以继日的苦战，数月之后，人们的身体就垮了：筋骨疼痛、浑身无力、手脚皮肤破烂，湿气病、浮肿病发生了。广大妇女由于和男人一样光脚下田，在严寒冬天、打霜下雪也进行劳动，身体受到极大摧残，连月不来月经，面黄肌瘦，体质脆弱，出现小产、流产、子宫脱垂，浮肿病也随之出现了。

以上现象出现以后，虽有一些休整，但劳动方式并没有改变，1959～1960 年，在“持续跃进”的号召下继续着。这个时期，同 1958 年比，如果说有所不同，就是生活下降了。1958 年尽管劳累，但饭还是可以让你吃饱的。当时在有些集体食堂的大门口，曾经贴上这样的对联：

鼓足干劲生产

敞开肚子吃饭

横批：“吃饭不要钱”或“共产主义好”。

从 1959 年开始，便逐渐降低了粮食标准和供应。在一些二类地区，曾有两斤豌豆吃六天，或者三两米吃一天的。由于自留地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名义全部收缴归公，家家户户的铁锅被没收去砸烂了大炼钢铁，不准私人在家里开伙，只准在集体食堂吃饭。本来，每个人的供应已经够少了，再加上有些基层干部多吃多占、食堂工作人员揩油贪污，广大社员群众的生活就愈来愈困难、浮肿病频发，不能支持干活。干部便以食堂作手段规定：不劳动者不给食，不出工的就扣饭。社员生活不下去，就去搞小偷小摸，偷集体（公家）的东西。被干部抓到了就严加拷打，进行罚款、抄家等等。这实质是进行残酷的统治。

1959～1960 年中，广大农村劳动力因生活不落实，缺乏营养而得浮肿病死亡的比比皆是，不计其数。在简阳县农村，可以说队队有之，院院有之，户户有之。一个生产队往往死去数十人，一个大队往往死去数百人。农村的医疗设施差，医务人员少，几乎所有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动员起来，都医治不赢，无济于事，难以抢救那些生命垂危的社员，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社员痛苦地死去。例如，简阳县平泉区有一个生产队，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时 40 多个主要劳动力，到 1961 年只剩下 3 个。红塔区黄连公社是二类地区，该公社五耕作区六小队死的人占全队人口的 47%。禾丰区青龙公社 1958 年转社时，人口为 11000 余人，到 1961 年底只有 7000 人左右。

这样一来，农村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就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损失、大破坏。

㈡生产工具的大破坏

与劳动力遭到大破坏的同时，生产工具也遭到史无前例的大破坏。破坏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大刮共产风，打乱所有制，以集体名义乱拿社员的生产工具。许多农具，如犁、耙、风车、砻子、锄头、粪桶、扁担、挞斗、围席、柜子、石磨等等，凡是生产上能用的东西，不管是何人的，只要“集体”认为需要，只要知道哪家哪里有，便直接去拿来用。一用就不还，随用随丢，任何人不得干涉，不敢说个“不”字。如有顾惜的表示，或未给拿者以便利，便会被扣上“右倾保守”、“留恋私有制”、“对大跃进不满”等大帽子，推到大会上去“辩论”，即是遭批判、挨斗争。此后，政治上就抬不起头，处处受打击。这样一来，农村里的家家户户免不了遭受洗劫，祖祖辈辈、一代一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大小型生产工具，便被搜抄，损失殆尽。

2.搜抄来的工具在大兵团作战的工地上，无人专管，任其乱扯乱丢乱扔，搞坏谁也不修，遍地抛弃，一任日晒夜露、风吹雨淋，即使是新制的工具都会散架，何况这些无人爱护的工具，不散架才是奇迹呢！集体食堂缺柴禾，这些散了架的工具，正好被炊事员拖去当柴烧。老农民见了此状，没有不摇头、叹息、痛骂的。

山林竹木大破坏

在大量农具遭到破坏的同时，对制作农具的原材料山林竹木也给予毁灭性的砍伐。无论是森林、山坡林、坟场林，还是住家院子周围的掩荫竹木，以及千百年来留下的街镇、庙宇、桥头、祠堂边的名贵大树、风景古木都无幸免，被滥砍滥伐一扫而光。如此发疯似地砍伐，是拿它们作大炼钢铁的燃料（据说，1958 年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上山砍树子的，有九千万人，实际上并不只此，因为很多人虽未上山，但也在平坝自己居住的附近砍伐竹木），或作田园化耕作搭棚子、做绳索牵引机（木头做机器，竹子做绳索，要 60 斤竹子才能做一根牵引机绳）、做鸡公车、蹦蹦车（大黄桷树、大黄楝树砍来做车轮，青杠树、柏树、杂树砍来做车架），或做温室、温床的燃料，等等。把山青水秀、风景优美的锦秀河山破坏得满目疮痍，到处一片光秃，使人目不忍睹。这样的结果，给 1960 年耕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劳力减少，工具缺乏，要制作新的工具，又没有原材料，真是难上加难。1961 年夏天，我们在简阳县解放公社民主大队和社员在一起收割小春时，整个生产队找不到一个拌桶（又叫挞斗）、一把叉头扫帚、一床晒席。麦子收回来后，只好往凳子上一把一把地打麦粒。没有晒席，就只好放在未经碾整的泥地坝上晒。一遇天下雨，要把晒的麦子攒成堆堆收回去，没有扫帚，就用手捧，或用烂衣服来代替扫帚。工效很低，队长急得双脚跳。有一次，大雨来得又快又猛，平地起水把粮食冲跑了不少。我急中生智，拿了一块大门板来推。这样还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地面很滑，我用力过猛，一跤摔下去，身体往前扑，嘴唇正猛撞在断门扣上，下嘴唇撞了很大一个口子，两块破肉突起老高，血流不止。我急忙捏住嘴唇压住流血，跑到就近的公社找工作团的医生缝了两针，加上药物医治，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方始治愈。

没有晒席，晒油菜子和芝麻就更难办了。如果晒在泥土地坝，既不干净，也很难收起来。在这种困境下，只好动员社员把床上的垫单、篾席借来垫着晒了。

由于原材料缺乏，生产生活上很多需要的工具，拿钱到市场上也难买到，即使有少量能买到的而价又很高。1961 年从损坏社员私人农具退赔的价格比较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价格情况。（见表 1）

表 1：农具的退赔价与市场价比较表

品名	单位	退赔价（牌价）	实价（市场自由议价）	备注
竹子	1 斤	0.02 元	0.15 元	
尿桶	1 挑	3.20 元	5.50 元	
小箩篼	1 挑	2.00 元	6.00 元	
木料	1 斤	0.03 元	0.14 元	
晒席	1 床	5.00 元	30.00 元	
拌桶	1 个	10.00 元	60.00 元	
风车	1 架	12.00 元	70.00 元	
磨子	1 副	9.00 元	50.00 元	

土地的大破坏

在劳动力、劳动工具、山林竹木遭受破坏的同时，土地也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其破坏的办法是：

1.实行大深翻。组织大批人力，实行“大兵团作战”，把常年耕作、施肥、种熟了的好土质深翻几尺（要求土质越好的翻得越深。最浅的一尺五到二尺，一般的三尺，最深的四、五尺）。这样，便把好土翻到了底下，而把常年耕种不到的底下瘦瘠、带石子、粗硬的孬土翻到了上面，使整个土质大大变坏。根据老农经验，农作物生长之根，无论田土作物，只在一尺左右，深翻几尺，完全是劳民伤财的愚蠢作法，是一种破坏行为。土质变坏变瘦瘠了，含水能力减

小，含水量也减少了，而渗透力强大了，需要更多的水分和肥料。当时无论农家肥还是化肥都缺，肥料供应不上，便使农业大幅度减产。

2.实行三圃制。所谓三圃制，就是把常年种植的耕地面积划成三等分，用三分之一种粮食作物，三分之一休耕种牧草，三分之一绿化种花果。种农作物和种牧草的土地进行轮作，三年一循环。种花果、种“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的这一部分，是“美化中国”、“实行大地园林化”。提出这种耕作法，完全是建立在浮夸风基础上的自欺欺人的。1958 年全国农村，到处放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高，粮食亩产量由过去几百斤上升到几万斤。简阳县火盆公社比起全国其他各地算是唱低调的了，亩产小麦“已达到”7300 斤，水稻亩产 20000 斤，红苕亩产 24000 斤，棉花亩产 200 斤。既然亩产几倍地翻番，全国的土地就多出了几倍的面积可以不耕种了，就可以“少种高产多收”，种三分之一的面积就足够了。由中央传到地方，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粮食已经过关，现在中国人不是愁没有粮食吃的问题，而是愁粮食多了不知怎么办的问题。于是中央那个脑子最发热的决策人，提出了“三圃制”，把它写上文件。这个文件一贯彻，就遭到农村不少干部和群众的怀疑和抵制。但是，有一部分地区是贯彻执行了的。凡是贯彻执行了的，粮食是几倍地减产，绝大多数土地荒芜、野草丛生、土质变坏，长不出庄稼，这些地区饿死的人就更多了。

3.打破传统耕作常规：坡土填平沟，坝土填平渠，小土变大土。据说，这样可以搞“田园化”耕作，江山如画，更美丽好看。结果，造成的却是很大的损失和破坏。如简阳县的解放管区民主大队，公社化以前，从山坡到江边有好几条大干渠，加上纵横的大小沟排水，干渠边和江边还种植了芭茅保持水土。那些芭茅及其根子像筑的长堤一样抵抗着水灾，防止水土流失。1958 年转入公社，打破地界，连根拔除了芭茅，填平了沟渠。结果，两三年来，一下大雨，山坡的洪水满土流，沙石俱下，冲烂很多土地和庄稼；平坝低的田土，水排不出去，又被水涝；江边肥沃沙土，由于没有芭茅挡护，被洪水冲走 100 多亩。被洪水冲烂的土地，高低不平，成堆的泥沙、石块浮于地面，土质严重变坏，使农作物大大歉收。

家禽、牲畜、耕畜等养殖业的大破坏

在转入人民公社时，由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得很厉害，要开什么现场会、经验交流会等等，就乱捉社员的家禽来杀，不付任何代价。很多农民养的鸡、鸭、鹅、兔、猪、羊等，怕刮走了钱财两空，感到自己辛辛苦苦饲养了，给别人大吃大喝，不如自己受用。于是，横下一条心，赶快处理，拿到街上廉价出卖；卖不掉，剩下的就自己杀来吃。有的社员，一个晚上就杀六、七只鸡，煮一大锅，深更半夜把大人娃儿从床上叫起来啃鸡肉。比较大的牲畜，如猪、羊等，也牵去卖，市场上一时出现了“毛猪生产过剩”的现象，售价很低。这个高潮一过，牲畜就强行集中起来在小队、大队饲养场内养，大量的是放在公社饲养场养。由于集中饲养，人力有限，管理不善，再加上“大胆革新”：用马粪、牛粪、人屎、野草、生饲料饲养，造成大量死亡。死亡率低者 30%左右，高者 50%左右。简阳县解放管区，属一类公社，发展生猪算全县好的单位，在整风整社期间，毛猪已下放饲养（尚留有部分）的情况下，死亡率还

占 37.8%。这个公社在 1958 年转社时有毛猪 8000 多头，到 1960 年底下降到 1571 头，到 1961 年底也只有 1576 头，可见其下降的幅度和破坏的程度了。

由于大量生猪没有粮食饲养，以野草、禾秆作饲料饲养，抢去了耕牛的饲料，便影响了耕牛等耕畜的发展；加之集中饲养，管理不善，使用时又不爱惜，造成耕畜大量死亡。1958 年公社化前，一个生产队普遍有耕牛四、五头，多的有十多头。到 1962 年上半年，有的生产队只有一头耕牛，有的连一头都没有，有两头耕牛的生产队少得很。就是这极少的耕牛，其体质还很差，有的走路都打偏偏，如遇吹大风，难免不被吹倒！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1958 年转社前喂的肥猪，200 斤以上的很多，膘厚的达四、五指，而现在喂上 100 斤左右就算好的了，膘厚有两指的就算上等肥猪了。不达标准（毛重 130 斤）宰杀的很普遍，往往皮厚肉少；肉也是绵扯扯的，下锅没有油质，费了柴禾老煮不火巴。这是“锅边转”们所公认了的。“没有粮食给猪吃，喂禾秆、野草，还没有多的，怎么喂得出肥猪来！”这是猪场一些饲养员经常说的话。的确如此。解放公社解放管区解放大队二小队社员刘孝章，1961 年队上下放一头猪给他喂。听饲养员说，这是 1958 年生的仔猪，养到 1962 年 2 月份，猪嘴两边已经长出长长的獠牙，形状两头尖，头额皱着深沟老皮，毛硬如刺，根根直立着，重量估计只有 20 斤。因长期出不了槽才喂到现在，人们叫它为“霉古子”。其躯体虽小，可资格老，被群众笑喻为“四朝元老”（即花了喂四槽肥猪的时间还没有把它喂肥出槽）。没有见过此种猪的人，听起来似乎是件新闻，可我确是亲眼看见了的。解放管区集体养猪场，1962 年 1、2 月份喂的母猪有 18 只受孕，有 14 只流产，而产下的仔猪成活率很低，几乎死去一半，主要原因就是无粮喂养。

猪喂得少，很多社员两三年没有打过一次牙祭（吃肉），只有交了收购任务，有返回肉的生产队在 1962 年过春节时，每人才配给了二至三两肉。有的社员说：“这不知是啥年头，猪肉比金银还稀奇，拿着钱也买不到肉吃。”当时市场上确实很少见到肉，间或有少量的出售，每斤卖到 8～10 元。在这种情况下，社员的生活怎么会不苦，农家肥哪里有来源，粮食怎么会不歉收？

政治上的左倾路线

现在看得很清楚，实际生活中执行的是一条左倾路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条左倾路线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有其发展过程的。早在 1954～1956 年掀起互助合作运动中，搞强迫命令就开始了。在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还没有多大变化，生产提高不显著的情况下，却由互助组急转为低级社，由低级社急转为高级社，进而转为人民公社。短短的数年之内，多次由小公到大公，不断改变生产关系。这种改变，连财务上转移帐目都来不及，造成经济帐目的极大混乱。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生产关系向另一种生产关系转变，一般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现在用行政命令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内就要完成，真是左得出奇！

在我国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按照历史规律，什么性质的革命，革命胜利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就是什么社会。毫无疑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和权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第一届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1953 年中宣部颁发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1954 年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宪法的精神是吻合的，同我国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同我国国旗图案的含义是一致的。《宣传提纲》明确规定：在三年经济恢复之后，大约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实现“一化三改”（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资本主义工业、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段时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属于过渡时期，社会也属于过渡性质的社会。然而，1956 年在“三改”中，便用行政手段、搞群众运动的办法，生硬、简单、粗糙地完成，一化还没有实现，就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改变了说法。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我国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性质。这样一来，那个《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和一系列权威性文件，就一下被否定了。经过近三十年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社会，就一句话抹掉了。接着，又在经济条件不成熟、生产力水平很低、产品还不是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还不高的情况下，1958 年草率成立人民公社，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在分配上大搞平均主义。这是一种严重的左倾，其实质是小生产者热衷于追求的平均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给予了批判。已经死去了的东西，竟然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复活，而且是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帜搞平均主义。这样作，是对历史的捉弄。它必然损害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降低它的标准和威信，到头来只能损害党的事业。人既然捉弄历史，历史也将回过头来捉弄人；人违背了客观规律，规律也将回头来惩罚人。困难时期广大人民遭受苦难、过着悲惨生活，就正是规律对人的惩罚，是左倾路线带来的危害！

农民是劳动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他们的财产是不能剥夺的。农村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毫无代价地硬性拿走他们的东西，这不正是一种剥夺行为么？这不正是左倾的表现么？

在农业生产中，搞揠苗助长，搞越密越好，搞瞎指挥、高指标、放卫星，搞日夜苦战赶进度，等等，不一而足。这一切不正是左倾的表现么？总之，农村大刮的五风及其一系列政策，无一不是左倾路线的产物。

反右倾运动造成的内伤

在广大农村，为了制服那些对“三面红旗”，特别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两面红旗有不同看法、反对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打人骂人风、干部多吃多占风）的人，曾在 1959 年冬和 1960 年春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在这次运动中，讲不出多少道理，对群众提出的很多正确意见，解释不清，说服不了，便恼羞成怒，对群众实行惨无人道的新型镇压，给他们带上“思想严重右倾”等大帽子。是群众的，就在社员大会上给予批斗；是干

部的，就根据其级别和“情节”，弄到大队部、管区、公社，或者区、县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去，又打又斗。有的被打后养了很久的伤才恢复，有的因此致残，有的被打后抬回家去卧床不起而丧生……经过这一运动之后，直到现在，无论农村干部或社员，只要一提起反右倾，就会不寒而栗、浑身发抖，给人们心灵留下了严重的内伤。从此以后，有些领导干部向下布置任务时，就拿这样的话来吓唬人：“如果不按时完成任务，谨防反你的右倾！”基层干部听了此话，印象极深，相当重视：想方设法去完成任务，完不成就说假话，用虚报数字、成绩、进度来“完成”。它说明，下面说假话，完全是上面压出来的，是左倾路线逼出来的。当时说假话、搞浮夸成了风，层层都有，只要蒙混过了关，谁去追究？因此，有的人就利用这样的手段，受到上级的重视，得到了提拔重用，升了官、晋了级。经这运动一整，再老实的人也不敢说老实话了。怕说了脱不到手，要挨整挨斗，于是他们沉默寡言，叫他干啥就干啥，唯唯诺诺，毕恭毕敬；甚至干了活没有吃的，辛苦一年反成了超支户，得不到收益反而要向队里交钱也不敢吭声。渐渐地认为没有活头了，有病也不去求医，就坐在床头等死亡。农村不少的人，就这样倒下去，停止了呼吸。这些人当中，很多人在三座大山高压下没压垮，有的在战火弥漫的年代挺过来了，有的在与拿枪的敌人搏斗中撕杀出来了，可是，他们却在这“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年代倒在饥饿、迫害之中！他们是多么的不幸，多么的无辜！他们能够死而瞑目吗！

文化教育大滑坡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四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化发展特色；每个朝代，都重视文化教育，尤其重视历史，重视文学艺术。这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保留下来大量历史文化典籍，值得后人借鉴。这些文化遗产在思想上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富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个光荣的传统，在困难时期也遭到了破坏。其表现是文化教育大滑坡。

就以简阳来说，困难时期文化教育大滑坡是比较突出的。简阳县在困难时期前有 18 所中学，困难时期停办了 7 所，将近 40%的中学停办。小学停办的数字就更大得多了。这样，使得很多应该入学的青少年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没有停办的学校，则大量削减招生数量；教学计划中又废除了历史课，不重视语文课。学校教育设施差，教学内容、课程安排、教学方法、教师质量、师资来源及学校管理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总的是，质量低劣，培养出来的不少人，错别字成堆，读不懂简单的古文，哪里还谈得上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在道德品质方面，不少人不爱惜公共财产，寡廉鲜耻，道德败坏，只长于喊空洞的政治口号，不善、不会做具体实事，满口脏话，粗鲁野蛮，不讲道理，人伦丧尽。常听一些人抱怨说：“真不知现在学校培养的是什么学生！”

对原有质量比较高的知识分子，却又大加摧残、践踏，政治上歧视打击他们，每次运动都列为挨整、斗争对象；经济上压低价格，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比一个看们的勤杂工的收入还低；社会上，大受提拔重用的，是些一登上台就拍胸口，宣称自己是“黄泥巴脚杆”、

“大老粗”的人。他们大多是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每次运动中的宠儿，反别人右倾的佼佼者——实际上是“鹰犬”、“打手”之类。这些人，在心理上，既嫉妒、怀恨知识分子，又不得不依赖、使用知识分子。嫉妒、怀恨，是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依赖、使用，也还是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他们有的就深有感触地说：“知识分子像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还是蛮香的。”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他们不得不利用知识分子为他们草拟各种文件、代写发言稿、写总结汇报材料、整理先进模范事迹，甚至犯了错误还要帮忙代写检讨书等等。总之，被他们控制使用和充当往上爬的垫脚石。如果有哪点不将就、不顺从、不如意，就给小脚鞋穿。知识分子工作又苦又累，还受折磨，甚至还要遭到人格侮辱。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各种因素交叉的压力点，都集中在知识分子的身上，造成他们不少人未老先衰；有的遭受心灵的创伤，在受到迫害时抱头痛哭，千悔万悔，恨自己读了书，悔不该当知识分子：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认为读书是个大错误，在社会上总是低人一等，当工人多好。

再则，加上新培养出来的，又是那么个样子，这就更加深了社会上那些轻视知识分子的人更轻视、歧视知识分子了；这也就造成了农村很多家庭抚养子女成长，父母最关心的不是他们的读书，而是去干什么工作、生活是否落实。

理论方面的错误

近几年来，国家有这么大的困难，中华民族遭受如此巨大的灾难，人民经受着这么大的痛苦，主要是理论方面的错误导致了实践方面的错误。

由于政治上推行了一条左倾路线，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一切方面都执行左的政策，因而提出的理论也必然是为这条左的路线和政策服务的。理论方面的错误，就其大的方面来讲，比较明显的有这些：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而现在却把二者分割开来，要么强调辩证法就丢掉唯物论；要么强调唯物论又抛弃了辩证法。这就使哲学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去了。如搞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丢掉了生产力、生产工具这些物质方面的内容，丢掉了唯物主义；讲到发展，就一个劲地只讲发展、变化，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注意了形式，忽视了内容，大讲辩证法，不讲唯物论。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如对犯错误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出身不好的人，就抓住历史上的老问题不放，每次政治运动一来，就根据老问题、历史问题、成份问题来分类排队整人，根本不看现实，不看发展变化。这又是丢掉了辩证法，片面地去强调唯物论。总之，在哲学理论上，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不是搞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就是孤立地去搞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

二、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承认中国应有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阶段，又不承认中国革命胜利后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同时，对社会主义与共产

主义两个社会历史阶段，也否认其质的差别和规定性，只强调二者之间的联系，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大讲不断革命论，丢掉革命发展的阶段论。

三、在唯物辩证法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对立与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基本规律。从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形态、道路、方向等不同侧面来全面完整地揭示和阐述事物的发展变化，并用五对基本哲学范畴作补充和助手来深刻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现在，却不讲事物的发展有从量变到质变等问题，只强调和片面地讲“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而在这一个规律中，又只强调对立，不讲统一，只强调“一分为二”；不承认甚至批判社会生活中和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合二而一”。分与合、对立与统一，本身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人为地硬把它们分割开来，实际上是在搞形而上学，这哪里有辩证法的气息？坚持这种错误理论，主要是为了人为地制造矛盾、闹对立、搞分裂，为阶级斗争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服务。

四、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导致了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提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方针去付诸实践，就是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叫做“主观对客观的能动作用”，或者叫“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首先是建立在承认客观第一性、决定性的基础上的。而现在却把主观能动性夸大、上升到第一性、决定性的程度。把真理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 。从北京郊区的四季青人民公社，到全国各地农村，都强调：“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等，就是明显地提倡唯意志论。唯意志论很强调“心”的作用，从而导致了唯心主义。

五、提出用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思想认识来划分阶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根据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占有的多少，剥削和被剥削的情况来划分的，现在却用政治态度、思想认识来划分。1957 年反右斗争是如此，1959 年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如此。这种理论现在在全国广泛推行，危害很大，把一个人的阶级当成一个经常变幻莫测的东西。所谓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就是要跟他一模一样，一唱一和，亦步亦趋，在思想和行动上“紧跟”。

如果你今天同他一样，你就是好样的，是无产阶级，是革命的；明天，你同他不一样，你就是资产阶级，是反革命，是敌人。以此划分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整倒了很多的好人，造成无数的冤案。本来“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阶级也就基本消灭了，而这种理论一提出，社会主义却变成了“阶级消灭了，但阶级又存在着”的社会。按照这种理论演绎，在今后的历史上，阶级这个概念将不是一个历史范畴，而是一个永远消灭不了的未知数。由于“阶级”划分的变幻莫测，人们将要用很多精力，付出很大的代价去对付它。

六、提出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相统一、相一致的理论。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平、社会经历、社会实践的情况不同等多方面原因，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必然在思想方法上，在认识程度上有所不同，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是很自然的、正常的。可是，现在在社会领域、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思想认识就不准有差异。不管你思想认识是否正确，只要你同上级领导的说法不一样，你就是阶级立场有问题。然而，有个前提，上级领导代表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这是固定不变的；反过来，你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或者说是反动阶级，因为你的思想认识同上级领导不一样，你就代表了反动阶级说话，所以你也就是反动阶级。为什么？阶级立场和思想

认识是一致的、相统一的嘛！

七、提出以政治挂帅为主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物质利益是微不足道的，人越穷越革命，即物质是次要的，精神才是主要的，也就是立场坚定、思想先进、有共产主义觉悟才是主要的。在这种理论原则指导下，干部提职提级不提薪，工人增强了劳动强度多干了活不增加工资，农民增加劳动强度日夜苦战可以不增加口粮。进而也就只讲工作，不讲工作条件；只抓生产，不抓生活，或者实行“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只重视生产，不重视安全、卫生；只重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重视生活福利的改善等等，使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很差。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不是越过越好，而是越过越苦，越过越穷。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理论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问题，闹出这么多的笑话，主要是搞孤家寡人、个人一手垄断理论的恶果。身居深宫禁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听好的，不听孬的，凭主观想象在那里研究理论，提出理论来指导实践。国家科研单位、高等学府的大量理论家，只准他们附和宣传解释，不准他们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谁要提出，谁就要遭到像杨献珍、马寅初、胡风等人那样的下场。只准自己发展理论，不准别人发展理论。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实际是“一家独鸣，一家独放”，大家只能跟着随声附和。

实践上的错误

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错误的实践。

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叫做“先搭架子，后充实内容”。所谓“先搭架子”，就是先挂牌子，宣布名称，大传喜讯，发动群众锣鼓喧天地庆祝新生事物产生；所谓“后充实内容”，就是后作实际工作。如清理财产物资、转移帐目、调整组织机构等等。全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叫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把人民公社称之为新生事物、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这样的“伟大”实践先不试点，也不作社会调查，物质条件、精神条件都不具备，农民普遍没有思想准备。这根本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是广大农民自觉的要求。所有的歌颂赞美夸耀之辞，完全是主观强加给客观和群众的，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如此建立起来的组织，具体问题多如牛毛，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其生命力到底有多强，还得让以后的历史作证。

农村人民公社既然如此草率成立，必然会在工作上、思想上遇到种种问题和障碍，而且由科学文化知识、理论水平普遍差的基层干部，去贯彻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并提出假、大、空、快的要求，必然促使他们去大刮“五风”。可以这样说，“五风”是人民公社产生的一群怪胎产儿，是当前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包括工作作风、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的具体表现。

有人会说：中央文件并没有叫农村干部去大刮“五风”，刮“五风”是农村基层干部自己干的。的确，中央文件并没有规定下面要刮“五风”，而且，中央文件从理论、逻辑、用词、语句等方面都说得很好。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不能只从言词上、声明上去看问题，要从实际行动、客观效果去看问题，要尊重事实。上面没有风眼，下面怎么会形成风口呢？如果真是单纯的下面产生的问题，又何必大动干戈，花去这样大的精力、动用如此多的人力、耗费这么大的财力、用上这样长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搞这场运动呢？现在看来，只有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1962 年 3 月 2、3、5 日

“三?八”妇女节有感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公社根据上级指示和布置，召开全公社的育龄妇女大会，到会人数虽未能按规定数全部到齐，但来的还是不少。参加会议的育龄妇女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手挽手地来来往往。尽管生活困难，这些妇女中不少人还是打扮了一番，梳理了头发，穿着比较整洁、喜色的衣服和鞋袜，给平时冷冷清清的街道增添了热闹和喜气。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公社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请街上的几个大的国营食堂（饭馆）专门做了大量的馒头、包子，装在大筲箕里，垒得尖尖的，作为与会者的午餐。另外，与会者在报到时还每人发给五个玫瑰饼（粉红色的面饼，上面沾满了白糖）。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也沾了她们的光，每人交了一元钱，也得了五个同样的饼子。平时，这样的饼子在自由市场上，一元钱只能买到一个。

大会快到上午十点钟才开始。先由公社领导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这几年劳动力损失很大，人口大量减少，由于缺乏劳力耕种，田土荒了很多。要扭转这种局面，只有靠妇女们努力了。育龄妇女要为此作出贡献，把失去的劳力填补起来。因此生儿育女就成了妇女们当前的头等重要任务了。同时，在会上还大讲特讲生育问题，把它作为中心来突出和强调，动员妇女们要快生多生孩子，要求生得越快、越多、越好，号召育龄妇女们争当生孩子的模范，做一个生孩子的英雄母亲。

妇女们边听、边笑、边议论。公社领导讲完后，开始进行讨论，那就够热闹了——

一个比较大方的妇女说：“这哪个行啊？生活这么孬，男娃儿干了活回来，软绵绵的，动也不想动。晚上睡在床上，像条死狗，掉脸掉嘴的，身都不翻，打都打不过来。生得出个啥啊！”

有个死了丈夫的妇女伤感而生气地说：“生孩子又不单是女人的事，男的都饿死了，叫寡妇生孩子？除非去偷人，去开门迎客！”

另一个妇女接嘴说："偷人、开门迎客，还得要有对象嘛。现在队上活下来的很少几个，尽是死耗子！ "

还有个妇女抢着说："光叫我们生，生，生。讲起来松活，生起来就那么容易吗？又不是屙屎拉稀！"

……

一个接一个，说个没完没了，散会后，她们还边走边议论纷纷。

我们看到召开这样的大会，也产生了一些感想。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国情的特点就是人口众多，人平耕地少。建国初期，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出建议，在进行计划经济建设的同时，应该采取多种措施，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这个建议，称之为"新人口论"。这个善意建议，不仅不被重视，反遭到狠狠的批判，被指责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是"敌视人民的观点"等等。进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沉重打击，撤消了他的北大校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重要职务，把他赶出北大校园，住在北京东总布胡同 32 号的阴湿低矮的平房中，拿最低的生活费维持生活。

毛主席指出：人口多是件好事，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贵的"，"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全国都在按此指示办事，以致新中国诞生以后，人口增长速度很快，人平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经济的发展跟不上人口的发展，背上一个人口包袱来搞建设，把很多困难都归结为人口多造成的，采取了很多办法来控制生活用品，发放各种票证，定量分配吃、穿、用的东西。

困难时期，农村饿死了很多人，估计全国过亿。人口大大减少，本来是件坏事，却又变成了减轻包袱的好事。可是，突然又脑子膨胀发热起来，从上到下，层层贯彻，又是动员，又是号召，鼓励育龄妇女大量生育。这种作法，可以预料，我国又将出现一个人口增长的高峰期，给养活、教育及长大后就业等方面带来困难。到那时，又是严重、深刻的教训了。为形势所迫，摆在国家面前的一个大课题，必将是大力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

1962 年 3 月 8 日晚　于禾丰公社

困难时期哪些人的生活过得好？

当前，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村的农民生活过得极端困难。就在不少人饿死的情况下，也有那么一些人的生活过得好。他们是哪些人呢？群众议论中普遍认为是这些人：

第一，当权者的生活过得好。所谓当权者，就是在党、政机关，企事业以及学校等单位，掌握领导权的实权人物。这些人，一方面，因为他们做了官，有一定的官衔在身，按国家规定，享有一定的待遇：除粮食定量高（县委委员以上干部每月 45 斤，一般干部为 25 斤）外，还有零星补助粮，饭可以敞开肚子吃；另外，有副食品配给证，凭证可以买到肉、油、蛋、面、糖、酒之类的东西（如：17 级以上干部每月肉 2 斤，一般干部则没有，有段时间也曾配过 3 两）。凭证可以派人到商店按平价买到配给的东西；或者打张条子、打个电话、派个人去就可以买回东西。他们取东西，开初是走前门，由于怕被群众看到了有意见和反感，后来取货就改成了“走后门”。各商业部门“走后门”，从此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人与众不同，在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群众普遍面黄肌瘦，而这些人却长得红光满面、肥头耷耳的，满脸肉坨坨，一笑起来，脸上的肉就挤成了肉堆堆；向群众讲话，厚实的嘴唇翻动的频率很低，语无伦次，不成文句；可整起人来，那就真了不得，厉害得狠了！

第二，掌握各单位、各部门实物，特别是粮食、农副产品实物的人生活得好，因为东西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他们可以采取种种办法来揩油，从中渔利。他们的生活比一般干部和群众都过得好。

第三，服务人员的生活也过得好。服务人员，包括一切饮食服务行业的人员，招待所的服务人员，食堂的总务人员、采购人员、保管员，厨房的炊事员，等等。他们经手着物资，管着群众的生活用品，甚至饭瓢把把，揩点油算不了啥，短斤少两司空见惯，克扣群众粮、油、肉、副食品更是家常便饭。就以炊事员来说，他们每月只交五、六元的生活费，不仅在食堂放开肚子大吃特吃，而且连吃带捞，把集体的东西朝家中搬。在困难时期，很多人饿得走路打偏偏，得了浮肿病；不少妇女得了妇科病，她们既要操持繁重的家务，还得承担生产队的生产重担，如牛负重地劳累，却得不到付出的补偿，有健康肤色的很难找到。可是，饭堂的这群男女，他们在饭前饭后无所事事，悠哉游哉，还不足以消遣，有时可以看见他们在那里相互挑逗、寻欢作乐。男的去捏女的肉砣砣，女的抓住男的扒裤子……

第四，军人的生活也过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群众对此是没有二话要说的，对军人的生活过好一些，他们是理解和支持的，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人民继续苦下去，兵员后备力量的身体素质是难以好起来的。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种羸弱的后盾力量，怎能稳操战争的胜券呢！

1962 年 3 月 26 日

为什么连年天旱种种

1959 年，四川天旱；1960 年，四川又天旱。企盼 1961 年有个好天气，谁知这一年又遇上天旱。人们想，事不过三罢，1962 年该不会再天旱了。出人意料，这一年还比 1961 年旱得

更厉害。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连年的天旱？简单概括来说，就是违背了自然规律，遭到了自然规律的惩罚。

一、1958 年全民大炼钢铁、大刮瞎指挥风，对森林、竹木、山坡野生植物进行毁灭性的“全光”砍伐，引起了气候的恶变；水蒸气的大量蒸发散失，雨量的调节失去了平衡：这是造成连年干旱的主要原因。

二、1958 年大闹深翻，把多年施肥耕种得很细腻、滋润的熟土翻到了底下，又把底下带沙石的瘦劣、干燥的死土翻到了地面。土质变坏，播种的农作物如果得不到大量的肥料、充沛的水份，那是经受不了干旱的。

三、由于饲养毛猪几经折腾，有些生产队连猪种都没有了，怎么能做到“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土地得不到应有的农家肥，庄稼又是密植的，土地承受不了如此的超负荷，一遇天旱，庄稼减产歉收甚至绝收，那是必然的了。

不难看出，近几年的天旱，必然会持续一个时期。只有待森林、竹木、山场绿化恢复以后，旱情才会减轻；同时，也只有让毛猪大量发展起来，农家肥数量增多，土质逐渐变好，庄稼才会长好，单位面积产量才会提高。

为了尽快克服天旱造成的困难，领导人民继续前进，各级领导机关，要敢于尊重事实，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承认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痛下决心、真诚改正，并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政策作一些调整和改进。

要领导人民继续前进，去克服目前的困难，就必须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广开言路，虚心听取并采纳正确的意见，以之制定政策。对于过去批判处理错了的好同志，要给予平反纠正，向他们赔礼道歉，恢复他们的名誉、工作和职务。在政治生活中，不再搞独断专横、口是心非，不要欺骗人民，更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去争什么革命的“中心”、世界革命的“领袖”，不要不顾自己老百姓的肚子，而去搞“慷慨无私的援助”。只要政策对头，纯朴的人民是听话的，他们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迅速改变当前的困境。

1992 年 3 月 30 日

简阳县三类产品情况

最近，县商业局的杨局长要到成都去开会，组织了几个人为他准备参加会议的材料。我也是被组织者之一，分配去搞三类产品的调查，回来也写了一些交差的材料。在调查中，我了解

到简阳县当前三类产品的一些情况。

三类产品是除了一、二类产品以外的，允许拿到集市上去交换的产品。简阳县三类产品品种繁多，据不完全统计，有 200 余种。其中，中药材有 150 多种，土特产有 50 多种。

去年 5 月份农村集市开放，社员领回了自留地后，三类产品上市量不断上升，可以说是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但是，当前上市量同 1957、1958 年相比，还差得很远：种植面积下降了 62%，品种下降了 58%，收购金额下降了 7 倍。

当前存在的问题有如下几个：

一、部分三类产品作物的生产与粮食作物的生产，争土地面积、争劳力。洛代区黄土公社永丰大队，980.1 亩土全部安排种了粮食作物，生姜、海椒、药材种植指标的面积安排不下去。1961 年该大队种海椒 36 亩，生姜 46 亩，今年一亩也没有。石板区永宁公社，去年种有 20 亩青木香（药材），为了多种粮食已全部犁掉。随着土地面积的转移，劳力也随之转移。

二、部分产品的收购价格偏低，社员认为不划算，不愿意再种植。价格偏低的情况有二：一是收购价格大大低于自由市场价格。如：蓑草，每斤收购价为 0.05～0.07 元，市价为 0.16 元；棕片，每斤收购价为 0.22 元（出售 10 斤奖原粮 1 斤），而市价为 1.20 元（出售 10 斤可买黑市米 3～4 斤）；干海椒，每斤收购价为 0.95 元（出售 100 斤奖给贸易粮 30 斤），而市价为 9～10 元（出售 100 斤可以买到黑市米 300 斤左右）；生姜，每斤收购价 0.24 元，而市价为 1.30～1.60 元。造成这种偏低的情况有两种倾向：1.社员的东西不愿意买给国家收购部门，而愿意拿到自由市场上去买。如，贾家镇每场上市的棕片有 200～300 斤，国家收购部门 1962 年开年以来几个月只收购到 6 斤。 2.社员愿把东西拿到外地去卖，不愿在本地市场上卖。如贾家区山区产棕地带的社员，把棕片远运到华阳县去卖，那里牌价高于本地牌价一半左右。

二是品种与品种相比，有的价格偏低。要出售 3～4 斤蓑草才能买上一斤蔬菜，住在山区的社员就认为太吃亏了（山上产棕片、蓑草，坝下产蔬菜）。红花亩产 8～10 斤，价值 20 余元（每斤奖售粮 1 斤），白芷每亩产 400～500 斤，价值 120～150 元（每 100 斤奖售粮 50 斤）。社员认为种白芷划算，愿种白芷不愿种红花。莱菔子是萝卜子的中药名，作中药卖，收购价每斤 0.31 元，作种子卖，每斤售价 4～5 元。社员闲暇上山割野草卖给牛奶场，每天可割 100 斤，能卖得 4～5 元；如果给收购部门拣香附子（中药材），每天最多拣到 1 斤，只能卖得 0.11 元。社员反映说："挖药不如割草、拣粪，不干了！"

三、在经营管理上还有不少混乱现象。表现在：列入二类的产品的棕片、烟叶、花椒、干海椒、苕片、荒货等，国家收购任务尚未完成而上市交易的却不少。市管会与有关方面议定的价格（主要是家禽、家畜、禽蛋等），虽然公布了，但还未认真执行。有些本来是三类产品，可以拿到市场自由合法交换，但社员害怕没收，不敢拿到市场正式交换，而在街头巷尾、桥头、马路边交换，引起市场秩序混乱，不好管理。

1962 年 3 月 21 日

困难时期商品交换中的花样

自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后，商品交换就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等价和自由。即是，买卖双方，一方愿买，一方愿卖，方能成交；交换中以等价物作媒介进行等价交换。对此，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归根到底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是贸易的自由。这是商品交换的客观规律。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有商品生产？回答是肯定的。既然有商品生产，就应该有商品等价交换的自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商品等价交换的自由。这是违背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它不但不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会破坏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破坏农村经济的发展。

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商品的价值量就是生产某一商品花去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在正常的情况下，商品生产者只有按照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交换，才能鼓励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商品，拿到市场交换。否则，就会伤害和打击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商品数量的减少。眼前的情况正是这样：商品的价值完全是用政权、行政命令，用强制的办法来规定，它严重违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规律，因而导致了商品的奇缺和市场的萧条。

商品少了，商品交换中自然产生出很多花样。当前出现在商品交换中的诸多花样，中外历史罕见，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的独创。这在外国人或后代人听来，还会认为是在编神话或说寓言之类的玩意儿。其实，它是事实。为了搞这些花样，玩这些玩意儿，还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很多人为此耗尽了智慧和精力。谁要敢说这些玩意儿和花样一个“不”字，那就会招致灭顶之灾，只能赞之为“正确领导”、“英明决策”，这样才能得到你每月的 25 斤口粮，凭此以保持你的生存。

现行的商品交换花样，大致有这些：

一、以行政手段，把社会上的全部商品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全部由国家统购，由国家统一掌握，任何人不能在市场上交换。国家在统购时，付多少钱，只能由买方硬性规定，卖方不得有异言。农村社员自己种的粮、棉、油料之类，有的种得很少，连自己使用、正常消费都不够，也得按统购数字和价格强迫出售，这哪里还谈得上公平买卖、自由交换？第二类，是经常变幻不定的，只要当地政府和国营商业部门需要，认为有钱可赚、有利可图，便可把认定的商品，上榜列为二类产品。定为二类产品后，这些商品只能由国家和收购部门先订购、派购，所需数量满足后，剩下的才准拿到市场上去交换。由于生产的东西少，国家和统购部门的需要量大，往往是难有剩余的。在订购、收购过程中，收购部门往往都不正式公布是否已经收购足了，社员哪敢拿到市场去交换？二类产品在收购期间，是不准在市场上交换的，即使为了治病救命，也免不了被没收的命运。第三类，除了一、二类外，剩下的才是第三类。三类产品从 1958 年大跃进以来，就不准开放市场交易，直到 1961 年四、五月份，由于客

观的需要（食堂下放了，每家每户独立生活，需要买卖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才开放市场。市场一恢复，就朝气蓬勃、热闹非凡，与国营商店、百货公司相比，大不相同：一个热热闹闹，一个冷冷清清；一个真正在那里根据需要自由买卖，一个却摆着仅供欣赏、观看，即使拿钱也买不到的“陈列商品”。守护这些“陈列商品”的售货员站在柜台边，不是吹牛聊天，就是坐着打磕睡。顾客去买东西，不是百问不答，就是以傲慢、恶劣的态度同顾客吵架，甚至恶语伤人。

二、凭证购买。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内，由物资主管部门发给购物证。人们凭证购买规定的商品。没有它，就是拿着钱也买不到东西。购物证有发给单位的，有发给个人的。发给个人的又有高干的、中干的、一般干部的、城镇居民的、农村社员的、城郊菜农的、粮农的、老百姓的，当兵的又分军官的、士兵的、老红军的……。买东西时高干的可以不登记，数量不受限制，商品等级由购买者挑选；其他的既要登记，又得限量、限等级、限商品。

三、凭票购买。在实行凭证购买的同时，又实行了凭票购买的办法。买布有布票，买工业品有工业品票，买米有粮票，买面有面票，买糖果有糖果票，买酒有酒票，买肉有肉票，买油有油票，买鞋有鞋票，买锅有锅票，买碗有碗票，买表有表票等等。食堂买饭有饭票，买馒头有馒头票，买菜有菜票；……若要出门，还得要有必不可少的车票、船票。总之，票券无法胜数，衣袋里除了钱币，就是票券，有时票券比钱币还更重要。除政府商业部门在印制这些固定的票券外，各地商业部门还临时油印发放某些商品的票券。其数量并不是以商品的基本单位为票券的基本单位，比如锅是以一口为基本单位，可票券却是几分之几口；手表的基本单位是一只，而表票却是几十分之几；有的商品票，只是该商品基本单位的百分之几。就是如此，一般干部、职工、居民、农民是很不容易得到购物票的。比如过春节，发给城市居民的购副食品的票，农民没有，居民每人 5 钱黄花、一钱木耳……。凭此，一个居民要活上 70 年，才能购得 70 钱的木耳，连一斤木耳也吃不上，真是死不瞑目！但那些发购物票的经手人、领导人，则不受此限制，因为“肥水不外流”嘛！

四、凭条购物。有权或有以物易物的单位，需要计划内的、凭证、凭票购买的商品，只要开一张条子，就可不受限制地得到所需要的商品。

公社和医院也拥有打条子的部分权力：孕妇需要鸡蛋，公社可以打条子到公社下辖的商店购买；病人需要吃点白糖或红糖，医院有声望的医生出具证明、医院盖章，也可以到商店买。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五、搞协作、互通有无。单位之间、地区之间，为了彼此的需要，以协作为名，互通有无，各标各价，交换商品。其实是以物易物，不过安上了一个与时代相称的新名词——“共产主义协作”而已。这个办法，往往在掌握物资的商业部门、集体单位用得最多。

六、开后门。“开后门”原意是指有些人穿的大操裆裤，没有系好裤腰带，露出了屁股，不雅象，人们取笑其为“开后门”；或者某人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好意思，便关了前门，由后门进出，这也叫“开后门”。如今借它来用，赋以新意：买卖双方，不通过正常渠道，不在营业门市部交易，而是通过不正当渠道，在商店后面的储藏室、保管室、库房，在非营业时间、非营业地点进行的鬼鬼祟祟的交易。这种交易，往往是为了某种政治的、经济的、人际的需要，为单位的头头、为亲戚朋友、为熟人去干的肮脏行径。群众把这类人戏称为“脸嘴长得好的人”。商品交换中开后门成风，对于不同的人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当时在群众中

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高级干部送上门，中层干部找上门，一般干部人托人，小老百姓莫得门。"

困难时期，由于商品奇缺，买东西排队现象，特别普遍、严重。吃饭要排队（饭店卖饭规定了时间，限额出卖，过时买不上就只好饿肚子，逼着排队），买需要票证的东西要排队，比如城镇居民，为了拿票买上一月供应的几两肉，头一天晚上就要赶到肉店门口排队。因为是限量出售，不排在前头就买不上。买不要票证的东西更要排队。商店里，间或也卖点过期的、变质的、不要票证的东西（"处理品"），刹那间，顾客便排成了可观的长蛇阵，拥挤不堪。为了能买上东西，争轮次、争柜台，顾客与顾客之间、顾客与售货员之间，常产生矛盾，吵架、打架的事情常有发生。

七、自由、公平的交易。这种商品交易，是商品生产社会本来意义的交易。只有在自由市场的集市贸易中才能看见。买卖双方根据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按质论价，自愿成交。自由市场交易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价格比国家牌价高。以 1962 年 3 月份为例，情况如下：（见表 2）

表 2：商品的国家牌价与自由市场价对比表（1962 年 3 月）

品名	单位	国家牌价	自由市价	备注
大米	斤	0.093 元	0.93 元	
菜油	斤	0.67 元	8～10 元	
红苕	斤	0.015 元	0.15 元	
胡萝卜	斤	0.05 元	0.20 元	
棕片	斤	0.21 元	1.10～1.20 元	
莲花白菜	斤	0.08 元	0.20～0.30 元	
白布	尺	0.28 元	3.00～3.20 元	
猪肉	斤	0.67 元	8.00～8.50 元	
水牛肉	斤	0.46 元	5.00～5.50 元	
鲫鱼	斤	0.47 元	4.80～5.00 元	
鸡蛋	斤	0.64 元	7.50～8.00 元	

由于自由市场上的价格较高，商品出售者都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而不愿意卖给国家收购部门。因此，从自由市场开放以来，属于订购、派购的二类产品，国家收购

部门花了很大力气，想了很多办法，都完成不了收购计划。在直接从生产队社员手中收购不到后，只好转移到市场上去收购。而市场价格又高出国家牌价很多，于是国家收购部门又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办法来压低市场价格。其办法主要有：

㈠利用行政命令，硬性规定收购牌价。当市场上贴出告示后，上市的东西大大减少，很多人就不把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了。

㈡以国家牌价为基础，规定市场价格不得超过收购牌价的 15～30%。告示贴出来后，市场上虽然有少量的人拿东西来卖，但大量的东西却在市场以外交易，其价格比以前的还要高得多。

㈢根据市场价格水平，规定掌握幅度，按现行市价，就低不就高。告示贴出来执行这个办法后，拿到市场出售的东西又多起来了。但还是不如过去热闹，没有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㈣根据集市自然形成的价格，让买卖双方协商议价，自愿买卖、自由成交。结果，自由市场立即活跃起来了，拿到市场交易的东西又多了起来，市面又恢复到过去的水平，而且价格也比较稳定了。这是在采取前三种办法失败后，对农村小商品生产者的让步，是一种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当市场恢复到以前水平后，简阳县市管会和有关部门并不甘心就此放开，还想再次规定市价（比自由市价低些）。告示一贴出，相当灵验，市场上的东西立即又减少了，市场再度萧条。即使有少量的东西上市，也在离市场远远的半路上就成交了，价格比在市场上的自由市价高得多。就这样几经反复，最后，还是以买卖双方自由交换、公平交易告终。

㈤为农民设立服务部、服务点，用高于收购牌价、略低于或接近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这样，农村社员还是愿意出售的，收购部门也可以完成收购任务了。

1962 年 3 月 28 日

想无自然灾害，除非消灭地球

近两三年来，农业生产连年歉收，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国家经历着特大的困难。简阳县人口由 120 万下降到 80 万左右。一部分当权者在大、小会议上，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完全推向客观，归咎于自然灾害，否认有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否认有人为的因素，对因在农村大刮“五风”而造成的恶果和灾害则只字不提。对此，群众很不满意，认为这太不实事求是了。有的社员气愤地说：“反正人的嘴巴长着两片肉，生来就是说话的。红的可以说成黑的，黑的可以说成红的；正确的可以说成是错误的，错误的又可以说成是正确的。他们有权有势，把肚子说饿了有东西胀。我们这些庶民百姓能拿他们怎么样？！”

中央工作组对造成困难的原因，在承认有严重自然灾害的同时，也承认有人为的灾害、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这是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所造成的。群众认为“这种说法还差不

多，比较实事求是”。但是，这种说法却同地方干部形成了观点上的对立而有矛盾。一些地方干部之所以要那么说，是有多种因素的。一是上面就是那么说的，他只能跟着那么说；二是跟着上面那么说了，对自己有利，可以开脱自己，因为大刮“五风”他们亲自干了，而且是首当其冲；三是越是那么说，越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欢心，就会越被器重，可以获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组织观念强的好干部”的赞语，进而被提拔重用。这些人看得很清楚，从1957 年反右以来，在历次运动中提拔重用的“平步青云”的人物，哪个不是如此表现而得到晋升的！中央工作组则比较超脱，所以能摒弃以上因素，以比较客观、接近真理的说法，去解释造成困难的原因，也才会作出与地方干部大相径庭的结论。

对解脱的说法，一位地方干部强词夺理辩解：你说不是自然灾害？我可以举出很多自然灾害的例子：某年是水灾，某年是旱灾，某年有风灾，某年出现虫灾，某年又是雹灾……他一口气举出了八、九种灾，好象还有若干种“灾”在他的脑海里藏着，随时都可以举出来。

是的，自然灾害是有的，不过细想起来，这些灾害自地球形成以来，何时何地没有出现过？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外国有，中国有；而中国有啫大的地盘，辽阔的幅员，占了地球那么一大片，地球上产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他逃得脱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东西南北中，每年很难避免不是这里有灾，就是那里有害。比如，有风就会产生风灾，有水就可能出现水灾，有虫就免不了有虫灾……如果照那些干部的论调推论下去，用他们的思想方法去看待灾害，那么，要让中国人民摆脱困难，不再在饥饿线上挣扎，只有消灭了所有的自然灾害才能办到；而要消灭所有的自然灾害，岂不是只有消灭了地球才能办到的事情么？！

1962 年 4 月 9 日

三日日记

1961 年 8 月 19 日，农历七月初九，天晴。

近日，我从民主大队二生产队被调到区里整理材料。在“务虚”当中，学习了省委关于在全省开展一个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指示。

指示的第一部分谈到粮荒问题情况时，总的是说今年的粮食状况不好，比去、前年还差。分析其原因有三：

1.今年继续遭到了严重自然灾害；

2.外调任务没有减少；

3.库存粮食已经空虚了。

因此，号召全党同志不应盲目乐观，必须认清粮食形势，发动群众开展一个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运动来克服困难。

※ ※ ※

1961 年 8 月 20 日，农历七月初十，天晴。

最近，省委发了一个类似工作通讯的文件，上面谈到了涪陵凤凰公社荒田荒土的情况。

文件上说："荒田荒土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一片接连一片，一眼看去，只见漫无边际的茅草，不见一点庄稼。"

又谈到：李大章（省长）同志最近到处视察了一下，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上谈到荒田荒土问题（文件上的提法是"空田空地"）。他说：荣昌县对十八万亩空田和九万亩空地已作了规划如何填补的问题，这是好的。可是有不少地方还对此重视不够，没有行动。要求立即重视起来，变成实际行动。

※ ※ ※

1961 年 8 月 21 日，农历七月十一日，天晴。

昨夜，受区委蒋书记之命，到区里去整理向地委报告的一份材料。我半下午去到区上，到凌晨三点半才完成。晚餐只吃了一碗面条，熬到天亮，肚子饿得实在难受，很想吃点东西。正在这时，区委蒋书记布置炊事员去准备饮食，给开夜差整理材料的人吃。当时，参加开夜差工作的有 20 人左右，负责整理材料的只有 5 人（县委干部 2 人，区位书记 2 人，我），其余的是从各公社和个别大队调来凑数字的会计。当材料写到需要数字或例子时，点到谁，就由谁提供所需数据或材料。准备饮食前，是清点了人数的，饮食也是按照清点的人数准备的。可是临要端出来时，区委第一把手樊书记发话了：有大队会计参加，让他们吃了会传出去，影响不好，大家都不要吃了。炊事员说，办都办好了，酒和花生、筷子都摆上桌子了。蒋书记也说，端都端出去了，不吃更不好。樊书记只好说：那就吃端出去的，没有端出去的就不吃了。据说，那天夜餐准备了酒、煎花生、白糖烩的油煎面花等食品。

第二天早上，区供销社的干部和一些临时参加工作的人到食堂去吃早饭，按往常习惯，他们都是自己从食堂碗柜中取碗就餐。当打开碗柜门取碗时，发现里面的碗都装满了油煎面花，知趣的，只伸了一下舌头关上碗柜门另找碗去了；有个不知趣的却叫了起来："哎呀！办好多啊！还有这么多没有吃完，碗都装满了。"我正盥洗完，趁势往碗柜里一瞧，真的，碗柜里的碗个个装满了白糖油煎面花，那白糖在碗的中间还堆成了尖尖。

真是弄巧成拙，既造成了浪费，又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不难想象，区里的那些头头经常开夜会，趁人少时他们是如何豪吃猛饮的了。

情况和问题

八月十五日到月底，我被抽调到禾丰区去宣传贯彻中央的两个“宣传要点”。在工作中，调查了解到一些使人痛心的情况和问题。

一、死人问题严重

该区普安公社转社以前，人口是 12，000 多人，经去前年以来大量死亡后，现在加上遣返回农村的人在内，只有 6，900 人左右。现在，土地还有 1，000 多亩荒着无人耕种，问题比较严重。（该公社干部张光琦提供）

二、生猪饲养存在不少问题

据该区火盆公社下属 9 个生产队的调查，生猪饲养中存在若干问题：

1.养猪户不多不普遍，只占总户数的 42.8%。

2.在 100 户养猪户中调查，养单猪的多，占 87%，养双猪的少，占 13%。

3.由于遭到前几年的破坏，养猪户普遍缺少猪圈。100 户养猪户中有圈的仅 32 户，无圈的 68 户，主要是用绳子拴着养，或牵出去敞放。

4.从养猪态度来看，100 户养猪户中积极自愿养的占 50%，消极被动的占 20%，不愿意养而队干部反复做工作劝他们养的占 30%。这些不愿养猪的，把分给他们养的生猪，不是牵去卖掉，就是把它毒死、淹死或勒死来吃肉。

三、社员住房问题紧张

据该区火盆公社禾丰大队布沟一队调查，该队住房共 34 间，人口却有 37 户 100 多人。平均每户住 0.9 间，人均 0.34 间。由于生产队的房子不够住，有 5 户社员只得到附近的街上佃房来住。最近下雨又垮了 3 间，使住房更加减少了。前几天，由西昌等地返乡和城镇压缩回来的人员李少江、陈见文、汪鄢氏、许定华等四户尚未解决住房问题，他们在队里落了户，参加队里劳动，晚上都得到街上去住宿（佃住或投亲靠友借住）。

全队 3 人住一间房的 8 户，4 人住一间房的 4 户，5 人住一间房的 2 户，6 人住一间房的 1 户。两辈人（娶了媳妇）住一间房的 10 户，三辈人住一间房的 2 户。普遍在一间房里放置床、灶、尿桶，堆灰，喂养鸡、鸭、鹅、兔、羊，或者与粪池、猪圈连在一起。一遇天雨，上漏下流，破烂不堪，不避风雨，真是令人触景伤情！

四、缺房典型举例

陈天文，贫农，简阳县禾丰区火盆公社禾丰大队布沟一队人。解放前，赤贫，靠佃别人的土地耕种度日。土改时，分得房子一幢，自己买了五、六百匹瓦，请了工匠进行培修，质量较好，共四大间，一家七、八口人住在此屋，还算安居乐业、称心如意。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深怀感激之情。可是，1958 年大跃进中，掀起了打老墙的运动。一天，趁陈天文不在家时，打墙的便把他家的土墙打了，房子也就坍塌了。陈天文一家无处栖身，只得在附近流动，去租别人的房子住。租的住房既小，还得交租金。家里的家具和其他家私，也在打老墙的同时损坏和散失了。公社化后，由于生活困难，没有吃的，患了浮肿病，八口之家死去了五口，现在只剩下三口。今年七、八月间雨水多，所租房子抵不住雨水的冲刷和浸泡，房破墙倒，赶忙搬迁。可是，还来不及迁完，房子便倒塌了，床和帘子全被砸烂，一家人悲痛不已。陈天文的母亲当着我和副业队长痛说："前几天下雨，房顶到处漏，地上成河。夜间全家三口挤在一个地方。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天晚上大雨一来，我和儿子顶床被盖往床脚钻，也躲不了雨；儿媳妇淋得没法，便朝麦秆堆头钻，也没有躲着。第二天早晨，火烧不起，饭吃不上，一家人只能抱头痛哭。"她边说边流泪，转过话题，她接着说："天文现在得了湿气病（浮肿病）睡在床上起不来，死活难说。为了房子，我不知道哭了几百次。毛主席领导我们啥子都好，就是叫人打了我们的房子不好，弄得我们家破人亡。找到这些败家子，非给他拚不可。你们是工作组，我不怕你们去反映我。劳改、枪毙我都不怕。"

大家望着，无言以答。我只得搭讪说："过去工作是有缺点，干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嘛。你们的房子不是毛主席打垮的，也不是毛主席派人来打的，是下面的干部打的。不能怪毛主席。你们的困难，我们会向上面反映。今后可以得到解决的。不要把身子气坏了。"说完，只好告辞。

1962 年 8 月 25 日

在禾丰区宣传贯彻中央两个"宣传要点" 的情况汇报

根据县委的布置，我们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了报告员 32 人（其中包括区书、区长、各单位党员负责同志 13 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 10 人），于本月 15 日深入各公社，在大队范围内，以中心队为点划二至三片，召开了社员大会，采取了融汇贯通"要点"精神，联系实际，结合当前任务，突出重点，全面讲解的方法，对"要点"进行原原本本的传达贯彻。在传达中，我们特别注重说明了当前国家的困难，压缩职工、城镇人口返乡下乡的重大意义。通过算细账，说明对国家、农民的好处，以及贯彻两个"要点"能够加强团结、克服困难等问题。传达后，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了一至三次讨论。同时，还利用召开小型干部会、宣传员和返乡人员座谈会，登门访问、个别交谈等形式，进行灵活多样的宣传。到 21 日，社员大会普遍开完后，又深入社、队进行了重点检查补课。

为了搞好这次宣传工作，在宣传初，全区以公社为单位，培训了宣传员 5849 人（其中生产

队长 3223 人）。报告员在宣传中，向群众作报告 202 次，参加受教育的达 102236 人次。全区除四类分子以外，应受教育 47437 人（其中社员 10260 人，农村干部 3123 人；党员 1327 人，团员 1475 人；教师 239 人，机关干部 204 人，居民 590 人，企业职工 269 人），实受教育 40652 人（其中，社员 3123 人，农村干部 2903 人，党员 1327 人，团员 1475 人，教师 239 人，机关干部 204 人，居民 590 人，企业职工 269 人），占 85%。个人受教育多者达 5 次。全区 73 个生产队通过工作后，根据地委规定的分类标准排队为：一类 46 个，占 63.1％；二类 24 个，占 32.8%；三类 3 个，占 4.1%。据碑垭公社龙云二队 27 户、应受教育者 39 人的调查，实际受到教育的 27 户，35 人。对 35 人的排队是：对国家的困难有认识、能体贴、积极热情欢迎职工下乡者 17 人，占 48.57%；基本上有认识、但不够热情的 13 人，占 37.14%；认识不够，漠不关心，认为压也可、不压也可的 5 人，占 14.28%。宣传工作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通过这次大规模的普遍宣传，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其主要收获如下：

一、解除了群众的各种思想顾虑，提高了思想认识

宣传前，群众对压缩职工、城镇人口返乡、下乡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顾虑：干部主要是怕麻烦，怕不好领导；社员主要是怕少分口粮，怕挤掉自己的房子；部分返乡人员遇到生产、生活上的具体困难时，则留恋城镇，思想有些不稳定。通过宣传教育后，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

首先，群众对国家当前的严重困难有了正确的认识，能够体谅国家的困难，并把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结合起来看待问题。在讨论中，不少社员以主人翁的态度发表了自己对国家困难的看法。如火盆公社花园二队党员杨德才说："国家的困难跟我们家里的困难一样，我们只有积极努力搞好生产才能解决。国家不困难了，我们的日子也才好过。"碑垭公社和平大队龙云二队社员蔡红君说："过去我们有困难，国家就帮助，现在国家有困难，我们也不得不管。"有些返乡人员对国家困难有了认识之后，也降低了安置上的过高要求。如火盆公社林场大队禾丰二队返乡人员白银洲，队上安置他的住房，他认为是草房，住不长久，不要。他原先有两间房子被队上打老墙打了，要队上修来赔他。听了报告之后，他接受了队里的安置，并说："连续三年灾害，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困难，房子我勉强能住就行了，将来生产好了再修。"

其次，认识到压缩职工和城镇人口返乡、下乡，支援农业这一措施的正确必要性。在讨论中，不少社员通过算细账，回顾生产的变化来说明党的这一措施是英明正确的，好处很多。如火盆公社真公二队社员刘家洲说："我们队里今年回来 14 人，多种几十亩地，荒土消灭了。不是党的这个政策好，我们的玉米、水稻、棉花产量哪会翻两番呢？""有人说人回来了少分粮。我看要看远点，暂时少分点，把生产搞好了以后就可以多分。去年分得少，今年小春就分得多，大春分得还要多。政府措施是治本，我们不会吃亏。"他还建议自留地要划好土给返乡人员，以体现照顾。火盆公社响水四队老农蒋天斗说："大量人员返乡有三大好处：一个是不发工资，国家减少了开支；二是农村不增加征购，大家可以多吃口粮；再一个是增加了农村劳力，生产好得快。"他认为："人回来越多越好，很多人往农村走就是好形势。"

再次，对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有了认识，加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火盆公社裕民大队新民生产队返乡人员蔡洪良说："国家当前粮食这样困难，工业过头了些，就必然要回过头来大办农业才行。因为肚子饿了不能吃钢。当然工业也重要。农业办好了，要大办工业时，我们可以

再去。”安佛公社建设大队柏林生产队返乡人员段安元（铁路工人）说：“工农业生产都要生活好才有保证。以前认为在铁路上工作是铁饭碗，农业办不好，照样饿肚子，铁饭碗也要打烂。”响水四队社员蒋平良说：“农业不好，工业还是走不动。只有办好了农业支援他们，有原料，有吃的，工业才能发展。职工下乡支援农业，这个作法很对。”较为普遍的反映是：“党和政府真英明。这一着硬是对了。这个办法好，很过硬，很彻底！”

二、推动了对返乡、下乡人员的接待安置工作

宣传前，各公社都有少部分生产队对返乡、下乡人员的接待安置不够热情，不够及时合理，解决问题不彻底的情况。如有的口粮不按本队平均吃粮标准分配，不及时划自留地，解决住房、口粮等问题一拖再拖。通过宣传之后，群众和干部一起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如安佛公社人民五队队长李正明，返乡人员去找他解决口粮、住房、自留地等问题时，开初，他说他不是队长，以后，他又只承认是副队长，推脱不解决问题。宣传工作开展后，他便主动把问题解决了。火盆公社林场大队白象二队队长黄金成，对回来了十多天的返乡人员杨昌水、蔡琼芳的住房、床铺问题不加解决安置。这次群众听了报告在讨论中批评他说：“这些问题早该给人家解决，不能再拖了。不解决是不行的。”事后，队长和群众一起动手，也很快给他们解决了。青龙公社五队队长黄学云、火盆公社禾丰二队队长白培水，同样也自觉转变态度，帮助返乡人员解决了口粮、住房、自留地等问题，并主动找返乡人员谈心，征求意见，了解他们的困难。不少与返乡人员邻居的社员，也主动借东西给他们用，问长问短，关心他们。返乡人员很受感动。总之，凡是安置上多多少少存在些问题的，通过这次宣传，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群众对返乡人员普遍采取了热情欢迎的态度。

三、返乡人员进一步安了心，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由于干部和群众对返乡人员热情接待、妥善安置，解决了他们的具体困难，返乡人员一般深受感动，从而在农村安家落户的观念加强了，生产劳动也积极起来，表现不好的向好的方面转变。据调查，火盆公社花园大队返乡 52 人，在未宣传前，安心在农村、积极劳动表现好的只有 26 人，占 50.8%；宣传后，这类人上升为 36 人，占 69%。该大队返乡人员曾大云，由于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大公无私、积极带头，四个月挣了 1050 个工分，还被社员群众推选为生产队副队长。他弟弟曾大学返乡后劳动不积极，他便进行帮助教育说：“要听党的话。你不好好劳动，我都不好意思了。”现在其弟弟也积极出工了。群众反映说：“有了曾队长，我们搞好生产不成问题了。”队长杨朝松说：“他当副队长，我出外开会都放心了。”这个大队三个表现不好的返乡人员，听了报告在讨论中都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今后要安下心来，积极劳动。碑垭公社和平大队月亮二队返乡人员杨兴清（贫农，铁路工人）听了报告后，知道队上缺钱买牛，便主动拿 500 元出来给队长买耕牛搞好队上的生产。火盆公社禾丰二队返乡人员白培德，过去把分给他的口粮（另还借了部分）拿到成都去做投机生意。听了报告后，他说：“我今后再不赶场做生意了，要安下心来在家多挣工分，弥补前一段的误工，赶大春多分口粮。”事后，果然在家里埋头生产，赶场日子有事，便叫他妻子曾惠清去办理。另外，不少有钱的返乡人员还自觉地拿钱出来修房建屋，立志在农村安家立业。总之，通过宣传后，返乡人员的变化是很大的。全区返乡人员 4067 人，原先安心农村积极劳动的一类只有 2504 人，占 61.6%；通过宣传后，转变好了的有 1401 人，占 34.5%；现在还动摇不定、三心二意的只有 162 人，占 3.75%。

四、加强了团结，树立了共同克服困难的信心

由于在两个“宣传要点”中，中央承认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必要的检讨（据说是周总理签发时，加上的。——笔者整理时所加的注）。群众在讨论中也畅所欲言，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少数人也借此出了些气，说了些气话。但说后普遍心情舒畅，认识了党的光明正直，为群众办错了事也毫不隐瞒，敢于公开承认，从而更加信任和爱戴党了。表示今后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信心百倍地把生产搞好。火盆公社裕民大队新民生产队社员蔡洪良说：“党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承认了就对。建设没有经验，哪个敢保证没有缺点呢？今后不再犯就行了。”社员谭保金说：“中央过去看的是一河浑水，现在看的是一河清水，看透了底的。这几年明明生产下降、生活不好，以往一开会就说上升了、提高了。听到就冒火。现在说的才实际，我心服了。”他边说边哭，用袖子不断揩眼泪。裕民大队新民生产队队长黄吉君说：“1959 年 7 月到 1960 年 5 月，我家死了父亲、母亲、妻子、儿子，他们都是饿死的。去年我们队里种棉花，亩产只有 2 斤 2 两，可是一开会总说上升上升、提高提高，真火冲！我认为这次党才说了实话。”普安公社安全大队队长蔡廷金（过去是大队副支部书记，整社时被撤职，这次甄别后当大队长）说：“我蔡廷金是被整住了的，开小会大会批斗我。我的意见大得很，不晓得怎么办了。现在报告已经分枝落叶了，大家都该负责。中央都承担了责任，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当然，挨了斗、吃了苦头，甄别了嘛。话又说回来，就象兄弟打架，打得再凶，也是兄弟。现在我没有意见了。”他边说边流了眼泪。也还有些人发牢骚说气话的。有的社员气愤地说：“往年不对，错误不承认，人还没有饿死嘛。现在看人饿死得差不多了，才来说有缺点错误！”翰林葫芦一队返乡人员王兴武（中农）生气地说：“这几年战绩是大，好是好，好几个光：我回来后，房子光了，墙脚石光了，竹木光了，家中的东西光了，人也差点光了（他家死了二人）。‘五风’刮得够厉害的，那时谁还挡得住呢！老实说，我并不怨下面队上干部。现在上面来承担责任，我莫得意见。”在一些讨论会上，一谈到刮“五风”，特别是生产瞎指挥、浮夸和打老墙，群众意见最多，气话不少。但他们都认为，只要中央知道下情，承认错误，今后不再犯，就有奔头。只要干部、返乡人员、社员，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生产是可以很快恢复的。有的社员甚至挥袖提劲、精神振奋、充满信心地说：“只要纠正了‘五风’，两三年就可以赶上 1957 年的生产水平。”总之，通过宣传，不少生产队已经形成了一个空前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的局面。这次宣传，尽管进行得比较广泛深入细致，并对个别薄弱的队补了课，但各社、队的广度、深度还是不够平衡的。在广度上，地势适中的队，人到得比较整齐，受教育者占应受教育者的 80～95%；但地处分散偏远的队，人就到得少些，只占 70％左右。有少数大队、小队干部正忙于棉花测产，也未听报告和参加讨论。在深度上，由于有的队组织讨论得好，有的队组织讨论得不好；讨论次数的多少也不一样，以至个别队对“要点”的精神还了解得不充分，因而对返乡人员的接待安置工作还存在问题。

此外，尚有极个别干部和社员，过去挨过斗，受到打骂等委屈的，现在怨气还很大，疙瘩并没有完全解开。如塘坝公社斑竹大队原联社主任张朝仁（党员），由于生产上不去（注：实际上是不搞浮夸）被批判斗争，挨过打。这次安排他作大队保管工作，他很气愤地说：“保管个球！找我当保管？除非黄鳝长叉！”等等。这些，需要在今后作深入细致的工作，把宣传工作经常化，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有的返乡人员要求今后多开一些座谈会，了解他们的情况。这个意见可以考虑采纳。

在接待、安置工作上，全区总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些具体问题，最突出的是住房特别紧张，个别队尽了最大努力，实在无法解决，还需要靠上级帮助。对此，我们进行了初步摸底。火盆公社花园大队返乡人员 43 户，有 20 户需要解决住房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新修 1

间（1 户），租用 19 间（19 户）。这 19 户的房子都是破漏不堪的需要培修。打紧计算，需钱 900 元，其中自己能解决 487 元，生产队能解决 327 元，还差 86 元，需要国家解决。安佛公社安乐大队返乡人员 55 人，其中无住房的 20 人（20 户）。解决的办法是：公房解决 7 间（7 户），向社员调剂租用 13 间（13 户）。这些住房皆破漏不避风雨，打紧计算，需要培修费 780 元。自己解决竹子、部分盖草、盖匠工资，生产队解决部分盖草和木工，合计 520 元，还需要国家解决买木料的钱 260 元。

在返乡、下乡人员中，有极少数外流他乡（如火盆公社就有 4 人），他们此次并未受到教育。今后如何使这类人员返乡生产仍是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外流人员好逸恶劳，比较分散，不好管理，生产队不想要。但户口已上到那里，事实上不要也不行。队上只有尽量动员他们回来，加强管理教育，并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使其安心在家从事农业生产。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禾丰区宣传组

1962 年 8 月 29 日

关于退赔工作的情况调查

最近，根据区委的布置，我们对解放公社红塔区四大队，上次的退赔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先是对全大队的情况作一般的了解；之后，又重点深入第六小队进行了挨户登记，作彻底细致的调查。为了让社员没有顾虑地反映真实情况，我们确定重点、挨户调查、摸底登记等工作，没有让大队书记和生产队干部参加，整个工作是由工作组独立完成的。现在调查工作已告一段落，兹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大队的退赔情况

上次，全大队退赔小队和社员的总金额为 1556.07 元（其中大队退小队 510.89 元，大队退社员 1045.18 元）。其中，退原物价 349 元，退实物抵价 30 元，退现金 650 元。从整个大队来看，上次退赔存在的问题是：

1.已退赔的房屋，折价普遍偏低，社员很有意见。如社员林云高，农场占其三间半草房，才折价 6 元。

2.房屋退赔还不彻底。如管区占社员 24 间房屋才退赔 18 间。受精站占社员房屋 12 间，还有一间未还，又没有给租金。

3.大队平调社员柴草 15079 斤、竹木 20778 斤，退赔得很不彻底，群众还有不少意见。

4.管区平调 6 小队肥猪一头，重 380 斤，计金额 90 元，至今分文未退。

5.根据现在的退赔要求和文件精神，尚有不少遗留问题需要补课予以解决。如打社员房屋老墙、平调走社员的猪圈等需要退赔。

二、六小队退赔的情况

六小队上次退赔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与大队的情况和问题大同小异。全小队共 57 户，上次退赔从现金来看，共退了 31 户，金额 167.04 元。在这次退赔中，最大的问题是折价偏低，社员对这方面意见最多。我们把退赔的实物按照现行牌价和市价作了比较进行了核算，总的情况是折价偏低 85%左右，也就是说，按照市价只退赔了 15%左右。折价中，除锄头、镰刀两项比较接近合理外，其他项目偏低的幅度都很大。如竹子偏低 87%、尿桶偏低 63.64%、木料偏低 75%、木炭偏低 60%、箩蔸偏低 66.66%、扁担偏低 70%。

这次，我们在调查中用了三天时间深入小队挨户调查登记，并征求了社员们的意见，从而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了解了上次退赔的情况，为小队今后的退赔工作打下了基础。我们将登记的材料同分支副书记，小队队长，会计和两位熟悉情况、处事公正的社员代表一起进行了审核。从价值来看，共审核掉 15%左右，其中竹子一项的价值就占 12.12%（应该说，这个审核还是粗糙的，以后搞退赔时还要进一步做深入细致的审核）。我们把审核的结果，初步确定的实物，按照市价（经过大队、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一起共同议定的）算了一下，全小队还该退 4156.69 元，其中竹子 9205 斤，价 1380 元，占总退赔的 33.7%；树木 11013 斤，价 1419.80 元，占 34%；打老墙 105.5 垛，价 527.50 元，占 12.58%；其他价 824.64 元，占 19.62%。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全小队在今后的退赔中，竹子、树木、打老墙三项应是重点项目。

三、上次退赔的程度

按照现行市价计算，上次退赔的价值，全小队应是 1114.01 元，这次再退赔应是 4156.69 元，两次合计为 5270.70 元。上次退赔的仅占全部退赔数的 21.14%，还有 78.86%该在这一次退赔中进行退赔。如果把这次登记的全部退赔数 4156.69 元，加上高级社时期遗留的问题合在一起计算，该退赔 6856.69 元（遗留问题价值为 2800 元）。

全小队上次退赔数加现在该退赔数，再加高级社时期遗留问题数，合计是 8070.70 元，上次已退赔兑现的数字只占这个数字的 2.07%。

四、社员的思想动态

这次，我们在调查摸底工作中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声势，而仅仅是做扎扎实实的调查工作，因此，社员群众的思想尚未得到彻底暴露。但从我们进行工作，与社员接触时，他们已主动发表了些意见。反映出来的思想动态是：绝大多数社员热情登记，对这次退赔抱有很大希望，对党的政策表示满意；但也有少数社员半信半疑，说落后话，不愿登记，认为登记是“搞了玩的”，他们一听说登记，就摇头说：“算罗，搞得热闹，退得到啥子啊！”这说明有些社员

对退赔兑现还不相信。

五、存在问题

1.山上的树木砍伐了331根，折51000斤，价值5100元，社员登记后被干部审核掉了。干部同社员之间有分歧：干部认为是高级社时期入了社的，不应该算个人的财产；而社员则坚持是他们的个人财产，入高级社、转人民公社都没有计算价值。

2.打老墙，房子已倒塌的，社员要求修复；未倒塌而居住危险的，社员要求培修。这种房子共四间，培修费用需要60元左右。

4.猪圈被平调走了或被集体损害了的，社员要求赔实物，以便于及时养猪。他们说，退赔现金拿来买不到材料，而且数量差得多，无法做新的。

整社工作组

1961年8月14日

关于“土地公私占用比重”和“落后队未改变的原因”的调查报告

这次，我们在普安公社永明大队就“土地公私占用比重”和“落后队未改变的原因”这两个问题作了调查。现将情况报告如后。

永明大队是普安公社的一个落后大队，上面虽然几度帮助，但生产、工作仍落后于全区其他大队。这个大队下属12个生产队，社员343户，1026人，其中主劳245个，副劳199个，次劳37个，合计劳力481个，占总人口的46.8%，折合标准劳401个。有耕地3475.1亩，其中田771.1亩，土2704亩；有耕牛54头，能劳役的30头；毛猪183头。全大队人平土地3.39亩，每个标准劳负担土地8.67亩，现能劳役的耕牛每头负担土地115.89亩；毛猪户平0.53头，每头猪的肥料负担土地19亩。

一、土地公私占用情况

全大队的耕地面积3475.1亩，以人平0.23亩划拨给社员作自留地235.84亩，占耕地面积的6.79%；划作社员饲料地的9.9亩，占总耕地面积的0.28%；应属集体经营的土地为3229.36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2.93%。

全大队十二个生产队中，除按标准划给社员作自留地和饲料地外，社员擅自占用集体经营土地的有9个队，占12个队的75%；社员188户，占全大队343户的54.8%，共占耕地11.69

亩，占集体土地的 0.36%，占自留地的 4.92%。另外，还有 174 户社员利用路边、荒地、房屋基地种植满山青 9.72 亩（其中：路边 0.36 亩，占 3.7%；荒地 1.34 亩，占 13.8%；屋基地 8.02 亩，占 82.5%），户平 0.056 亩，占总耕地的 0.28%，占自留地的 4.12%。

占用集体土地的 9 个队，一般队 3 个，占 33.3%；先进队 3 个，占 33.3%；落后队 3 个，占 33.3%。一般队侵占土地面积大，先进队和落后队侵占土地面积小。如，一般队 3 个，占用土地 9.46 亩，占总侵占面积 80.9%；先进队 3 个，侵占土地 1.05 亩，占总侵占面积的 8.9%；落后队 3 个，占用土地 1.18 亩，占总侵占面积的 10%。侵占土地户一般队多，落后队少，先进队更少。如一般队 3 个中，侵占户 74 户，占该队户数的 71.4%；落后队 3 个中，侵占户 66 户，占该队户数的 59.6%；先进队 3 个中，侵占户 48 户，占该队户数的 43.6%。具体从侵占户来看，188 户中，从阶层上看，老中农 29 户，占本阶层户数的 82.1%，占侵占户数的 15.4%；新中农 41 户，占本阶层户数的 73.3%，占侵占户数的 21.8%；老下中农 51 户，占本阶层户数的 48.1%，占侵占户数的 27.1%；新下中农 58 户，占本阶层户数的 53.6%，占侵占户数的 30.9%；贫农 9 户，占本阶层户数的 21.4%；占侵占户数的 4.8%。从劳动力上看：劳强户 98 户，占劳强户数的 86.7%；占侵占户数的 52.1%；一般户 69 户，占一般户数的 64.3%；劳弱户 21 户，占劳弱户数的 34.6%，占侵占户数的 11.2%。从以前的生产生活水平来看：生产好、生活水平高的 108 户，占本类户数的 71.3%，占侵占户户数的 57.4%。再从干群方面来看：干部有 14 户，占干部户数的 23.3%，占侵占户数的 7.4%。14 户干部中，先进队 1 户，占户数的 7.1%；一般队 8 户，占户数的 57.1%；落后队 5 户，占户数的 35.8%。

这个大队是个落后大队，为啥社员侵占集体土地少呢？据了解是：⑴这个大队是人少土地多，耕地面积大，自留地划得多（人平 0.23 亩）。社员说："看我的自留地都搞不好，哪还有人工、肥料去搞满山青啊！"⑵先进队对集体生产抓得紧，防止了社员自发耕种其它土地。如胜利一队队长说："社员自留地那么多，再去搞满山青，队上生产怎么办？"⑶落后生产队的社员依赖成性，靠国家帮助的思想严重，认为"一身都滚下去了，还靠一个尾巴。"⑷原大队支部卡得紧，在大小会议上都强调不准乱挖乱种，未经批准搞的满山青要收归集体所有（去年曾经收过一次），因此社员不敢搞。只是一般队卡得不紧，社员才试探性的搞了少部分。如永明二队社员庄世平说："说是说不准搞，管他的，搞点试试看，队上要收就算了，如果不收，就算捡到收一点。"现在社员占用熟土种的满山青，生产队一般都作了研究，他们的解决办法有两种：一是收为集体，队付报酬。用这种办法处理的有 8 个队，占队数的 88.9%；二是采取收益分成的办法，搞四六开，集体得四成，社员得六成。像这样处理的队有一个，占队数的 11.1%。

二、落后队未改变的原因

这个大队的落后生产队是永兴队、太平二队、和平二队等三个队，占全大队 12 个生产队的 25%。这三个队长期陷于落后，不仅 1961 年大春生产孬，1962 年小春生产准备工作也差。如永兴队 1961 年大春种得少，长得孬。集体经营的土地 353.48 亩（其中田 91 亩），在 1962 年大春仅种下了 279.48 亩（其中田 57 亩），占应播种面积的 72.6%（包括运输站划种的 20 亩在内）。该队未种的空田空土还有 74 亩（其中田 34 亩），占应播种面积的 27.4%。已播种下去的，管理很差，生长孬。如玉米种 14 亩，有 7 亩基本无收；花生 6 亩，全是草山，脱窝很严重，亩产不会超过 20 斤；红苕 104 亩，草盖苕就占了 32 亩，上过一次追肥的仅 10 亩；棉花 91 亩，秋草已封土面占 50 亩，基本无收有 7 亩；水稻收了不犁田，现在还有谷桩田 2 亩多未犁；已犁的田又不拦水，田坎全未挞糊过，河堰也不扎。另外，谷子割了很久，

尚有 10 亩田里谷草丢着未收。对 1963 年小春生产的准备也很差，现在商品肥 1 斤未买，社员的农家肥也一户未收。整土拌土全未动，种子不加翻晒，霉烂生虫的多。麦子、碗豆种全部受潮咬不响，小麦种生虫率达 70～80%，碗豆种生虫率达 20～30%。

这个队落后是否客观条件差受到影响呢？据调查，根本不是这方面的问题。这个队号称“人少土地多”，土地人平均 3.63 亩，高于大队水平 7.1%，标准劳平 11.11 亩，高于大队水平 28.1%。运输站划种 20 亩后，人平土地 3.01 亩，占大队水平的 88.8%，劳平土地 9.8 亩，仅高于大队水平 1.3%。劳动力虽差一点，但畜力则很强，全队有耕牛 6 头，能投入劳役的有 5 头，每头负担土地 70.1 亩（其中田 18.2 亩），占大队水平的 60.5%。划走 20 亩后，每头仅负担土地 66.69 亩（其中田 18.2 亩），仅占大队水平的 57.6%。其他生产资料，政府两度无偿投资，已基本解决。搞好生产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那么，这个队落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从总的来讲，根本的原因在主观方面。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㈠经过“五风”刮后，干部和社员对搞好集体生产丧失了信心。在生产上，社员有劳不劳，有肥不投，每天出勤率只占 50～60%，最高不到 80%，且出工迟，收工早，每天劳动时间只有 5～6 小时。劳动中互相不管，互相观望，在土里混。社员谢世元队里安排他去犁田，他把牛牵到田边拴着睡了大半天觉，根本不下田去犁田，很多社员都知道，就是无人过问。又如，全队 40 户社员，1962 年全年无投资户（主要是投肥料）达 11 户，占总户数的 27.5%。其中劳强户 6 户，占 54.5%；一般户 2 户，占 18.2%；劳弱户 2 户，占 18.2%；懒汉 1 户，占 9.1%。队委会从未过问，致使该队生产长期陷于落后状态。

㈡队委领导集团，存在搞单干的思想。队委会 6 个干部中，除第三生产队队长何素芳（女），认为只有依靠集体才能战胜困难、搞好生产外，其他 5 个都积极主张单干，认为只有土地下放、划到户去各搞各的才行。如第一小队队长唐光照说：“集体搞硬是不行。”他的理由是：“⑴人多心多，很难统一。人上一十，五马俱全，硬是盘不赢他们的心。⑵土地吊得远，房屋住处又分散，不说搞生产，逛都难得逛。⑶基本口粮不够吃，国家无照顾，肚子饿，你叫他怎样做活路嘛！”大队会计员晋光吉说：“集体搞生产，享福的一边，受罪的一边。”（意思是说，当干部的，生产搞不好上级要批评，喊社员做活，社员又要叼，不去干。受罪的是干部，享福的是社员，因为基本口粮大家分一样多）记分员钟国兴说：“生产合起干，勤快人都拖懒了。”第二生产队队长杨宗炎说：“前两任的第一队队长钟远盛（挂面匠）、杨昌性（木工），看到集体搞不好，单干又不行，他们就不当队长，跑去搞小手工业去了。他们才安逸，叫我们来搞，硬是棘手。”队委会正式提出“箍不住了”，积极主张“土地划到户去各搞各的，免得病脚连累好脚。”现在，队委会的领导态度是放之任之，基本不管。第一队队长唐光照有时表面上管一下，实际没有管。平时不是搞自己的自留地，就是去赶场。他说：“不是自留地多结几个南瓜，小春分那点粮食啷个能吃到现在！”第二队队长杨宗炎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搞自留地，还把他父亲专门安排在家中搞自留地。整个队委会基本上瘫痪了。

㈢社员对集体生产无兴趣，倒向各奔前程。第二小队社员 40 户，坚持集体生产只有 13 户，占总户数的 32.5%。这些户绝大多数是贫困户和劳弱户，以及一部分政治觉悟较高的干属。主张土地划到户各搞各的 27 户，占总户数的 67.5%，他们大多数是劳强户，如劳强户社员杨德寿说：“只要土地划到户，等不到两年，空田、空土和草山就要全部消灭光。如果再集体搞，这一辈子都休想搞好。现在，集体无人想搞，社员私自搞了，他们（指大队）又要收，田土啷个不丢荒嘛！”原任第一队队长杨昌性说：“国家仓库要想装满，只有土地划到户。如其不然，国家仓库还要空。未转公社前，杨德水一家人卖统购粮三千多斤，我卖两千多斤。

我们两家合在一起卖五、六千斤。今年我们一个队四十户人，才完成征购粮五、六千斤，比一下嘛！”（按：经过核实，数量确实是那么多）吴其昌（劳强户）总结了集体生产有“十二多”、“四个好”、“一个样”。“十二多”是：“田土荒得多、庄稼草草多、队上懒人多、遍地肥料多、露天粪池多、粮食浪费多、房屋烂得多、树木糟蹋多、农具损坏多、偷奸取滑多、田里漏眼多、国家损失多”；“四个好”是：“干部整得好、干活混得好、庄稼孬得好、肚子饿得好”；“一个样”是：“勤人懒人一个样”。杨昌德说：“互助组时，我们这个地方还红哩，转了社就倒霉，一直到现在。我看还是土地划到户搞互助组好。”杨昌寿对土地划到户后提出三个保证：“⑴保证两年内消灭全部空田和荒坡；⑵保证人人出全勤，家家户户无耍人；⑶保证国家多收征购。”很多社员都异口同声地赞同土地划到户搞互助组。他们说：“其好处是：⑴互助组是走集体道路，是社会主义萌芽，不是搞资本主义；⑵我们搞好了，好帮劳弱户，一方面增加了劳强户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照顾了劳弱户，仍是大家富裕；⑶目前的耕牛、农具很缺，好调剂使用。”很多社员由于上述思想支配，虽未正式行动，而思想已转向单干，准备各奔前程。该队 40 户中，有一户（占 2.5%）不务农业，专靠打鱼捞钱；有 5 户（占 12.5%）不参加生产，到处游手好闲，进行乱拿乱摸；有 2 户（占 5%）经常在外搞小手工业挣钱；有 8 户（占 20%）经常在家搞自留地，很少参加集体生产；有 3 户（占 7.5%）场场赶场，搞点小买卖。总共有 19 户、占 47.5%的社员，都不愿搞集体农业生产，积极主张单干。其他还有一些，嘴里不说心里也想单干。走单干道路的社员已经占了上风。这便是该队老是落后不能改变的根本原因。

㈣劳动管理差、评工记分不逗硬。该队既无作业组，又无临时班，习惯于大班子，一窝蜂。评工记分变成了报工记分，平均摊分。社员说：“勤快人得八两，懒人得半斤（16 进位秤）。”“要想活路做起走，没有那样人的心。”故社员干活消极，生产长期掉队，成了老落后队。

禾丰区工作组

1962 年 10 月 3 日

看棉花王的沉思

由简阳火车站到县城的进街口处，马路左边的小土坡上，高大的玻璃房子内，种了五、六根棉花王。棉花王高十多米，相当于三层楼房的高度。土地耕作精细，每根棉花王周围拥有一公尺左右高的肥料，根部粗者有小碗那么大，细者也有茶盅那么大。棉花王的四周和顶上都是嵌着玻璃的房子，地下挖有管道和温床，房内安有温度表，经常保持恒温。在管理上，集中了县里种棉科研人员，经常观察研究，使用了很有种棉经验的几个农民，常住那里监护与管理。棉花王最大的一根，结棉桃 5000 多个，据说摘下其棉花，可以弹一床棉絮。小的也有棉桃 3000 多个，可以弹半床棉絮。棉花王上结的棉桃，凡张开了吊着花絮的，个个都用塑料薄膜口袋包着并结上棉绳固定。每根棉花王周围，像起楼房一样，都用楠竹、木料捆绑，搭起了塔式的脚手架，一方面把很多棉枝棉桃衬着；另一方面，只有依赖这种架架，人才能

爬到高处去包裹一个一个的花朵似的棉桃。曾经一个时期，往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到了简阳，看看棉花王，也可以开开眼界，饱饱眼福。

当然，这也自然引起议论纷纷，褒贬不一。总的来说，人们是把它当做奇迹来看，并为之赞叹。褒者认为，这是解放了思想，敢于向科学进军，将草本植物变成木本植物，将一年一枯荣的植物，变成了多年生的植物。它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土质、肥料、温度、水分等适当），是可以改变植物的性质的，即一年生植物可以改变为多年生植物（棉花王是 1958 年种的，到 1962 年还活着），草本植物可以变成木本植物，能够四季常青。但是，冷静下来沉思，其中也有很多问题值得考虑。

㈠可以说它是浮夸风的精品展览。

㈡可以说它是劳民伤财的典型。据说，单玻璃就花掉两万元，由省委书记李井泉批条子才买到的。还有肥料、烧火温床的燃料、工作人员的开支等，这笔笔经济帐也大有算头。

㈢产量不一定理想。占了近一亩土地的面积，四年内就只看到那么几根棉花王。如果按常年种法种好些，其收获得的棉花产量，远比这几根棉花王产的棉花多得多。

㈣没有什么发展前途。棉花王开初一年结的棉桃还大，可是到第二年便小了，到第三年颠上结的则更小了，小的棉桃只有指头那么大，第四年棉花王颠上的叶子小得只有小钱那么大了，已经结不出棉桃了。这有什么推广价值，有什么发展前途呢？

㈤这种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客观条件上，给以特别优惠的劳民伤财的浮夸作法，早一天收捡起来为好。

我的结论：不宜再种了！

1962 年 8 月

一个困难队的简况

——简阳县养马区石盘公社新民大队下五队的调查

一、基本情况

全队在 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前，人口 20 余户，100 余人。生活基本可过。从 1959 年以来，生活很困难，患浮肿病死人不少，现在剩下人口计 14 户，46 人。在 46 人中，男 26 人，女 20 人，10～20 岁的 4 人。转社时全队主劳 28 人，1959 年调到学堂湾修大水库主劳 24

人，患浮肿病死了很多，只回来了 2 人，现在还是病号，不能干活。队上有田 18.5 亩，土 103.57 亩，合计 122.07 亩，人平面积 2.65 亩，有耕牛 2 头，毛猪 13 头。

二、存在的困难问题

㈠劳动力缺乏

全队 46 人中，评级劳力只有 12 人，其中主劳 3 人（副队长算 1 人，会计算 1 人，还有一个偏颈社员也算 1 人），辅劳 4 人，次辅劳 5 人（有 4 人长期病号，不能下地干活）。队上真正能顶起干活的人很少，以致现在还有 38 亩土是荒着的，没有耕种。

㈡领导班子很弱

原有的队干部全部死光，队上没有领导干部，无人领导生产。后来，在对印度自卫反击战中，一个负了伤的残废军人吴耀成复员回来，才安排他来队里担任生产队长（是个跛子）。随后，县基建队又压缩一工人吴胜先回来，就叫他当副队长。队上没有会计，只好通过组织，在另一个生产队调来一个会计张文炳，作“招夫上门”（他的妻子死了，来队同一个死了丈夫的妇女配对），才有了会计。三个队干部中，队长吴耀成因系残废人，不能干活；副队长吴胜先和会计张文炳，二人既是队干部、又是队里主劳。

㈢口粮少，生活很困难

1962 年小春一季，队上每人只分得粮食 29.1 斤；大春一季，每人只分得粮食 29 斤。全年人平口粮只有 58.1 斤。大家感到日子难过。

㈣生产搞得孬，完成国家征购、统购任务困难

1962 年粮食征购任务，全大队为 38，000 斤，平均每个生产队为 3，000 斤，而下达分配给该队只有 100 斤也完不成。现在这 100 斤还是欠着的。棉花统购任务为 909 斤，只完成了 442.3 斤，现在库存尚有 38 斤，土里收秆子棉花可得 20 斤，总计起来，全年可完成 500.3 斤，占应统购任务的 55.04%。大春种红苕 29 亩，因生长很孬，估计每亩只能收 800 斤，按照包产定的合同，要赔产 1400 斤（折成细粮）。

1962 年 11 月 16 日

坚持实事求是是对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

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可见，实事求是，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在革命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作风，作为党对每个党员的党性要求，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是彻底改造旧世界，解放全人类，建成人类最理想、最美好、最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前人未做过的翻天覆地的事业。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既是艰辛和光荣伟大的，又是义不容辞、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因为这一事业不是什么主观空想，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础上的、合乎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事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客观世界，是自觉的认识者与改造者，是做的符合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事业。阶级性、党性和高度的科学性、革命的彻底性，在这里完全是一致的。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地去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神圣的事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实事求是地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才能最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推动历史车轮飞速前进。如果对客观世界作了错误的认识，没有把握着客观世界，在改造中违反客观规律，就必然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使自己的事业受到挫折，走一段弯路。因此，实事求是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作风，成为党性的要求。共产党人在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线、策略方针和政策措施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才不致犯错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把实事求是作为一切行动的准则，才能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党和毛泽东同志经常不倦地教导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除了有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外，还要有冷静的头脑，有科学的精神，遵循客观规律办事，等等，也不过是要求我们尽量做到实事求是罢了。

我们以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去认识客观世界，掌握客观规律，正是为了利用或限制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为了更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在对客观世界，即工作对象，有了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恰当地认识主观力量、主观能动性，也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我们的党，是领导着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党，处于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它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党的一切主张，一切政策措施的制定与贯彻，以至每个党员的言行，都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起人民的特别注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运动的中心已转到北京 ，党更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决定着当代全人类的命运。现实生活给我们党提出了更严更高的要求：要求党有健康的党内组织生活，能及时发现好人好事，及时揭露和清除党内生活中的一切不良倾向和坏人坏事，全党在思想、组织和行动上团结一致，有强大的战斗力，成为坚强的堡垒和领导核心；要求党的正确领导，加快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党有高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促进国际上兄弟党的团结；要求党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和不同的阶级敌人；要求在一切工作中少犯或不犯错误，而有了缺点和错误，又能够很快的纠正，不致扩大和延续。这些就必须做到实事求是。

在实际工作中，违反实事求是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工作粗枝大叶，不深入细致，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或者只凭主观热情办事。认为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把工作做好。他们把工作效果寄托在革命干劲和主观能动性上，不冷静的对客观事物进行科学分析。而在工作中，往往以感想代替政策，凭想象反映情况，用“神仙”数字，用“大概是”、“基本是”、“差不多”等字眼，来代替复杂的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即规律性），因而造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给工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这是属于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思

想认识问题，其根子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很大。毛泽东同志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有这种主观主义的人，在我们党内还为数不少，必须加以改变。办法是努力学习，提高政治理论和政策水平，加强调查研究，遵循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的一条真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另一种情况是革命干劲不足，革命意志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去作调查研究，或者从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出发，有意捏造、弄虚作假，对客观事物，不是夸大，就是缩小。如夸大成绩，夸大困难，隐瞒真相，造假数字，做假报告，阳奉阴违，保留一手，等等，以欺骗党和群众，达到捞取个人名誉地位的目的。这是属于品质问题，是资产阶级作风在党内的反映。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虽然是极少数，但危害性大，应该给予严重的注意。必须加强思想意识的修养和改造，加强党性锻炼，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解决。

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一种优良作风，就是要求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当老实人。老实人不是没有原则性和斗争性的“老好人”，而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事、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的人。共产党员只能做老实人，不能做“老好人”。共产党员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对党讲老实话，如实反映情况，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是好说好，是坏说坏；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添油加醋，不夸大缩小。讲真话，如实反映情况，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我们党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原则意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要做到情况明，就要大家讲真话，如实反映情况。共产党员必须具有明确的是非观点，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和改正错误。为此，就必须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斗争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有高度的负责精神，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打破一切顾虑，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向讲假话和歪曲事实真相的人作无情的斗争，不怕打击报复。如果受到打击报复，就要敢于行使党员的权利，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申诉和控告。同时共产党员对自己的错误也要敢于承认，勇于改正，不抵赖，不推脱。有了错误而不改正，必然会一错再错，错上加错。这样，就是对党和人民，以至于对自己不负责任。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无论对别人，或是对自己，都要尊重真理，服从真理，为真理而斗争。这样的共产党员，于人民的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由于某种原因，即使暂时吃了点“亏”，受到一些委曲，而终究会为真理所洗刷，会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与支持。至于抛弃实事求是，不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反而对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坚持真理的人进行压制、打击，认为老实是“愚蠢”，作假是“聪明”的人，他们害了人民，必然也会害自己。这种人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人民是厌恶的，迟早要被人民唾弃。因为他们欺骗了党，损害了党的威信和人民的事业，为党纪所不容。在某种情况下，即使暂时可以得到一些“便宜”，而事实真相终究要被揭穿。到那时，自己就要吃大亏，以致不能自拔。

为了做到实事求是，从根本上说，必须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承认客观世界的第一性，主观世界的第二性，客观世界尽管形形色色，千变万化，也是可以被认识的。意识就是存在的反映。同时，要努力学习加强党性锻炼与思想改造，永远保持革命朝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何时，都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真理，走好群众路线，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去分析处理各种问题。

只要我们共产党员都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党，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1962 年 5 月

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同志们：

我的发言，围绕这个大题目，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

一、共产党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人类将来必然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在总结了人类过去全部历史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科学共产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现在，世界上至少有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主要国家有 80 多个。这些国家差不多都有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有的虽然名称不一样，但性质是一样的），有 12 个国家的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人类将来必然要进入共产主义，这是正在向前滚动着的历史车轮，是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发展的必然规律，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

共产主义社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它与人类已走过的社会相比，是最高级、最理想、最美好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水平很高，社会产品很丰富，人们根本不感到吃、穿、住、行是个问题。高度发达的大规模的生产，把人们的狭隘眼界已经打破，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很高，人人都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全面的科学技术知识，受社会分工所限制的一辈子都干一种职业的现象已经消灭，人们完全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和自己的爱好从事各种工作。劳动的时间大大缩短，劳动的工效大大提高，劳动的负担大大减轻。每个劳动者都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从事其它社会活动。每个人的智慧都能得到充分发挥。劳动对于每个人来说已由谋生的手段变成生活上的第一需要，把劳动当成一种负担和包袱已经不存在了，人们都把劳动当成一种文体活动来搞了，成了生活上的第一需要和“乐生”的要素，不计较劳动报酬。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等）已经消灭，社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对待，产品按需分配。因为剥削和阶级的彻底消灭，每个人都享有充分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并且很自觉地遵守社会的公共道德和纪律。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马克思曾经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这样说过：“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当奴役人们迫使其服从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后；当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已随之消失后；当劳动已不单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时；当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而增高，一切财富源泉都尽量涌现出来时——只有那时，才可把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会就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根据马克思的天才的预见和指示，我们党给共产主义社会的面貌也进行了概括：当“社会产

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灭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也逐步地消灭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简单说来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上述的那种状况的社会。当共产主义理想经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证实可以变成现实可能之后，就引起了不少人的追求与向往，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就说它好比是一个“怪影”（或译为“幽灵”）在欧洲游荡着，下面接着连举了不少事实，说明一切反动派对它的仇视，进行践踏、扼杀，也阻挡不住。的确是这样。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思潮，是真理，所以引起了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一切地去追求。共产党人在各国尽管引起反动派的仇视和杀害，但是越杀人越多，其势越不可挡。现在，连一些资产阶级也不得不随声附和说自己在搞社会主义，如印度的尼赫鲁、印尼的苏加诺、埃及的纳赛尔等国家领导人就是这样。当然他们是在歪曲罢了。

我们共产党员入党宣誓时，就举手表示决心：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因此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忘却它，每时每刻都要树立“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和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最终目的——共产主义而奋斗！

二、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

防止“左”的和右的倾向。党的当前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好比一幢高楼大厦。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要建成共产主义，既要用很高的速度来建设，又要扎扎实实、循序渐进，不能一步登天，不可能在一个早上或者蛮干几天就能把它建成。正确的态度是：今天应该做的，可以做到的，我们就应该大力去做。该明天做的，而今天亦可以做到的，也可以做，以推动社会前进，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就怕不从实际出发。有些人只凭主观愿望，十字心开，想入非非，把今天本来达不到、不能做的事情，硬要去做，想跳过社会主义阶段，在一个早上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是达不到的，它只能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这就是“左”倾。另有些人也很主观，本来是今天的事，今天应该做的、而且是办得到的，或者虽然是明天的事，而今天也可以做又办得到的，却不去做，拉着历史车轮不让它前进，这就是右倾。

要不“左”不右，不偏不倚，既不盲目，又不停滞不前，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认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首先，必须认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是低级阶段，或者叫做不成熟的阶段、不完全的阶段；共产主义是高级阶段，或者叫做成熟的阶段、完全的阶段。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两个阶段是有区别的。

这种区别具体表现为：

1.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列宁），共产主义是原子能普遍采用的时代。

2.所有制形式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存在着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到共产主义社会，只存在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一种形式。

3.分配办法不同。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与上述三点相适应，受上述三点制约的，还有以下几点区别：

1.社会主义社会，产品不十分丰富；共产主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

2.社会主义社会，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还存在；到了共产主义，就消失了。

3.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等价交换、以劳动作为尺度来进行分配、人人在劳动面前一律平等等，还合法存在；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了。

4.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科学还不很发达，人们还受着因受训练、教育的不同、出身不同、社会分工不同的限制，而终生束缚在某一狭隘的职业上；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轮流作任何工作，不受文化科学技术的限制。

5.社会主义社会，作为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国家，还保留着并发挥作用；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则已经消灭（如果是一个国家首先建成共产主义，在地球上还存在着阶级或帝国主义，则国家还是要保留的，只是对内职能不起作用，对外防止侵略仍起作用）。

此外，如果全世界都建成了共产主义，实现了所谓世界大同，根据有些社会科学家的预见，到那时，国与国的界限已经打破，全世界使用的语言文字将要逐渐趋于统一。

其次，要看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要实现共产主义，先要建成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经历史阶段，不能一步跳过。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逐步成熟形成的，不是像菜刀切南瓜那样简单，把历史一刀两断：今天是社会主义，明天就宣布进入共产主义。二者并没有隔着一道墙，或隔着一道鸿沟。我们现在做的每项工作，每前进一步，都是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创造条件。大目标是共产主义，具体干的是社会主义，不能停滞不前。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系和相同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都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2.生产都是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克服了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

3.共产主义社会的很多东西，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要萌芽，逐步成长，范围逐步扩大，数量不断增加。

以上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不同点与相同点。

由上述可知，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不少条件；而共产主义的建成，需要的条件更高。要把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需要很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尽量争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少产生缺点。但是应该明确，这样伟大而前人又没有做过的事业，一点弯路不走，一点错误不犯，一个缺点不产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太阳光再亮，它也含有斑点；泉水再清，它也含有尘沙。我们的态度是：加强调查研究，使主客观一致，避免、少犯错误，已经犯了就要迅速纠正。有的人有了缺点或错误，尽量掩盖，不敢承认，或者没有勇气承认，这是不对的。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一想起就难过，难道我们抛弃工作上的一点缺点、错误还舍不得吗？没有这种道理。有的人只凭主观热情用事，从好的愿望出发，不顾客观条件，想跳过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这是十分有害的。它的最大害处是降低了共产主义在人们中间的威信，歪曲了共产主义，降低了标准，使人感到："共产主义说起多好，原来就只不过是如此！"这样，就挫伤了劳动群众建设共产主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减少了追求的愿望，不利于我们的事业。

三、划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界限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平均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什么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特点就是：要求大家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用一样多的钱，否认一切差别，反对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主张贫富均等，主张把劳动报酬拉平，主张用"一平二调"的办法把社会财富搞均匀，达到你不穷、我不富，好坏大家一样齐。这种思想是极端有害的，同人民的利益相抵触的。如果用了这种思想来搞建设，就必然引起生产力的破坏，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平均主义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平分社会一切财富的心理状态。这种思想是由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他们对于比他们贫困的、受压迫剥削的人，寄予同情，害怕自己遭到同样的命运；而对于比他们富裕的人，又加以嫉妒、反对：认为把社会财富拉平，才是最合理的最理想的世界。这种思想在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但是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反动的了，就起着破坏的作用了。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老解放区的土改中，这种思想有所抬头，主张损害中农利益，把一切土地财富平分，当时曾对此进行过讨论批判。毛主席说，平均主义"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无论何时，我们都要记住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加以区别。平均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屡次的农民起义中，无不包含有平均主义思想（如太平天国革命中，就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平均主义思想）。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思想，这同平均主义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这里再补充几句。为什么说今天平均主义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呢？因为在根本问题上，它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违背。社会主义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平均主义则不承认差别，主张平均分配一切，反对等价交换。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按需分配，这并不是所有的人不分工作情况、生活情况、地区情况、男女老少，每一种产品都平均分配。平

均分配一切财富是一种幻想，根本办不到。比如，随着生产的发展，新产品不断增加，但每一种新产品刚生产出来时，并不是很多的，这部分产品必须首先满足急需的单位和个人，不能平均，只有待数量很多了才能平均。照平均主义的办法，先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够拉平时，只有把它们整烂成碎块，每人得一块碎片，或者把它积压着，不让它起作用，等到够平均分配时再分。这难道不是对生产的一种破坏吗？

由此可知，平均主义既不是社会主义思想，更不是共产主义思想，而恰恰是同它相违背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中国是个两头小（资产阶级少，无产阶级少），中间大（小资产阶级的比重大）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现象。小资产阶级比重大，人数多，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就特别严重、浓厚。工人阶级、共产党人经常处于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不得不受到影响。这就要求我们每个共产党人，经常留心，提高警惕，防止这种思想的侵蚀和抬头，克服这种思想的再起。为此，就必须好好学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在任何时候都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都能够划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界限。

1962 年 6 月 19 日

整社诗词

咏万年食堂

赶走廿户人，修成大食堂；粉刷加绘画，红漆涂柱梁。

光彩耀人眼，希图赞堂皇；远近参观者，接踵前来往。

口渴有茶饮，肚饿饭菜香；告辞留颂语：人间美天堂。

渠料社员苦，铲铲转饥肠；睁目睨斯室，泪潸心尤伤：

修此大食堂，我们失住房；食堂添设备，我们丢家当；

食堂显兴旺，我等生活降；干部有油大，我们喝汤汤。

喝得周身肿，十染八九亡。幸存算命大，肌瘦面皮黄；

行走喘大气，拄锄耘禾秧；无力地头躺，遭受大帽阅 ：

偷懒耍奸猾，批判加扣粮。为了求活命，生野塞胃肠。

胡豆空秆秆，小麦吊吊光。都说小偷多，实是廉耻丧。

遍地皆如此，何只此一乡！歉收包赔偿，队长实难当。

为了一队人，忙把小春抢。半熟往回割，晾晒房顶上。

天公恶作剧，淫雨加沱滂。冲走不可免，留者长苗秧。

日出拗下晒，瓦块多踩伤。此后每遇雨，更是遭灾殃：

雨从屋顶灌，室内水汪洋。深处可划船，浅处成池塘。

沉渣全泛起，遍浮烂糟糠。再看大食堂，景致更“漂亮”：

倒楣关门后，青草庭中长；阳光瓦缝入，霉菌生画梁；

水顺红柱流，遍体是鳞伤。往来过路人，嗟叹且悲怅：

休看“五风”盛，剩此衰颓像。此是“万年”景，匹配有“乐江” 。

多谢后来人，儆斯慎莫忘。

1961 年 7 月 1 日

薅棉花

挥锄棉田里，苗壮枝叶茂 。锄头慎落下，脚步轻移动。

花朵耀人眼，桃果压枝重。一片丰收景，棉农愁衣缝 。

1961 年 7 月 4 日

拔草甘蔗林

拔草甘蔗林，草比甘蔗深。

猛拔一天整，三行欠完成。

手指勒破皮，脚上割血纹。

草堆遍地是，牧童背不赢。

社员干此活，一片吵骂声。

1961 年 7 月 12 日

夏日烦事多

太阳晒死人，干活汗珠滚。

蚊虫吸我血，苍蝇扰我身。

床上像炕灶，无法去就寝。

院里人来往，一片吵闹声。

夏日烦事多，何日得安宁？

1961 年 7 月 13 日

新编古怪歌

㈠

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

良田少稼穡，坟坡禾苗多。

人肉街上卖，树叶做馍馍。

一个老鼠一元钱，一勺田虾两角多。

㈡

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

稻麦没了穗，豆子空壳壳。

夜间搞生产，白天睡大觉。

粪土骄矜万户侯，小偷成群满山坡。

㈢

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

秀才服劳役，小学教大学。

老农学种地，稚童教农活。

地痞流氓登显位，小人贼子赃官多。

㈣

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

肿病成时髦，健壮没几个。

为了吃和穿，廉耻算什么。

光天之下君子客，暗里尽干骗偷摸。

1961年7月13日

身体怎会好

㈠

干活干累了，腹空肚子叫。

一天三餐稀，每餐二两膏。

生冷嘴中塞，拉稀不断跑。

油水早绝缘，身体怎会好？

㈡

干活干累了，休息想躺倒。

蚊子叮头部，苍蝇脚上扰；

胸前梭虱子，脊背跳格蚤。

满身吸血虫，身体怎会好？

1961年7月15日

饥肠辘辘有感

日长天下雨，肚饿快无比；

喝碗清“膏二”，填肠不顶事。

几次尿撒后，无屎光放屁。

1961 年 7 月 16 日

软绵绵收工有感

劳动挖水沟，累得腰酸痛；

挖到午时正，无力才收工。

 饥从腹肚起，馋涎口喉涌；

哪能得薄饼，普救荷锄翁！

1961 年 7 月 16 日

吃代食品馍馍

听说发馍馍，三人笑开颜；

人均三四个，生活大改善；

渴望多少日，饱餐将实现。

馍馍端上桌，三人互谦让；

拿在手中看，有似马粪状；

送进嘴里尝，怪味满口腔。

一口咬过后，二口嘴难张；

狠心咬三口，呕吐倒胃肠；

感谢造物主，有此大犒赏！

1961 年 7 月 16 日

粪土 骄矜万户侯

㈠

粪土骄矜万户侯，田园多被荒芜，庄稼连年歉收。劳动人民罹大灾，痛苦难出头。浮肿多殇命，病弱成骷髅。衣不蔽体，满身褴褛，形体虚在神不守。

㈡

粪土骄矜万户侯，原野杂草丛生，山林伐成秃头。景物娇姿变丑貌，触目令人愁。村庄多凋敝，漏室处处有。住不安居，欲行难走，江山憔悴血泪流。

㈢

粪土骄矜万户侯，文教恣意践踏，礼义廉耻没有。社会道德任败坏，贪污盗窃稠。文秀服劳役，粗鲁翰林首；子忤父教，徒叛师诱：华夏文明岂此休？！

1961 年 7 月 16 日

漏室铭

（仿刘禹锡《陋室铭》）

房不在高，有光则明；屋不在大，能住就行。斯是漏室，惟吾伤情：下雨水如注，地面泥泞坑，衣被多发霉，遍地黑灰尘；床上半湿，长夜难寝。无干地可容身，无平处置物稳。观者

云："怎能住人？！"

1961 年 7 月 17 日

调笑令

㈠

"五风"，"五风"，刮得神州虚空。

当年田良宅美，而今荒原破壁。

壁破，壁破，到底是谁过错？！

㈡

平调，平调，砍伐、剥夺、搜抄。

外光内空如洗，牲畜倒毙人死。

死人，死人，旷野频添新坟。

㈢

退赔，退赔，雷大雨小实微。

一次二次三次，就难彻底了事。

事了，事了，还靠农民囊饱。

㈣

分配，分配，天天开会讨论。

会计算盘打烂，干部心焦额烂。

烂额，烂额，社员裤带紧勒。

㈤

伟大，伟大，杜听真言实话。

左倾还反右倾 ，冒进更要夸大。

大夸，大夸，唯余荒土泥巴！

1961 年 7 月 19 日

水调歌头

感时

泰平几时有？只好问皇天。皇天本畏民主，谁敢犯颜相谏。我欲为民请命，只恐难达南天，便遭降魔鞭。贴地行八万，仍在沱江边。

惊回首，夜三更，早失眠：忧虑沉浮，世上岂只你一员？人有大小肥瘦，理有曲直正反，弄权自古然。但愿浮云散，鉴读劫华篇！

1961 年 7 月 20 日

工作团印象记

两年的下放整社工作过去了。作为工作团的成员之一，回顾一下工作团本身如何，也是很有意思的。

原先，出发北京前，在人民大会堂听到那么多首长的报告，他们都强调了这次整社的重要性，批评了科学院在确定人选工作上的缺点，又进行重新动员挑选。当时，以为这样的工作团组建起来，一定是一个素质好、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可是，两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工作团是一个很弱的、缺乏坚强战斗力的工作团。尽管它的工作是有一定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

一、领导能力很弱

工作团两个领导人，一个人称王处长，另一个人称梁处长。听说他们都是资格老（“三八式”）、级别高（十二、三级）的干部，然而文化低（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政策理论水平不高。听说，其中一个原是某科研所搞后勤的总务处长，一个是某科研所管物资供应工作的处长。他们在机关，主要靠秘书协助工作，到了工作团，没有随身带秘书，只得自己独立工作。开会的内容，自己记不下来，反映迟钝，口才不好，在台上很少讲话。有时讲几句，支支吾吾，抓不住重点，当讲的不讲，不该讲的反而重复罗嗦。在一些大的会议场合，比起地方领导干部，没有他们活跃、会讲，大大逊色。坐在台下的工作队员看到这种情况，很过意不去，为他们着急，为有这样的领导丢脸。

二、领导作风不深入

在两年的时间内，工作团的两位领导，住在县委机关，参加常委会议，享受常委物质待遇（每月粮食定量 45 斤），可是工作毫无起色。开会仅是列席作个陪衬，听听而已，没有听说有什么新见解，提出什么新的、好的建议。平常很少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我们住的地方距县城只有几里路，从未见他们下过基层了解情况。即使是集中起来开会，也往往是坐在台上，不深入到小组听听下面从第一线回来的同志谈情况。工作团在简阳两年，我问过不少同志，都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可以说，这是严重脱离群众产生的。

三、工作团的领导，对工作团成员的工作，从没有亲自布置过，从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性工作意见

工作团成员的工作，完全是由地方领导干部在指导，工作团的领导只起到地方领导干部的助手作用。尊重地方，按照地方领导机关统一部署去工作是可以的，因为从大原则来讲，我们都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但是，不能忘记，我们是带着中央的意图，来纠正农村前两、三年工作中的错误的（如刮了“五风”要纠正），我们比地方干部更超脱、更主动。在执行政策，总结经验教训方面，我们更说得起话，更应有水平，而这一点根本未显示出来。

四、工作团内部，没有建立一整套工作制度

像请示、汇报、定期研究工作、搜集整理材料等制度，工作团是没有建立的。工作团成员工作告一段落，回县委招待所总结工作时，没有专门的班子汇总材料。有次，临时把我和另两位大学生喊去，叫整理个材料出来。可是，工作团的领导不亲自告诉意图，不来一起研究，也没有什么人提供材料，只委派其身边接近的人间接地来向我们作布置，叫我们自己去考虑考虑，写出来就行。由于领导不告诉意图，又缺乏系统的材料，使我们很为难：写这样的材料，有如是逼着牯牛下儿。我们莫法，只好自己去找一些人东问问、西问问，临时现凑材料。可见，他们对工作极不负责、极不严肃。或许，也是他们本身没有那种组织能力罢。可以说，工作团真辜负了中央的重托与希望。在整社期间，据我所知，工作团根本没有产生过一个像样的、得到中央肯定和批转的、反映下面真实情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材料或文件。

五、工作团成员素质参差不齐

工作团成员中，转业军人特别多，壮年人多，身体素质好，吃得跑得，但文化素质普遍都低，小学、初中文化的居多。开会时，不少人拿起笔和本子记不下来。在下面生产队工作，群众反映情况，也记不下来，很多是靠心记的。凑情况时，常是七零八落，抓不住要点，反映不出问题的完整性，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关键性情况有时被忽略，本质的东西被放过。他们中间一些人不仅不正视这些问题反而态度高傲，说话缺乏政策性，头脑不冷静，动辄就提虚劲、放空炮，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常以自己出身好，是工农干部这种优越感傲视他人；对知识分子有时还有些格格不入，给以轻视。

六、少数人素质差，爱占小便宜，对人严、对己宽，影响了内部团结

比如某科研所科长张敏，身为住区委的工作队中队长，在工作大忙之时，把我们抽调到区协助工作，而他则梭边边，请假回家去休息。抽调去的几位同志生活不落实，区公所管伙食的人员和炊事员有意卡拿我们（比如，买菜票一张，区公所的人是 3 分，要我们 5 分；买饭票一张，区公所的是一角六，要我们二角；同等的票，区公所的饭菜总比我们的多；买馒头，区公所的给大的，给我们的是小的；买稀饭，区公所的捞沉底的，给我们则舀上面清汤寡水的；买菜，区公所的一张票打满碗，而我们三张票也只得半碗……），他看在眼里，就不出来说话，根本不管。小队长朱子军（某科研所科长）住在公社，省委批准供应工作团每个同志一床蚊帐，他便先挑好的，而且不征求别人的意见，认为别人有了旧蚊帐就把别人应买的硬买去；县里供应工作队员一人一块香皂，谁要不在队里，就被他私吞了。大队工作组长郎封域（据说曾在部队当过副指导员），上面配给每个队员一张糖果票，有时他自己拿去买来吃，不给人家；就连每人交了钱买的供应照明用的煤油（每人每月二两），经他手分，他都要给以克扣三分之一；上面发给每个队员一盒万金油，他也好意思拗开盒盖，抠去半盒。1961 年小春收获时“偷盗”特别厉害，我们向他汇报情况，他却说：“我们是管不了啦，现在我们少出面，让地方干部去管。如果我们管多了，反而会孤立，立不住脚。我们现在处于无人管的地位，两个老头子根本不管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管自己了。工作上我们能管多少就管多少，管不了就算了。”他很灰心失望，认为是“受了骗”下来的。

更有趣的是，有次在县里招待所开四级干部会议，以朱子军为首的少数几个人，吃了饭不交钱粮就溜了。招待所管伙食的人把我们小组最后下桌子的于思和揪住不放，要他负责去结账交全部伙食的钱粮。说：“你是工作团的，是一个组织，那些人都走了，我不找你找谁？今天不交清就不让走。”于思和无法，只得在管伙食的人员紧跟下，四处找还没有走的同志借钱借粮，代他们交齐了才脱了手。可是，后来于思和向朱子军他们索还钱粮时，朱子军反奚落于思和：“我又没有叫你垫支，自己垫支自己负责！”活活地把账赖掉，于思和收不回垫支钱粮，只得自认晦气。还有一个叫李盛明的，他和我们在红塔区整理材料，吃了伙食，领了供应的香烟，就是不交钱粮，支我去结账。办伙食的人认准我，硬叫我垫支，我推不脱，只得垫支钱粮帮他结账。这类事情，工作团的领导既不问，又不管，让其自流，而影响工作团在外的形象，在内的团结。

工作团一方面解决不了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再一方面又出现这类不光彩的事情，造成了威信不断下降。因此，有些人把工作团的人当成是北京中央机关不要的人，是下放到地方的包袱，给地方增加了额外的负担，等等。

总的讲，第一年尚有工作团的形象，开初宣传中央政策，进行登记搞退赔，纠正“五风”等方面，还是做了不少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很多同志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带头搞

好生产，使形势渐渐往好的方面转化。但是，到第二年，由于人员调动大，很多同志都调到了县里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这时，工作团已名存实亡，全是各顾各的了。

1962 年 12 月

告别简阳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五日，上午九时许，在简阳火车站告别了一些前来送行的同志，乘上了开往重庆的列车。此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列车启动后徐徐离开简阳车站，眼望窗外后退的景物，我情不自禁地念道："简阳啊，再见了！"

车离站后，速度越来越快，铁路旁广阔的土地里，"八尺开箱"兼种、套种的麦子、胡豆、油菜等农作物，长势良好，片片嫩绿，闪过眼帘，令人喜心悦目，倍觉清新。它预示着社员们将会获得丰收，生活一定会得到改善，困难时期即将过去。

简阳，是成渝线上第一座县城。这里交通方便，地势险要。沱江从中穿流而过，两岸土质肥沃，泥沙地多，属经济作物区，主产棉花、甘蔗、花生、油菜、芝麻、药材和粮食等作物。只要政策对头，领导得当，经济恢复肯定很快，将来也一定大有发展。这两年中，我深深体会到：简阳的干部，除极少数喜欢搞极左的那一套外，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简阳的人民，是纯朴、善良、勤劳、智慧的人民。这里，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确是一个好地方。在这两年的艰苦岁月里，我要感谢简阳的一些好同志和好社员，是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才使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度过难关。从重庆方面得到消息，十月份我的调令已经下达，简阳方面也收到了。可是简阳方面就不告诉我，一再做工作，要挽留我在简阳。要不是为了重庆的那个家，如果我还是一个单身汉，留在简阳又未尝不可呢！

火车在飞速地前进着。坐在我身边的母亲，不时念叹着家："我这出来几个月了，晓得玉莲如何啊，小燕长得怎样了啊！"这声音传入我的耳里，使我顿时陷入了沉思，想起了很多事情，鼻子一酸，禁不住掉下了眼泪："两母女不会有啥，很快就要见面了！"我这样回答。然而眼睛却是迷糊、润湿的，想起几个月前她们母女来简阳的情景及我所见的模样：小燕身体瘦弱，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额头，聪明、伶俐、可爱的样儿浮现在我的眼前。她唱《小燕子》、《草原晨曲》、《红湖水，浪打浪》的歌声，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回想这几年，家庭四分五裂，四口之家，分住三处。父亲 1958 年去世以后，母亲孤独一人住在农村老家，无依无靠。1958 年 8 月，为了让她不感到孤单，也为了帮我和玉莲带即将出世的第一孩子，我利用暑假，专程从北京回到邻水老家，雇几个人，用凉椅捆上斑竹棒棒，抬着母亲、挑着行李，历经苦辛，翻一座大山，步行二百余里，把身体虚弱、饱经风霜的母亲接到了重庆，让她同我爱人住在一起，相依为命……。

这几年，我要感恩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了。追溯过去，首先，我要感谢已故的父亲，是他对我从小就严格要求，劳苦培养教育，使我学会了不少农业知识和耕作技能，田里土里翻土除草、栽秧割谷、粗活细活、肩挑背驮，样样都能干，而且掌握了一些基本工，会使用刀、镰、斧、锯、推刨、凿子等工具，会编织竹篾器皿，会制作和修理木质简单农具，如锄把、扁担、扦担、扬叉等等，从而能够适应农村生产劳动的环境，能顺利地度过每次的劳动关，并立于不败之地。在干同一种活中，一些自称工农干部的人，有的在我面前望尘莫及，甘败下风；就连农村社员也刮目相看、称赞不已。我也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教我从小会做家务事：会缝补、洗涤、炊事，等等，使我处在各种困难环境，能够应付和独立生活；更应感谢她帮我们做家务、带孩子，使新成立的一个小家庭有了生气，免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能在外面听从调遣，天南地北完成任务。当然，更不用说，我也要感谢自己的爱人，是她在家里，一方面完成“大跃进”繁重的工作任务，同时还要挑起家庭重担，把一切事情统起来，使老有所依、幼有所养，维持着小家庭的存在……

列车，飞速前进。不时，母亲又提醒我：“要注意车上带的东西！”我点头会意，环视一下，打量着我的东西：大小纸箱、木箱、皮箱共四个，被盖卷一捆，随身所带挎包两个。数目不少，但值价的东西却没有。单是书籍就装了两箱半，用的穿的破旧衣物一箱多；身边的两个挎包，一个装着母亲晒的七、八斤干红苕片，一个装着盥洗用具及日常生活用品。我怕丢的，倒是装在挎包内的笔记本、日记本，所以我一直把它们放在身边，不时翻一翻、写一写、记一记。

下午四点左右，火车到达了终点站重庆。我站起身来，舒了口气，心想：我又即将踏上新的工作岗位了。不知为啥，此时，我又回想起了工作团。近期，我们工作团的成员，不少人也和我一样，重新分配工作了。有的调回北京，有的调到成都，有的调到专区，有的根据自己的要求调回了本籍老家，还有一些尚在简阳等待分配。分到党校搞理论工作的，可能只有我一人。明天，我定要去重庆市委党校报到。

1962 年 12 月 5 日晚

附：整社期间大事记

1960 年

12 月 20 日　　上午，工作团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启程赴川。

12 月 22 日　　下午抵成都，省委派车到车站接到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住四天。

听了廖志高书记的报告 、省农业厅厅长介绍了四川农村的困难情况。

12 月 26 日　　　　由成都到简阳，住公园县委干部招待所，听了县委领导介绍本县农村情况。

1961 年

1 月 6 日　　　　工作团成员分散到各自的岗位。领队、工作团负责人王处长、梁处长二人住县委；中队领队张敏等人住红塔区区委；小队领队朱子军等人（包括医生一人）住解放公社；小组负责人郎封域等住民主大队队部。我分配到民主大队第六生产队住“万乐食堂”。

1 月 28 日至 2 月 5 日　通知回县委干部招待所总结第一阶段整风整社工作（主要是搞退赔）。

2 月 11 日　　　　请假回重庆望江厂过春节（2 月 15 日是旧历正月初一）。

2 月 19 日　　　　返简阳，随中队全体成员转移到黄连公社。张敏、朱子军等人住公社。我和郎封域、石丰海三人住第五耕区四小队。

4 月 11 日　　　　全体队员接通知回县委干部招待所总结工作、学习中央《六十条》、作鉴定。前后休整半个月。

4 月 26 日　　　　工作重新调整：张敏等人仍回区委，朱子军等人回公社，郎封域回民主大队队部，我由六小队调二小队，同于思和、李振敖住在一起。组仍由郎封域负责。我除社会工作、参加劳动外，还要协助队上记分员记好工分。

7 月 28 日　　　　由朱子军带来张敏通知，调我和石丰海、李振敖等人到红塔区委协助工作，主要是搞社会调查。解放大队调去的有邱永寿（大学生，在国家统计局工作）。我与邱永寿负责写材料。

8 月 20 日　　　　区委蒋书记通知我，晚上同区委樊书记等人赶写一个向地委报告的材料。写到凌晨三点半完成。

8 月 30 日　　　　通知回县委干部招待所开会，听取内江地委副书记兼简阳县委书记张政委的形势报告。至 9 月 2 日下午，会议结束。

9 月 2 日　　　　下午，中国科学院慰问团来到简阳，通知我们不要回去，继续留所开会。

9 月 3 日　　　　慰问团成员与有关方面接触，了解情况，并研究会议开法。

9 月 4 日　　　　科学院慰问团在县委干部招待所召集全体工作团成员开会，除向大家

表示慰问以外，还报告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北京的情况，广泛征求了大家的意见，解答了些问题。

9 月 14 日 我在红塔区区委工作结束，回到解放公社民主大队二生产队。社员和干部对我很热情。

11 月 1 日 到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

11 月 7 日 内江地委召开全体下放干部会议，讲分配工作问题。

12 月 23 日 我由县委组织部调到县商业局，参加搞城镇的“新三反”，兼搞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工作。

12 月 26 日 到县商业局报到。

1962 年

1 月 2 日 请假返渝，在望江厂家中过春节。

2 月 9 日 由渝返简阳县商业局。

3 月 6 日 收到科学院徐日彪同志来信，告诉所里已向四川省领导机关去了公函，建议调我到重庆工作。

3 月 21 日 为杨局长到成都开会准备三类产品情况的材料。

6 月 19 日 向商业局和供销社全体党员作《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第二单元党课学习）的辅导报告。会后反映好。

8 月 15 日 县委确定我为报告员，同县级机关调去的几个同志一起，组成工作组，到禾丰区宣传贯彻中央两个“宣传要点”，并指定我不仅当报告员，而且要参加听取汇报，工作完后 写出总结材料。在 8 月 29 日，工作汇报材料写成。

9 月 21 日 理论学习时间，由县委宣传部刘部长讲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10 月 15 日 接到玉莲来信，言望江厂党委电话告诉，省委跟重庆市委作了联系，同意调我到重庆工作。

11 月 30 日 由于供销社领导在几天以前已通知我要调职，今天副主任刘烁贤、秘书股长谭光亮和总支、工会工作的毛志敏、王均良、施敏旃等同志邀我合影留念。县委财贸办公室黄亚 辉、杨明辉、陈峰胜、魏绍兴、邹君治等几位搞文秘工作的同志一道邀我合影留念。中午，受财贸办几位同志之邀，聚餐为我饯行。

12 月 3 日　　　　　县委组织部正式通知，调我到重庆市委党校工作。

12 月 4 日　　　　　中午，供销社秘书股长谭光亮同志邀我和母亲到他家吃饭，为我们饯行。

12 月 5 日　　　　　上午早餐后，供销社同志用板板车将我全部行李运送火车站，并送上车。下午四时左右，抵达重庆。

12 月 6 日　　　　　到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报到。接待人是刘正媛，她很热情。

跋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富有革命精神；同时，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更是灾难深重，内忧外患，连绵不断。我这份材料，反映了“内忧”的一个方面，或者说一个部分。今后，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无论人事、国家、社会怎样变化，《纪实》已成历史。铁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作者

1997 年 12 月